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JIANGSU INSTITUTE OF SOCIALISM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类综合期刊

《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

本刊顾问

薛国安 吴胜兴 常本春 朱毅民

吴建坤 米其智 蒯建华 陈京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瞿超

副主任 唐旭明 魏晓蕾 彭慧 陈童

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孙波 任世红 陈思 张吉林

张美云 张思东 傅佩丽 张刚强

主编 魏晓蕾

副主编 任世红

目 录

2019 年 第 1 期 总第 117 期

主 管: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
主 办: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
编辑出版:《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编辑部主任:王 芳
责任编辑:鲍跃华 王 芳 龚万达 郭晓东
王天海 蒋建忠 徐晓婷

统战理论与实践

- 论习近平新时代大统战战略思维 / 杨卫敏 04
-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研究
——以河南为例 / 中共河南省委统战部课题组 19
- 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思考
——以台州市黄岩区为例 / 潘禹斌 王功田 26

政党制度

- 争取话语权与多党合作制度效能的关系研究 / 刘菊香 31
- 制度自信: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和完善的重要保证 / 强亦忠 许 红 37

新社会阶层

-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态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 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 南京师范大学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理论江苏研究基地联合课题组 42
- 依托“两新”党组织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机制研究 /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课题组 50

封面设计:姜 嵩

封底篆刻:韩文忠

地 址:南京市苜蓿园大街 51 号

邮 编:210007

网 址: <http://JSYB.chinajournal.net.cn>

电子邮箱: jssyxb@163.com

电 话:025-84287236

传 真:025-84287236

刊 号:ISSN1672-3163 CN32-1559/C

印 刷:南京艺中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9 年 2 月 28 日

定 价:8.00 元

民族与宗教

宗教组织开展慈善事业的资源构成研究

——以江苏省 S 市基督教为例 / 刘 影 孙卉樱

60

宗教信仰的代际传递

——基于 CGSS2010 的实证分析 / 汪 虎

64

中华文化

简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细落小落实 / 郭榛树 王程程

70

孔子人性论思想评析 / 谷玛利

74

学习与思考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网格化机制探索

——基于苏州 W 镇的考察研究 / 施瑶瑶

78

本刊启事

本刊已加入 CNKI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知网、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重庆维普、龙源期刊网、台湾华艺等数据库,故凡向本刊投稿者,均视为已同意稿件入编上列数据库上网发行,授权本刊代理其稿件电子版信息有线和无线互联网络传播权,本刊不再寻求作者授权。本刊一次性所发稿费,包括纸质版、光盘版、网络版及其全文数据库著作权使用费及稿酬。

期刊基本参数: CN32 - 1559/ C * 2000 * b * A4 * 80 * zh * p * ¥8.00 * 2500 * 13 * 2019 - 02

论习近平新时代大统战战略思维

杨卫敏

摘要:新时代呼唤大统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把统一战线放到党的全局和战略问题上来研究、谋划和部署。传统的“大统战”,主要是指工作格局的大统战;习近平新时代大统战战略思维,紧扣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发展了关于统一战线属性和地位认识,拓展了统一战线的工作范围和对象,提出了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的总体思路,开启了统一战线工作法治化进程,具有超前的战略性、系统的整体性和鲜明的时代性,体现出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和新时代统情的深刻体认,对统一战线工作规律的精准把握,对实现民族复兴的责任担当。习近平大统战思维主要涵盖:大统战方略——最大政治与战略问题;大统战目标——民族复兴与最大同心圆;大统战理念——最大公约数与治国理政;大统战内容——新型五大关系与中国道路、中国智慧;大统战格局——机制创新和队伍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彰显战略眼光、蕴含政治智慧,既“跳出统战谋划统战”,又反过来对新时代党和国家全局工作有着重要应用价值和借鉴作用,必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起磅礴力量。

关键词:大统战;战略思维;习近平;新时代;统一战线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9)01-00004-15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战工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出台一系列文件,对巩固和发展新时代统一战线进行全面谋划部署。习近平关于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为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始终贯穿着大统战战略思维。传统的“大统战”,主要是指大统战的工作格局和工作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大统战战略思维,是从长远、全局和战略高度,对统一战线进行总体谋划。笔者曾从历史方位、理论基础、战略定位、逻辑思维、鲜明特点、最大政治、统筹兼顾、根本问题等八个方面,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

收稿日期:2018-11-10

作者简介:杨卫敏,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副巡视员,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理论浙江研究基地副主任兼专家组成员。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度山东省社科联人文社会科学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统一战线重要思想研究”(17-ZX-TZ-02)的阶段性成果。

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进行探讨^[1]。这八个方面实际上都体现着大统战思维。近些年来,理论界、学界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相关研究非常活跃,形成了一系列成果。但从“大统战”视角研究分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理论文章并不多见。研究习近平大统战站位、视野、思维、理念、格局,是本文的靶向和着力点,也正是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价值所在。

一、大统战哲学基础:传统文化、经典论述与新时代理论

统一战线是同与异的矛盾统一体,是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为了共同的利益和目标结成的联盟。在新时代,统一战线更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广义统一战线思想、谋略和举措在古今中外都存在。习近平大统战思维,正是建立在汲取中国古代统战智慧、领悟马列主义相关经典论述、继承中共几代领导集体统战思想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分析研判、谋划思辨,是对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体系与逻辑思维的集大成。

(一)对中国古代统战智慧和思想的汲取和应用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追求的“和谐”、“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大一统”等核心价值观,蕴含着统一战线的思想智慧。习近平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在论述多党合作、民族宗教、知识分子、亲清政商关系、港澳台侨工作中,经常引经据典,特别注重汲取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统战智慧。例如,他指出:统一战线是一致性和多样性的统一体,只有一致性、没有多样性,或者只有多样性、没有一致性,都不能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正所谓“非一则不能成两,非两则不能致一”^[2]。他在论述联谊交友时指出:“俗话说‘一人为仇嫌太多,百人为友嫌太少’。”交朋友的面要广,朋友越多越好,特别是要交一些能说心里话的挚友诤友^[3]。在论述协商民主时指出:中国古代,每有大事,必相谘访^[4]。在论述民主监督时,引用古语“拒谏者塞,专己者孤”。在论述知识分子和人才问题时,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历来具有尚贤爱才的优良传统,如“得人者兴,

失人者崩”,“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天地间,人为贵”,“尚贤者,政之本也”,“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功以才成,业由才广”,“筑好黄金台,引得凤凰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等等^[5]。在论述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时,习近平指出: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既要相敬如宾,又不能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6]。在论述民族工作时,习近平引用《礼记》中的语句“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这是“和而不同”文化观念在民族政策中的体现;引用古诗“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说明每个人都会认同自己的民族文化,主张每个民族,不分地域、不分大小,其思想文化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7]。在论述港澳台问题时,习近平指出,古人说过“得土地易,得人心难”^[8]、“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两岸同胞共同努力^[9]。在论述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时,习近平引用了“政无大小、以得人为重”、“木有所养,则根本固而枝叶茂,栋梁之材成”、“不厚其栋,不能任重”等古语,阐释了党外代表人士建设的重要性和方法论^[10]。

(二)对马列主义经典关于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论述的吸收和借鉴

马克思主义是思想理论的宝库,蕴含着统一战线的思想。《共产党宣言》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马克思还提出无产阶级必须加强自身的团结统一、争取同盟军和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独立性等问题,这些重要思想解决了“为什么联合”、“与谁联合”以及“联合中的领导权”的问题,为我们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列宁进一步丰富了统一战线的思想^[11],包括建立稳固的工农联盟、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帝国主义包围中和平发展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是深刻领悟把握马列主义有关统一战线论述的精神实质,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不断深化、丰富和发展的统一战线理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一国两制”等,既是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统一战线领域的重要成果,也为世界提供了中国方案、彰显了中国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12]。当前,我们要发挥政党制度的效能优势,就要把着力点放在发挥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积极作用上^[13],不断完善政党协商的内容和形式,进一步彰显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和影响。

(三)对中共历代领导人有关统一战线经典论述的政治传承

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习近平引用了毛泽东有关统一战线重要地位论述的三句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所谓政治,就是把我们的敌人搞得更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统战工作是最大的工作。习近平进而指出,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花大心思、下大气力解决好的重大战略问题。在批评有人把统战工作看成是自找麻烦的说法时,习近平引用刘少奇的话来批驳这种错误观点——做统战工作是找麻烦,但又省麻烦,找来的是小麻烦,省去的是大麻烦。在论及做有个性的统战对象工作时,习近平引用了邓小平的话——即使是中立一时,将来还可能反对我们的人,我们也要使其中立。这样就把可以争取的人都争取过来。在论及宗教工作时,习近平引用江泽民说过的一句话——在我国,宗教的社会作用仍然具有两重性,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在论及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时,习近平引用了胡锦涛的话——加大党外代表人士培养、选拔、使用工作力度,努力培养造就一支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较强代表性和参政议政能力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对中共几代领导人关于统一战线理论思想的继承

发扬、接续发展,彰显了新时代统一战线思想的政治传承和理论基础。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统一战线事业处于新的历史起点,呈现出站位更高、视野更宽、格局更大、根基更深、范围更广、渠道更多、方法更活等显著特征。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回应了“三个解决”:一是解决建立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必要性问题;二是解决如何建立新时代统一战线的问题;三是解决怎样推进新时代统一战线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彰显出鲜明的继承性、系统性、战略性、时代性、创新性。

新时代统一战线核心理论创新。在习近平有关统一战线所有论述中,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的方针是贯穿始终的灵魂,是统一战线理论和各领域政策的总开关,是新时代统一战线的核心理论创新。这一重大理论既彰显统一战线的本质理念——求同存异,又反映新时代统一战线的时代特征。面对经济社会转型期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呈现出的“三个多样性”,习近平指出:一方面要着力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不断增进一致性;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包容和引导多样性^[14]。《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将“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扩大为“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这是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的重大创新发展。

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体系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对统一战线理论政策的一系列精辟论述,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视阈中的统一战线话语体系具有积极价值,开辟了新时代统一战线理论的新境界。一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的论述为我国政治发展道路赢得话语权奠定理论基础。2013年,习近平出访俄罗斯时说:“我

们主张,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尊严。要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维护国际公平正义。“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15]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论述,赢得了海外媒体的积极评价。二是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新论述有利于增强政治底气,彰显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三是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新论断有利于建构中国民主理论话语体系。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

新时代各领域统一战线理论政策的丰富发展。一是强调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提出要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二是提出关于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即“八个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是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强调要在“导”字上下功夫,促进宗教中国化和宗教工作法治化。四是指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一项基础性、战略性的工作。强调尊重和包容是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条件,提出“分类施策”做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方法论,要关注那些具有特殊性的知识分子^[16],特别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这些思想论述极大地深化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也丰富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

二、大统战背景:全球视野与中国方案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在统一战线方面,习近平高屋建瓴、审时度势,既以全球视野审视世界格局变化对统一战线工作的深刻影响,又以敏锐的眼光研判“两个一百年”目标给统一战线发展带来的重大机遇。

(一)全球化与中国崛起:统一战线面临的国际形势更为复杂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愈演愈烈,全球治理体系

和国际秩序正在经历数百年来最为深刻的变化。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也实现历史性提升。与此同时,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实现历史性提升,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等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和参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越来越大^[17]。但是,我国在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同时也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同时出现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面对各种挑战,习近平力主以合作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破解修昔底德定律,构筑新型大国外交。随着我国现代化的进程,统一战线将在反渗透、反分裂、反颠覆斗争中肩负重任。一方面,对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的争夺战将更为激烈。习近平要求“把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外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18],统一战线责无旁贷。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已经成为境内外各种社会力量和政治势力关注、争夺的重要阵地,有效引导和整合好这支力量,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对统一战线提出新的课题。

(二)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统一战线要为彰显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作出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使6亿多人摆脱贫困,令世界刮目相看。中共十八大开启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阶段,也开启了统一战线发展新的阶段。“两个一百年”新目标、新判断、新理论的提出,使统战工作面临新的挑战、新的任务和新的要求。特别是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矛盾”确立改革新目标,统一战线大有可为。例如,浙商总会会长、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指出:“企业和企业家应当在解决这一关键制约因素上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当仁不让成为解决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生力军。这既是企业和企业家的基本责任,也是企业和企业家的机遇。我理解的平衡发展不是为了求大锅饭式的平衡,而是要激励和倡导有担当、有责任感的企

业家走共同富裕之路。”^[19]。

(三)着眼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谋划统一战线工作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对外关系上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构想,如破解“修昔底德陷阱”、参与全球治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等,这对统一战线提出了新的任务要求。一是要发挥统一战线在对外合作共赢中的作用。习近平强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处理好我国利益和沿线国家利益的关系,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20]。这为发挥非公经济人士和海外侨胞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指明了原则方向。二是从国际国内两条线做好西藏、新疆工作。习近平强调,必须把中央关心、全国支援同西藏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奋斗紧密结合起来,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做好西藏工作;必须牢牢把握西藏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对达赖集团斗争的方针政策不动摇^[21]。三是强调“命运共同体”和争取人心,以“中国梦”引领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强调做好港台青年工作,“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22]。

三、大统战方略:最大政治与战略问题

古语曰:“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把统一战线放到党的全局和战略问题上来研究、谋划和部署。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推进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内容非常丰富,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重点加以理解和把握:一是目标维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解决新时代是否需要统一战线的问题;二是理念维度:实现大团结大联合——解决新时代需要什么样的统一战线的问题;三是实践维度:实现目标、贯彻理念的实践要求——解决怎样巩固和发展新时代统一战线的问题。新时代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

作的重要思想作为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明确新目标、树立新理念、贯彻新要求。

(一)明确新形势下统一战线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关于统一战线“三个法宝”地位作用的论述,从根本上回答了为什么历史上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现在仍然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法宝,以及是将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法宝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将统战工作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谋划,指出“统一战线有自己的优势,应该也完全能够为落实‘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做出贡献”,强调要把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当前统一战线的主要任务^[23]。特别强调民族工作、宗教工作都是全局性工作;还从党的政权巩固的高度强调知识分子工作的战略性、基础性地位,指出“实践一再表明,一个政权的巩固,很大程度上要靠团结知识分子;一个政权的丢失也往往同失去知识分子的支持密切相关”^[24]。强调要从战略高度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习近平指出:“民主党派、无党派、民族、宗教、新的社会阶层、港澳台海外等各方面统一战线成员达数亿之多。可以肯定地说,只要把这么多人团结起来,我们就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增添强大力量。”^[25]

(二)从“最大工作”到“最大政治”:大统战构想的提出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曾引用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重要地位和作用的三句话,其中第三句话就是“统战工作是最大的工作”。而“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这是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反复强调的一句话。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还特别强调:统一战线的本质要求就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是人心和力量的问题,这是我们党必须花大心思下大气力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这就从全局站位和战略目标提出了大统战的构想。中共十九大提出“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

标和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统一战线将从爱国统一战线发展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战线,实现前所未有的大团结大联合,凝聚起磅礴力量。一方面,着眼于最大限度地调动积极因素,多做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工作。另一方面,着眼于更好地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研究和探索在更广领域和更大范围内化解消极因素。《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把“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扩展为“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者”,使统一战线包容多样性的半径更大,使统一战线达到空前的广泛性,画出了更大的同心圆。三是做深做实思想引领工作,广交深交党外朋友。习近平指出:“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好不好,要看交到的朋友多不多、合格不合格、够不够铁。多不多是数量问题,合格不合格、够不够铁是质量问题。特别是要交一些能说心里话的挚友诤友,想交到这样的朋友,不能做快餐,而是要做佛跳墙这样的功夫菜。”^[26]他还指出,做党外知识分子工作要分类施策,采取个性化的方法,充分尊重各个群体、各种组织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上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切实增强思想引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真正实现以心交友^[27]。

(三)全面深化改革:为放大统一战线格局提供理念思维

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符合国家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习近平多次指出,要最广泛凝聚改革共识,汇聚改革正能量。这要求我们必须做好解疑释惑、理顺情绪、化解矛盾的工作,为改革减少阻力、增加助力、形成合力,为改革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形成各方面理解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的良好局面。寻求最大公约数最初不是统一战线的理念,而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理念。早在2012年11月,刚刚担任总书记的习近平在广东调研全面深化改革时就指出,“把最大公约数找出来,在改革开放上形成聚焦,做事就能事半功倍”^[28]。这是我们渡过改革难关、啃硬骨头的一把金钥匙。由此可见,最大公约数是大统战的理念^[29]。经

济社会转型和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随着利益深度调整和诉求不断增强,网络意见多样化愈演愈烈。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强调“网上网下要形成同心圆”^[30],这从某种意义上赋予了统一战线在大陆范围内外的第三个范围——互联网虚拟空间,为做大统战工作格局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

(四)全面依法治国:为做实统一战线提供法理基础

中共十九大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把法治思维与统战理念相结合、相融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为标志,统一战线法规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2017年9月,《宗教事务条例》进行了重要修改后正式颁布实施。照顾同盟者利益是党的统一战线的一项光荣传统和政策优势,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尊重、维护、照顾同盟者的权益”^[31]。习近平总书记还要求,统一战线成员要深化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带动广大成员成为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32]。

(五)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的统一战线

中共十九大提出,我们党要实现伟大梦想、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建设伟大工程,必须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统一战线不仅是党的重要执政资源,也是党的领导方式、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离不开统一战线。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而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一方面,从本质上说,统一战线是党的重要领导方式;另一方面,从现实来看,

统一战线是党执政的战略资源和政治优势。由于当下共产党领导和执政是有机统一的,因此无论作为领导方式还是作为执政资源,都是党对统一战线领导权的集中体现;而从严治党和监察体制改革也为破解民主监督的难题提供了重要契机。统一战线不仅为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提供了广泛力量支持,也为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供了独特理念创新,进而也为提升党的领导能力、执政水平和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供了系列制度保证。

四、大统战目标:民族复兴与最大同心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统一战线有新的更高的要求。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指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指引现代化建设和实现民族复兴伟业,是谋划和做好面向“两个一百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总指针。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8 个“明确”、14 条基本方略以及 9 个方面的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为我们做好新形势下的统战工作明确了方向和要求。

(一)关于新时代统一战线的战略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从引用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重要地位作用的三句经典论述入手,阐明“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关系到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进而指出“统一战线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是人心和力量的问题,这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花大心思下大气力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33]。习近平的讲话蕴含了两层含义:一是统一战线在新时代绝非权宜之计而是重大战略问题;二是新时代统战工作是党的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绝非可有可无的“装饰品”,从而把我们党对统一战线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二)关于新时代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

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毫无疑问,这也应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必须坚持的根本指导思想。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行动纲领、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

(三)关于新时代统一战线的目标要求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两个阶段”“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使“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变得更加清晰更加现实。面对宏伟目标和艰巨任务,新时代统一战线必须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实现大团结大联合。《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明确指出,统一战线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者的联盟。统一战线的“同心圆”就是指这四者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实现大团结大联合。习近平说:“中国梦”是海内外同胞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34]以民族复兴“中国梦”为最大公约数,新时代统一战线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和包容性,凝聚起万众一心、众星拱月、齐心协力实现“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统一战线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化解矛盾、凝心聚力的内涵发生深刻变化:一是围绕中心的新定位。从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转化为以人民为中心,引导作为中等收入群体主体的统一战线成员坚持先富帮后富,就脱贫攻坚开展民主监督,推动社会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二是服务大局的新方向。从服务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转变为着力服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特别是服务于全党的大局,为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发挥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重要作用。三是化解矛盾的新重点。从出于增进团结促进社会和谐而化解

社会矛盾,转化为重点助推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着力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同时把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主要任务和重要责任,发挥在政党协商、政协协商、基层协商中的积极作用。四是凝心聚力的新优势。着眼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良政),实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壮大共同奋斗的力量,加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发挥他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

(四)关于新时代统一战线的理论体系

从“全面小康”到“推进现代化”:意蕴着四地融合、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统一战线将空前壮大发展。未来三十年间,我们要建设现代化国家,其本质是要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统一战线两个范围的联盟将达到空前的大团结大联合,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香港回归祖国20多年来,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取得较快增长,年均实际增长率达3.2%,远超西方主要国家。

新时代统一战线面临重大发展机遇和严峻挑战,也给统一战线提出了大团结大联合新的战略目标和使命要求。统战工作必须提高站位、着眼长远,对标“两个一百年”发展目标,及早作出战略谋划^[35]。一是在统一战线重要地位作用的认识上,要自觉将统战理念融入治国理政方略。二是在统一战线性质方面,要把“拥护和平发展的爱国者”纳入团结范围,以画出更大的同心圆。三是在统一战线范围对象方面,要特别关注新的就业模式和新的群体。特别是对不断发展的新阶层群体,要关注工作渠道和代表人士;要着眼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关注新农村建设和治理中新出现的群体和人士;要关注不断增多的在内地就业的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特别是高层次人才。四是在统一战线理念方面,要进一步将统一战线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发掘和运用好大统战理念。五是在五大关系各领域,各项方针政策都要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六是在统战工作方式手段上,要适应信息化的需求网上网下要形成同心圆。相

信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统战工作将不断走向常态化。

五、大统战理念:最大公约数与治国理政

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核心理念创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海纳百川、虚怀若谷的伟大胸襟和治国理政、凝聚人心的大统战思维。

(一)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科学把握了党治国理政的新理念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特别提出的政治底线、最大公约数和同心圆三个术语,有着独特的含义。他指出:政治底线不能动摇,“除此之外,对其他各种多样性,要尽可能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找到最大公约数。只要我们把政治底线这个圆心固守住,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36]这里已将统一战线理念提升和融入了党治国理政的大理念。

(二)最大公约数是习近平大统战理念的集中体现

中共十八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习近平审时度势,从战略高度提出要寻求各方面的最大公约数,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善于以最大公约数的思想方法研究问题、解决问题,聚合众力、融合众智”^[37]。这一思想涉及、贯穿内政外交和党的建设各领域、全过程。在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学习和把握这一重要方法论尤其具有深远意义。习近平关于最大公约数的论述是个思想体系,是以大团结大联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思维,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关于最大公约数的论述涉及实现中国梦、深化改革、法治建设和党的群众路线,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要在实践中深入学习、领会和贯彻习近平关于最大公约数的重要论述思想,以最大限度地求同存异、求同缩

异、求同化异,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三)政治底线与核心价值观体现统一战线中法治与德治相统一

习近平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38]。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道德是法律的基础,但法律是 60 分的道德;道德 100 分,但无刚性。因此,只有把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达到法安天下、德润人心。2017 年 4 月,中办、国办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旨在推动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让人民群众在每个案件中都看到公平正义,从而为正确价值导向的形成提供法制保障。在统战工作中,以法治与德治的有机结合推动阶层关系和谐尤为重要,非公经济人士守法诚信意识的增强、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也能破解一头热、效果不佳的瓶颈问题,它们的实现都有赖于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保持民族精神独立性的重要支撑,统一战线对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思想引领、资源丰富、人才荟萃的优势。和、合、善、义、根是统一战线五大关系的核心理念,能够为世界各国政府和政党处理内政外交问题提供重大方法论。应将统一战线核心理念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进一步提炼,推动入脑入心,进而外化于形。但另一方面,对于逾越政治底线的言行,“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不能让其以多样性的名义大行其道”^[39]。触犯法律底线的言行,还须以法治来规范。

(四)做好统战工作有利于深入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工程

统一战线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着手全面从严治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统战工作是党的特殊的群众工作,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

的重要讲话,通篇贯穿了群众路线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商民主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40]。统战工作与群众工作在很多方面相通:从对象看,统战工作是特殊的群众工作;从目标看,统战工作是做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工作;从方式看,统战工作是做民主协商、沟通引导的工作;从手段看,协调和处理利益关系是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的根本问题。统战工作全面贯彻群众路线,要广交深交党外朋友,要贴近基层、贴近群众、贴近成员、贴近矛盾开展统战工作,要着眼社会治理创新统战工作。

六、大统战内容:新型五大关系与中国道路、中国智慧

从爱国统一战线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统一战线,时代呼唤五大关系升级版。特别是新时代破解新矛盾使五大关系构建面临新的任务,综合国力竞争、角逐、较量使五大关系构建面临新的挑战,实现中国梦远景使五大关系构建面临新的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为构建新型五大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新时代五大关系内部发展变化为构建新型五大关系提供了实践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高瞻远瞩、见微知著、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地提出了要“发展充满活力的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增强民族凝聚力,形成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41]。进而提出完善新型政党制度、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和正确处理宗教领域的五对关系^[42]等等。这是五大关系理论的重大创新发展,为新型五大关系理论奠定了基础。

(一)新时代构建新型五大关系的基本内涵与目标取向

目标上要有更高的站位。要将五大关系核心理念上升为治国理政重要方法论加以总结运用推广。理念上要有更新的思维。习近平提出的“寻求最大公约数”,不仅给出了理念和目标,也提供了到达彼岸的“船”和“桥”,提供了破解复杂矛盾和棘手问题的方法论。内涵上要有更深入、精准、到

位、可行的表述。新时代新型五大关系的构建应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统领,新型五大关系应是尽责、有序、发展、融合、共享的五大关系。构建新型政党关系要充分彰显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构建新型民族关系要着力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共享的新型民族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提出新时代新型宗教关系的标准是积极健康,核心是处理好政教关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扩大党的执政基础这个根本,要致力促进宗教中国化和宗教工作法治化^[43]。构建新型阶层关系要致力于激发创业创新活力,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是构建新型阶层关系的重要基础和根本保证。构建新型海内外同胞关系要着眼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立足新时代、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十九大报告十分清晰地界定了中央与特别行政区、台湾与祖国大陆、内地人民与港澳台同胞之间的关系,在原有的“和谐”基础上增加了一国、宪制、法治、责任、共享、融合等理念。总之,新型五大关系既是各自利益共同体也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和价值共同体。统一战线要牢固树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理念,共同致力构建各担其责、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新型五大关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力量。

(二)新型五大关系与中国方案、中国道路、中国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的重大成就……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44]从统一战线来看,其与中国道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有着内生关联性,可以从中发挥积极作用,作出独特的贡献。第一,正确处理政党关系,提供民主政治和政党制度方案。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45]。因此,政党关系和政党制度既最具中国特色、中国智慧,也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第二,

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提供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即“八个坚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三,正确处理宗教关系,提供宗教中国化和宗教工作法治化方案。习近平指出,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第四,正确处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关系,提供市场经济方案。习近平总书记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商关系“亲”“清”的内涵,弘扬企业家精神,对促进非公经济领域“两个健康”具有重大意义。第五,正确处理阶层关系,提供社会治理方案。习近平强调要分类施策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促进阶层关系和谐^[46]。第六,正确处理海内外同胞关系,提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方案。习近平指出,“一国两制”是中国的一个伟大创举,是中国为国际社会解决类似问题提供的一个新思路新方案,是中华民族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的新贡献,凝结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国智慧^[47]。习近平深刻而精辟阐述了“一国”与“两制”的关系,强调必须把维护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48]。习近平强调以“中国梦”引领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并提出“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强调做好港澳台海外青年工作^[49]。习近平的这些讲话精神,构成了我们处理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大思维、大逻辑、大方针。

(三)构建新型五大关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建设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积极健康和谐的五大关系从中发挥积极作用,也必将推动新型五大关系的构建。第一,经济上的共享发展将促进各民族全面建成小康、基本实现现代化,促进两岸四地融合发展腾飞。在以“共有世界、共享发展”为理念的“一带一路”建设中,内地各地区各民族共同发展,

港澳台与大陆整合发展。第二,民主政治有序发展需要统一战线从中发挥独特功能作用。着眼现代化国家建设和“中国梦”,习近平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50]统一战线与我国一项根本政治制度和三项基本政治制度都紧密相关,可以为坚持、完善和发展这些制度作出贡献。第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认同对巩固和壮大统一战线至关重要,同时也要求统一战线为增强民族凝聚力作出积极贡献。第四,美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包括非公经济人士和新阶层人士在促进阶层和谐这个关键环节上能发挥主要作用。第五,着眼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统一战线要发挥聚心、聚智、聚力的功能作用。

(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有赖于新型五大关系的构建

统一战线在助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中,具有人才、网络、资源等优势,可以发挥独到的积极作用。如:在参与全球网络治理中统一战线所具有的人才、平台和技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统一战线所具有的资源 and 网络优势,都是得天独厚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51];要通过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打造相关各国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的“命运共同体”^[52]。这就为新阶层人士、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以及非公经济人士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契机,指明了新方向,提供了新的路径和方法,也将从一个全新角度积极促进新型五大关系的构建。

七、大统战格局:机制创新和队伍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对统一战线党内党外两支队伍和统战工作机制建设都提出了与时俱进的要求。要求我们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更远目标进行战略谋划,以创新的思维理念、路径渠道和方式方法,以更强的队伍、更加完善的体制机制、更大的格局作组织保障。

(一)充分发挥人民政协的统战团结功能

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的最大组织和平台。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指出,人民政协要发挥统一战线组织团结联谊功能,最大限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53]。要将人民政协的统战功能体现并渗透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各项事业中。

(二)创新新时代“五位一体”大统战工作方法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们党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特别强调增强政治领导本领,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方针落到实处。统一战线工作的方法论也必须在传承的前提下与时俱进、创新发展,打造与大统战相适应的新时代大统战工作方法论——“五位一体统战工作方法论”。五位:即要从理、利、文、法、情五个方面下功夫、做文章;一体:强调五字统分结合,每个字都有新的内涵,五者又有内在联系,把脉点穴、辩证施策,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五位一体大统战工作方法论中,利是基础,理是前提,文是根本,情是纽带,法是保障。

(三)紧扣“六域四环”切实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

党外代表人士是统一战线的重点,切实建设一支与新时代大统战格局相适应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可持续发展的组织保障。要按照习近平关于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要求,紧扣发现、培养、使用、管理四个环节,统筹推进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少数民族、宗教界、非公经济人士以及港澳台海外人士等“六支队伍”建设^[54]。习近平还明确指出:“党外代表人士工作的重点是科学使用、发挥作用,关键是加强培养、提高素质”;“领导能力是要经过不同层级、不同岗位、不同职务历练而成的。这是干部成长的规律,党内党外概莫能外”^[55]。这些论述无不彰显宽广的视野和宽阔的胸怀,我们要深刻领悟、切实践行,牢固树立“党外干部也是党的干部”、“使用是最好的培养”的大统战理念,特别注重对党外干部的历练,帮助他们“砥砺品格、增长才干”^[56]。

(四)建立健全新时代新型大统战工作格局和机制

有效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方法需要科学的工作机制来保障,新时代大统战工作必须主动应对统战工作网络、机制和功能建设等面临的新问题和新的挑战。要防止和破解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的基层统战工作边缘化、空心化问题,切实研究谋划乡村振兴战略视阈下基层统一战线工作的拓展创新。要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在建立健全党委领导、统战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参与的社会化大统战工作机制的基础上,着重构建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的吸引机制、统一战线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跨地区跨部门的工作协调机制等等。为有效避免和克服以往“大统战格局”中可能存在的“都管都不管”的现象,要全面构建适应打造新时代大统战工作格局和机制,包括建立和完善谋划发展机制、分工协作机制、沟通协调机制、共享交流机制等。

八、结语及延伸研究

新时代呼唤大统战。传统的“大统战”,主要是指工作格局的大统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把统一战线放到党的全局和战略问题上来研究、谋划和部署。习近平新时代大统战战略思维,紧扣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发展了关于统一战线属性和地位认识,拓展了统一战线的工作范围和对象,提出了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的总体思路,开启了统一战线工作法治化进程,具有超前的战略性、系统的整体性和鲜明的时代性,体现出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和新时代统情的深刻体认、对统一战线工作规律的精准把握、对实现民族复兴的责任担当。

习近平新时代大统战战略思维,深入研究具有综合性、全局性、长远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从党和国家战略、全局和长远的高度进行深层思考、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建设什么样的统一战线、怎样建设统一战线”这一重大历史课题。这一重要战略思维高瞻远瞩、总揽全局,把握了统战工作的发展趋势,提高了应对新形

势、新挑战的能力,牢牢掌握了统战工作的主动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创新成果,是做好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行动指南,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战略眼光和政治智慧,既“跳出统战谋划统战”,又反过来对新时代党和国家全局工作有着重要应用价值和借鉴作用。

(一)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关系彰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博大胸襟

这一重要论断集大目标、大战略、大气魄、大思维、大智慧于一体,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海纳百川、虚怀若谷的伟大胸襟和治国理政、凝聚人心的大手笔。体现的是容人之短、用人所长,绵绵用力、久久为功,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大统战,必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汇聚起磅礴力量。

(二)“寻求最大公约数”作为大统战理念具有广泛应用价值

最大公约数是习近平总书记“大统战”理念的集中体现和灵活运用,是当前化解矛盾、处理复杂问题、渡过改革难关、“啃硬骨头”的一把金钥匙^[57]。以协商民主为例,习近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58]习近平还指出,要发挥统一战线在协商民主中的积极作用^[59]。特别是基层协商民主,其主体是利益相关方的广大群众而非统战人士或统战身份,其目标是利益协调而非单纯的党外人士参政议政,但它与统一战线的核心理念高度契合——都是寻求最大公约数。这就是为什么不少地方党委政府把基层协商民主工作交由统战部牵头并取得成效的根本原因^[60]。

(三)新时代统一战线可以彰显中国方案和国际话语权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有赖于新型五大关系的构建。以政党制度为例,习近平曾提出构建充满活力的政党关系^[61],2018年3月又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但从国际范围看,政党关系也包括中国政党(包括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与世

界各国政党的关系。在 2017 年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指出:“不同国家的政党应该增进互信、加强沟通、密切协作,探索在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搭建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国际政党交流合作网络,汇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力量”^[62]。在阐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政党责任的同时,他还提出了许多政党政治与政党外交新理念,特别是提出建立新型政党关系三条原则的倡议,标志着当代中国政党外交进入新时代、达到新境界。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明确指出:民主党派通过参政议政,发挥反映社情民意、协调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开展对外交往的作用;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在港澳台海外统一战线工作中发挥作用。这就为今后以民主党派为主体开展政党外交、政党交流提供了空间,而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参与我国政党外交将大大提升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四)大统战理念和格局必将带来基层统一战线资源和大集聚和大爆发

随着经济社会转型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统一战线重心不断下移,基层统战工作日益重要。大统战理念和格局使基层治理特别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了重要依托和抓手。在这方面,一些地方基层已先行一步且初见成效,如:浙江省宁海县坚持“三个跳出”,有效构建新时代大统战工作格局。具体做法包括:坚持跳出部门抓统战,改变统战工作由统战部一家独抓的局面;坚持跳出统战抓统战,改变统战工作自拉自唱、自娱自乐的局面;坚持跳出区域抓统战,改变了统战资源、工作视野受区域限制的局面。中共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发[2018]1号文件强调要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63]。目前基层统一战线参与乡贤工作已经在浙江各地方兴未艾、蓬勃开展,成为整合、提升基层统战工作的重要载体。与此同时,乡村治理中很重要的内容是开展基层协商,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曾说

过“基层矛盾要用基层民主的办法来解决”^[64],基层统一战线参与基层协商在浙江等地曾取得显著成效^[65],这是大统战工作理念的灵活运用。大统战从机制格局向内容、方式延伸,从根本上破解了基层统战“空心化”“边缘化”的问题,必将带来基层统一战线资源和力量的大集聚和大爆发。

参考文献:

- [1] 杨卫敏.习近平总书记统一战线重要思想论纲[J].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5).
- [2] 习近平.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561-562.
- [3] 习近平.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562-563.
- [4]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N],2014-9-22(2).
- [5] 杨卫敏.论习近平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战略思维[J].统一战线学研究,2017(3).
- [6] 习近平治国理政关键词(39):新型政商关系?“亲”“清”在心?各有所遵[EB/OL]. <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805/c64094-28612626.html>,2016-08-05.
- [7] 习近平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讲话.“学习小组”微信公众号,2017-03-11.
- [8] 习近平.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268.
- [9] 习近平在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一行时的谈话[EB/OL]. http://www.gov.cn/jdhd/2013-02/25/content_2339371.htm,2013-02-25.
- [10] 杨卫敏.习近平关于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思想研究[J].观察与思考,2017(9).
- [11] 路璐.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概念的由来新探[J].统一战线学研究,2018(4):92-98.
- [12] 新型政党制度新在哪儿? 习近平总书记这么说[RB/O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lh/2018-03/05/c_1122486143.htm,2018-03-05.
- [13] 习近平.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264.
- [14] 习近平.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263.
- [15] 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3-03-

- 24(2).
- [16] 习近平.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265.
- [17] 2050年,中国将是什么样[N].环球时报,2017-10-19(7).
- [18]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http://www.china.com.cn/19da/2017-10/27/content_41805113.htm,2017-10-18.
- [19] 祝梅.马云.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企业家是生力军[EB/OL]. http://biz.zjol.com.cn/txzs/zsxw/201710/t20171019_5402761.shtml,2017-10-19.
- [2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借鉴历史经验创新合作理念让“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各国共同发展[N].人民日报,2016-05-01(1).
- [21] 习近平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加快西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N].人民日报,2015-08-26(1).
- [22] 习近平.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269.
- [23]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N].人民日报,2015-02-12(1).
- [24] 习近平.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265.
- [25] 习近平.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271.
- [26] 习近平.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262.
- [27] 习近平.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262.
- [28] 慎海雄.寻求推进改革开放的最大公约数[N].新华每日电讯,2013-01-11(1).
- [29] 杨卫敏.最大公约数是习近平大统战理念的集中体现和灵活应用[J].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3).
- [30] 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4-26(2);习近平出席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8-04-22(1).
- [31] 习近平.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561-562.
- [32] 征求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N].人民日报,2014-10-25(1).
- [33] 习近平.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262.
- [34] 习近平谈“中国梦”论述摘编[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11/15/c_127214244.htm,2014-11-15.
- [35] 杨卫敏.“两个一百年”视阈下统一战线发展战略前瞻[J].统一战线学研究,2018(1).
- [36] 习近平.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262.
- [37] 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寻求推进改革开放的最大公约数[N].人民日报,2015-1-11(1).
- [38] 习近平: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2/10/c_1120093133.htm,2016-12-10.
- [39] 习近平.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263.
- [40]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3-11-13(1).
- [41]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http://cpc.people.com.cn/n/2014/0906/c64093-25615123.html>,2014-09-05.
- [42] 党和政府与宗教的关系,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的关系,我国宗教与外国宗教的关系,不同宗教之间的关系.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2016年4月22日)上首次提出并论述。
- [43] 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全面提高新形势下宗教工作水平[N].人民日报,2016-04-24(1).
- [44]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6-07-02(2).
- [45] 新型政党制度新在哪儿? 习近平总书记这么说[EB/O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h/2018-03/05/c_1122486143.htm,2018-03-05.
- [46] 习近平.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265.
- [47] 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7-07-02(2).
- [48]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http://www.china.com.cn/19da/2017-10/27/content_41805113.htm,2017-10-18.
- [49] 习近平.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262.

- 版社, 2016:269.
- [50] 习近平. 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6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EB/OL].<http://cpc.people.com.cn/n/2014/0906/c64093-25615123.html>, 2014-09-05.
- [51] 吴楚, 李正穹. 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 习近平发来贺信 [EB/OL]. 2014-11-19.
- [52] 习近平提战略构想: “一带一路” 打开 “筑梦空间” [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4-08/11/c_1112013039.htm. 2014-08-11.
- [53]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4-09-22(2).
- [54] 杨卫敏. 习近平关于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思想研究 [J]. 观察与思考, 2017(9).
- [55] 习近平.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 [M].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271.
- [56] 习近平.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中) [M].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271.
- [57] 杨卫敏. 最大公约数是习近平 “大统战” 理念的集中体现和灵活运用 [J]. 重庆社会主义学院, 2015(3).
- [58]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4-09-22(2).
- [59]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作重要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3-11-13(1).
- [60] 浙江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主编. 基层协商民主案例 (70 例) [M]. 杭州出版社, 2015.
- [61] 习近平. 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6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EB/OL].<http://cpc.people.com.cn/n/2014/0906/c64093-25615123.html>, 2014-09-05.
- [62] 习近平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7-12-12(1).
- [63]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N]. 人民日报 2018-2-5(1).
- [64] 哲欣. 基层矛盾要用基层民主的办法来解决 [N]. 浙江日报, 2006-10-11(1).
- [65] 杨卫敏. 基层协商民主是我国协商民主建设的重中之重 [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4(5). 杨卫敏. 从温岭模式到浙江特色——浙江省各地探索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及启示 [J]. 观察与思考, 2016(7).

编辑: 蒋建忠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研究

——以河南为例

中共河南省委统战部课题组

摘要:为推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河南省委统战部组成联合调研组,开展了专题调研,深入了解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现状,指出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

关键词: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建议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9)01-00019-07

为推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河南省委统战部组成联合调研组,召开由党政领导干部、工商联和商会有关负责人、民营企业参加的座谈会,开展了专题调研,深入了解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现状、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

一、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正逐步构建

在2016年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民建、工商联界委员联组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用“亲”和“清”两个字精辟概括并系统阐释了新型政商关系。2017年,“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在2018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才是阳关大道”。两年多来,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深入学习宣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清”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亲”的氛围不断增强,

政商交往的新风尚、新气象正在形成。

(一)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积极推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河南省委通过召开民营经济发展大会、开展主题活动和制定出台相关政策等多种方式,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因地制宜、多措并举推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在2018年8月25日召开的全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大会上,省委书记王国生要求“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要具体化,立规矩、建机制,用制度和纪律划清边界,确保政商交往有道,公私界限分明。”陈润儿省长从三个方面为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提出了具体路径。2017年5月19日,省工商联与省纪委合作,举行全省“反对贿赂·公平竞争”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警示教育大会,坚持标本兼治、推进以案促教,进一步凝聚政商共识、优化政治生态、激发创业热

收稿日期:2019-1-28

课题组成员:李长川、程云、孙涛、雷震环。

注:本成果获2018年度全国统战理论政策研究创新成果一等奖。

情,助推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活动开展以来,收到了良好成效。2018 年以来,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孙守刚在郑州、驻马店、漯河等地市调研时,先后 6 次提到要明确政商关系定位,坚持正确引导、精准服务、勇于担当,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察委主任任正晓围绕“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赴郑州、许昌、新乡等地市多次开展专题调研,强调要准确把握新型政商关系的丰富内涵,切实做到“亲”的要求,坚决守好“清”的底线,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优化政治生态,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委、省政府出台的《关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实施意见》《河南省优化营商环境三年行动方案(2018—2020 年)》等政策文件,都对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提出了明确要求;省纪委草拟的《河南省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办法》,列明了政商交往的“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对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规范政商交往行为、建立容错纠错机制等内容作出了详细规定。

(二)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入,有效遏制权钱交易行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要求,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扭转了党风政风和政商交往风气,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生态和经济生态。省纪委持续开展为官不为问责活动,通过“点对点、人到人的清单式交办,对进度慢、不作为的重点项目实行督查问责,多名干部因为不作为受到处理。省检察院把规范执法行为、严明办案纪律作为服务民营企业的重要保障,坚持“六个严禁”:严禁越权办案,插手经济纠纷;严禁在民营企业入股,到民营企业吃拿卡要;严禁利用办案接受民营企业赞助和拉赞助费;严禁占用民营企业的通讯、交通工具等财产;严禁在民营企业报销各种费用;严禁插手工程招标等经济活动谋取私利。党政干部和企业家普遍反映,当前政商交往正在变得清白、透明,政商关系开始走上健康轨道。

(三)“放管服”改革扎实推进,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有所降低。按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要求,大幅度减少政府审批,全面清理规范各类行政许可,放更多的权给市场、企业,着力推进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推行“互联网+”“双随机、一公开”等新型监管模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持续抓好降本减负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着力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下功夫,清理、精简了一批涉及民间投资管理的行政审批事项和涉企收费,切实减轻了企业负担、降低了企业成本。郑州市工商登记注册前置审批事项从 262 项压缩到 32 项,商事制度改革两年来,全市市场主体增长的数量超过了改革开放前三十多年的总和。双凤鞋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说,公司的销售网点以前需要 2 个专人跑工商登记手续,现在不用了。旭日进出口公司负责人说,公司在 2000 年拿到进出口权,当时办证非常麻烦,现在实行备案制,企业很容易就能拿到资质。

(四)政府服务能力不断提高,企业营商环境有所改善。坚持把改善营商环境作为政府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工作来抓,推动政府管理职能由传统“监管型”向现代“服务型”转变,积极主动帮助民营企业办实事、解难题。按照“连、通、办”的要求,在整合平台、整合窗口、整合事项上加大工作力度,进一步规范了审批流程、便民服务、办结时限,为企业提供了快捷高效的政务服务。郑州市国税局有关负责人说,原来服务大厅的用户平均等待时间是 34 分钟,现在缩短到 6 分钟。新乡市牧野区招商局有关负责人说,以前招商的老三样法宝是土地、税收和扶持政策,现在变成了平台、环境和服务。

(五)企业诚信守法经营,政商关系呈现互动合作的良好局面。调研发现,民营企业通过诚信守法经营、履行社会责任,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郑州古玩城集团秉承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的宗旨办企业,打造良心品质,得到了客户认同,由于企业经济效益好,对周边经济带动

强,有几个区的区长、书记抢着给地、给政策,公司董事长说,把自己的企业做成行业标杆,还需要勾肩搭背、送钱行贿吗?新乡市原阳县宏达木业集团公司主动向政府申请,与五个贫困村达成共建协议,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安排其就业,对需要救助的贫困群众进行兜底救助。河南诚城集团在政府主导下创建了占地三平方公里的诚城社区,探索出一套“党的领导、企业支持、共驻共建、居民自治”四位一体的社区运行模式,被新乡市确定为“基层党建工作创新试点”和“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试点”。良好的政商关系和不断改善的投资环境,极大地激发了民营企业家人创新创业的活力,2017年,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达到2.9万亿元、占全省GDP的65%,民间投资达到3.4万亿元、占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的78.1%,民营企业上缴税金2674.7亿元、占全省税收的61.8%,吸纳新增就业130多万人、占全省的90%以上。

二、当前政商关系存在的突出问题

调研表明,受体制机制、发展程度、能力素质、思想观念等因素影响,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目前仍存在一些需要高度重视的突出问题。

(一)部分领导干部存在不作为不愿为不会为问题。调研发现,目前部分领导干部与民营企业打交道时,存在三类典型问题:一是不作为,有些人迫于反腐败的高压态势,不敢腐了、不能腐了,想着既然帮企业办事也没有好处可拿了,那还不如不干;有些人则认为干得越多受累越多、犯错几率越高,存在面临问责追责的风险,于是就想办法推诿扯皮、推卸责任。二是不愿为,有的认为只要和民营企业打交道就有可能被围猎,帮民营企业办事就会有嫌疑,因此不愿和企业多交往;有的认为廉政风险好把握,不伸手即可,行政风险不好把握,一旦出问题就要受处分、被追责,不如少干为妙。三是不会为,有些人不是不想“亲”,而是不会“亲”,老办法不能用,新办法不会用,不知道边界划定在哪里、服务提供在哪里、权力运用在哪里,陷入了思想僵化、知识老化、本领退化的窘境。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无利不起

早”、有的是推卸责任、有的是能力不足、有的是即使不作为也不会受追究。

(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没有完全形成,为以权谋私提供了滋生土壤。制度设计不够公开、公平和透明,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权钱交易提供了空间。从地市提供的材料来看,在行政审批、工程建设、土地开发、公共项目招投标、财政资金补贴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以权谋私的土壤并没有铲除,而且形式更为隐蔽。这种隐形变异的官商勾结行为在固定圈子内进行,难以发现,不易取证,一些人收受礼金由现金转变为微信红包或其他虚拟有价产品,还有企业为领导干部提供商品房买卖折扣。反腐败力度向基层传导不够,导致基层吃拿卡要的问题仍然存在。某食品公司负责人反映,前几年没有基层部门的各种检查,近两年逐渐多了起来,税务的、消防的、食品药品监督的,来了就挑毛病,狮子大张口要罚款,往往是千儿八百的打发走了完事,对这些问题调查取证有困难、办案成本高、震慑效应小,所以办案机关不愿意多费精力真管严管。基层执法人员自由裁量权过大,也是导致吃拿卡要的重要原因。以对偷税漏税罚款的自由裁量权为例,罚金可以掌握在偷漏税额的0.5倍到5倍之间,罚多罚少往往可以由基层执法人员自行掌握,这等于为基层吃拿卡要现象开了方便之门。

(三)落实“放管服”改革要求还不到位,部分企业仍需面对办事难问题。调研发现,一些政府部门简政放权,没有收费的事项都放了,有收费的事项都舍不得放。审批一个建设项目,主管房地产、土地、不动产的部门要分别测绘,3次测绘就意味着3次收费、多次跑路。有些中小企业反映办事难、办事烦依然存在,某家居公司负责人说,到办事大厅办理股权变更手续,去第一次说企业提供材料的第一页有问题,去第二次又说第二页有问题,最后找了熟人才办下来。要么就是找“黄牛党”,花1500元一天就办下来了,其实大家都知道“黄牛党”和办事大厅的人员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反复为难企业就是为了让企业去找“黄牛党”。

某集团负责人说,有的干部办事教条、认死理、效率低,用土话说叫“搬倒树逮死雀儿”,上级出台的许多好政策,到了“最后一公里”就是落实不下来。

(四)部分企业生产经营不够规范,为吃拿卡要行为提供了借口。调研发现,一些中小民营企业法律意识不强,自身管理存在问题,为吃拿卡要行为提供了借口。某商会负责人说,目前物业公司这个行业比较特殊,员工都是就业弱势群体,工资都是最低标准,而且 80% 的员工没有劳动保险,劳动监察大队一查一个准,如果找个理由吃拿卡要,企业只好自认倒霉、拿钱封口。再以税收专管员为例,如果一位税收专管员收取企业 500 元,对企业来说是小数,宁愿“破财免灾”,对税收专管员来说却是不小的数字,但是调查时,企业往往不愿配合,因为前一个税收专管员被逮了,再来一个不认识的,或许企业要缴更多税。

(五)部分企业仍热衷与领导干部拉关系,留恋利用潜规则办事的老套路。受官本位、爱面子等庸俗观念的影响,部分企业负责人仍把关系当做生产力,觉得和官员结交有面子,其中不少人还以此为荣。某部门工作人员说,中国是人情社会,河南更典型,很多企业还是认为“有关系好办事”“不办事拉拉关系也好”,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后,不能到外面吃饭了,一些企业觉得让领导在食堂和员工一起吃工作餐,面子上过不去,于是开始装修豪华食堂用以开展吃请活动。一些企业没有把腐败当做风险,而是当做机遇,还存在留恋和利用潜规则办事的倾向,讨厌别人拥有特权,自己却渴望获得特权。

(六)个别企业突破法律和道德底线,以权钱交易谋求非法利益。我国的民营企业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健全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创业之初,一些人发现送礼就能办成事,胆子越来越大,认为有钱就能摆平一切,唯利是图,想方设法开展权钱交易。某市纪委有关同志反映,在一些政商勾结案件中,存在个别蓄意围猎党员干部的老板,他们一般思想素质低,没有发展企业的能力,在调查中还比较顽固,百般抵赖、死不承认,指

望着出去后继续得到关照。另外,违纪违法成本低也难以抑制不法商人通过不正当政商关系谋求非法利益的冲动,在司法实践中,企业家只要配合调查、如实交代基本不会受到严厉处罚,行贿犯罪成本过低,纵容了企业的不法行为,甚至发生一个企业家在多个案件中屡次出现的情况。如某房地产公司老板曾经围猎 4 位高校领导,为企业谋利,最终这 4 位高校领导全部身陷囹圄。

三、当前政商关系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涉及政府与市场、权力与资本、党政领导干部与民营企业家的关系,受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结合对当前政商关系存在问题的分析来看,目前政商关系总体上正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但基础仍不牢固,权力寻租的土壤没有彻底铲除,构建新型政商关系依然任重道远。

(一)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体制还不健全。政府掌握权力,市场主体拥有资本,权力和资本的关系是政商关系的集中反映。调研表明,越是行政干预多、改革滞后的领域,政商关系就越容易被扭曲。一些领导干部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主流状况缺乏客观全面的认识,虽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持肯定态度,但在与民营企业 and 企业家打交道时却心存顾虑,在认识上还存在一些偏见,常常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民营企业,使各类市场主体不能平等使用生产要素。此外,由于某些地区和部门落实全面深化改革决策部署不到位,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一些领域没有理顺,职能权限界定不清晰,常常发生越位、错位、缺位等现象,没有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为少数领导干部以权谋利和少数企业家用资本获取非法利益提供了温床。当前,高度垄断领域和审批、管理、监督、处罚、资格认证等环节仍多发易发权力寻租问题。

(二)制约监督权力的笼子还需织密扎牢。英国著名政治理论家阿克顿在《自由与权力》一书中说到,“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大量官商勾结和钱权交易的案例说明,制约监督权力的笼子关得不紧、网眼不密,是政商交往

中出现违纪违法问题的重要原因。调研表明,近半数的领导干部和企业家认为对权力的制约监督仍然不够严密有效。结合驻部纪检组监督执纪问责工作实际来看,一方面是对同级的监督有待加强,党的十八大以来落马的高官,大都发生在其担任地方和部门一把手期间,究其原因,正是因为一把手权力过大、过于集中,控制太多资源,又缺乏有效监督,才成为被围猎的重点。对此,有的企业家也反映,“前几年企业要获得不当利益,搞定一把手就能搞定一切”。另一方面是对基层的监督不够严密,既存在对基层岗位廉政风险和腐败特点把握不准、摸底不清,进而导致监督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的问题,也存在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特别是第一种、第二种形态不够精准,进而出现监督滞后、被动式监督等问题。

(三)依法行政的要求没有落实到位。一些地区和行业政商关系畸形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依法行政的理念没有树立起来、依法行政的要求没有落实到位,导致法治规则被潜规则所替代,法律的尊严和制度的权威在潜规则面前变得软弱无力。调研发现,个别具备行政审批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在面对申请行政许可事项或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企业时,不是尽职尽责、尽心尽力为其做好服务,而是冷脸相对、消极怠慢,让企业知难而退,转而只有通过中介人层层打通关节,才能取得许可或审批;少数身居项目、规划、土地、资金等要素配置关键岗位的工作人员,接到企业的报卷,不是及时整理卷宗资料、发现缺项漏项、通知补充完善,然后报领导批复,而是搁置不看、压着不办,待申请人迫于资金压力、时间限制等客观条件倒逼之下,通过关系向其私下“汇报”后,才履行服务指导、协调办理等本职义务;一些窗口单位的工作人员,在向企业提供登记、过户、证照办理、资格确认等服务事项时,不是一次性告知所有应提交的材料,而是让其反复提交材料甚至不必要证明,企业不胜其烦之下,往往只好通过红顶中介、“黄牛党”等达到少跑腿、快办事的目的。

(四)对不作为不愿为不会为问题缺乏硬约

束。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政”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亲”的本质是服务,关键是敢于担当;“清”的本质是廉洁,关键是遵纪守法。一些领导干部和民营企业家在调研时反映,当前不作为、不愿为、不会为现象突出,主要表现为:把遵纪守法和干事创业对立起来,因为行为受限而不作为;考核、监督制度不健全,没有硬约束而不作为;以权寻租恶习未改,因为无利不起早而不作为;怕担责任、怕得罪人而不愿为;对新领域、新知识不熟悉、不了解,有心无力而不会为。上述这些问题,反映出有些地区和部门,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个区分开来”的要求时存在不积极、不主动、不具体、不细化等现象,没有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行业实际,对服务企业过程中的不同情况制定细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导致出现“清”而不“亲”、甚至为了保持“清”而刻意不“亲”的问题。究其根源,在于对不作为、不愿为、不会为等问题的问责追责标准不细、执行不严、力度不够。

(五)理想信念教育有待进一步加强。从领导干部方面来看,有些人平时不注重加强党性修养,忽视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导致出现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弱化、廉洁意识淡薄等问题,面对不法商人的围猎经不起诱惑,与他们结成吃吃喝喝的酒肉朋友、形成勾勾搭搭的权钱关系,以公谋私、以权谋利,一步步堕落为腐败分子。从民营企业负责人方面来看,有些人缺乏企业家精神,依法经营的意识淡薄,信奉“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舍得去花钱,什么事都能办得成”的庸俗法则,不是把精力放在创新创业和转型发展上,而是通过贿赂领导干部从中寻求特殊政策保护或特许经营权,借助公权力来获取非法利益。

四、加快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建议

(一)加强政企定期沟通联系制度。鼓励党政领导干部在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的基础上,主动真诚与企业家接触交往,结对子、面对面、听意见、解难题,建立真诚互信、清白纯洁、良性互动的工作关系。建立省市县三级党委、政府及其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联系非公有制企业制度,每位领导联系 1—3 家非公有制企业开展“直通车”服务,每半年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不少于 1 次、到所联系的企业调研走访不少于 1 次。建立企业工作日制度,各级政府主要领导定期召集相关部门对企业家反映的问题集中解决,由企业家对政府部门工作进行评议,评议结果纳入年终考核。完善非公有制企业防治腐败联系点制度,总结推广非公有制企业反腐倡廉建设的有效做法,强化典型示范效应,引导企业家崇尚市场规则,不靠关系靠实力,参与健康的市场竞争。

(二)建立企业诉求常态化受理反馈机制。探索建立保护企业家权益联席会议制度,建立完善协调处理机制,集中解决一批招商引资、征地拆迁、工程建设、行政执法等领域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典型问题。建立全省统一的企业维权服务平台,市、县政府成立企业家维权投诉服务中心,完善企业家维权投诉受理工作机制,畅通企业家投诉渠道。制定发布企业维护合法权益投诉指引,对于投诉侵害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举报,在 7 个工作日内给予书面答复。建立保障企业家合法权益诉讼“绿色通道”,各级人民法院对侵害企业家合法权益案件要依法做到快立快审、强化执行力度。广泛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加大法律援助力度,提高企业家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和能力。

(三)创新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对于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优秀企业家,可聘任为省政府参事或者各级政府经济顾问,参与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政策的研究。制定涉及企业利益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或者作出涉及企业重大利益的决策时,可通过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等形式,充分听取企业家意见。召开专题性、行业性会议时,邀请企业家代表参加或者列席。建立涉企政策集中公开制度和推送制度,强化涉企政策落实责任考核,充分吸收行业协会商会等第三方机构参与政策后评估,推动政策真正惠及广大企业。

(四)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以市场主体

需求为导向,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聚焦市场准入、企业开办、施工许可、要素供给、不动产登记、融资服务、法治保障等重点领域重点事项,全面压缩办理时限,提高服务效率,做好“放管服”改革涉及的规章、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强力推进“一网通办”前提下的“最多跑一次”改革,以“一口进、一码通、一网办”为目标,健全完善集中管理、统一受理、按责转办、统一督办、评价反馈、行政问责等工作机制,深入推进“三十五证合一”、多评合一、联合审验等审批服务方式,积极推广容缺受理、容缺办理、承诺制、登记制等便利化措施,推动实现企业办事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扇门”、现场办理“最多跑一次”。深化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改革,规范中间环节、中介组织行为,取消无法定依据的服务事项,加快推进中介服务机构与主管部门脱钩,对企业反映强烈的“红顶中介”问题进一步加大整治力度。

(五)推进市场监管规范化科学化。大力推行监管清单制度,明确和规范监管事项、依据、主体、权限、内容、方法、程序和处罚措施。建立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减少自由裁量权,严格执行处罚案件问责制。全面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制度,合理确定年度随机抽查的比例和频次,除被投诉举报的市场主体之外,一年内对同一市场主体的抽查原则上不超过 1 次。持续深化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积极推动跨部门联合执法,切实解决多头执法、重复执法问题。

(六)依纪依法整治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综合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加强对党政干部与非公有制企业负责人交往活动的监督,对交往中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依纪依法整治对非公有制企业及其负责人正当要求置若罔闻、对其合法权益不予保护等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行为,情节严重、造成不良影响的,依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问责规定,对相关责任人严肃追责问责;对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行贿受贿等违纪违法行为,依纪依法严肃查处。利用手机短信平台、微信、网络、信

函、电话等形式,畅通企业信访渠道并及时研究办理,属于本级办理的限时办结,需要上报的限时上报,不能办理的及时向企业反馈并做好解释工作。

(七)试点创设“亲清指数”评价指标。以制定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和开展营商环境第三方评价工作为契机,试点创设“亲清指数”评价指标。对照政商交往的“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结合各地经济发展实际及不同企业发展状况,制定切合地方实际与不同企业的具体政策措施,划定政商双方“为”与“不为”的界限,使双方进一步明晰该为什么、不该为什么以及如何为,并在此基础上科学设置精准细化的评价指标,重点评估各地各部门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实现程度,对其落实情况进行定期督查和总结评价,切实增强政商双方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压力与动力,推动解决做与不做一个样、做多做少一个样、做好做坏一个样等问题。

(八)提升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深入实施党建工作“全覆盖”,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优势在企业发展壮大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教育引导民营企业家自觉拥护党的领导,培养发展符合条件的企业家加入党组织,努力实现职工50人以上的企业有党员、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的企业实现党的组织全覆盖、条件暂不具备尚未建立党组织的企业实现党的工作全覆盖的目标。以党建强、发展强为目标,按照生产经营好、企业文化好、劳动关系好、党组织班子好、党员队伍好、社会评价好的标准,广泛开展“双强六好”党组织创建活动和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党员公开承诺活动。对于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工作经费,可以通过纳入企业管理费用、党费拨返、财政支持等渠道予以解决;对于党建经费不超过职工年度工资薪金总额1%的部分,可据实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按照有场所、有设施、有标志、有党旗、有书报、有制度“六有”的标准,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活动场所规范化建设。将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纳入各级党委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作为市县党委书记履行党建工作责任制专项述职和相关部门领导班子考核评价的

重要内容。

(九)引导民营企业家做爱国诚信、遵纪守法的表率。积极引导企业家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and 党的十九大精神,树立崇高理想信念,切实做到爱国诚信、遵纪守法。持续深化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政商关系反面案例剖析和警示教育,使企业家充分认识到遵纪守法才是企业发展壮大最有力的保障,坚决抵制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行为,自觉做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忠实实践者和积极推动者。扎实推进非公有制企业廉洁风险防控,引导企业加强内部监督管理,坚持依法经营,信守廉洁承诺,强化行业自律,培育廉洁文化。加快推动企业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品创新和模式创新,着力培育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竞争新优势,由靠关系发展转变为靠实力说话。严格执行中央关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安排的有关规定,坚持“三强一好”标准和“凡进必评”原则,始终把政治表现放在首位,进一步规范提名、严格程序、坚持公开公正,严守换届纪律,严禁利益输送。

(十)营造诚实守信的信用环境。树立“信用是新的生产要素”的理念。从依法行政方面来说,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应深刻认识到信用作为基础性执政资源的重要性,坚决破除“新官不理旧账”“后任不守前诺”等问题,大力弘扬契约精神,为全社会树立重合同守信用的标杆。从规范企业经营行为方面来说,要以健全企业家诚信经营激励约束机制为引领,着力推进企业诚信评价体系建设,整合企业及企业家信息,建立企业家个人信用记录和诚信档案,坚持完善“红黑榜”发布制度,实施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对于诚信经营、廉洁记录良好的企业予以表彰、鼓励和扶持,使其一处守信、处处受益;对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有行贿记录的企业,依法依规限制其在申请贷款、工程招标等方面的经济活动,在一定期限内取消该企业负责人获得政治荣誉或给予政治安排的资格,使其一处失信、处处受制。

编辑:王芳

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思考

——以台州市黄岩区为例

潘禹斌 王功田

摘 要:基层协商民主是实现党在基层领导和基层管理现代化的重要形式,对于倡导共性利益、维护社会稳定、降低执政成本等有重要促进作用。针对当前开展基层协商民主存在的问题,统战部应发挥自身独特优势,主动牵头主导,把握内在规律,做好顶层设计,推行“三制五环”法,发挥基层协商民主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

关键词:基层协商民主;统一战线;“三制五环”法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672-3163(2019)01-00026-05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 65 周年讲话时强调,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点。人民群众来自基层、生活在基层,可见基层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基层就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开展协商,是人民当家作主具体、现实的体现。

一、开展基层协商民主的重要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基层是“众人”实现人民民主的主阵地,开展基层协商民主,无论对人民群众实现自身利益,还是对基层党委政府推动现代化治理等,都有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促进社会整合,倡导共性利益。

“基层民主协商是把不同个体利益通过理性协商、讨论加以整合,以共同利益最大化为目标……”^[1]通过基层协商民主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个人利益诉求的狭隘性,引导利益主体高站位、多角度审视公共利益,并最终形成观点、行为的整合,促进民众之间的相互理解,激发彼此的共性感受,引导共性行为。基层协商民主注重理性说服,党委政府与民众开诚布公,领导与百姓将心比心,能够产生较为公正的决策,促成共性利益产生。

(二)有利于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平等是基层协商民主运行和发展的前提。”^[2]基层协商民主以平等为原则,以妥协为手段,以达成共识为目的。通过此种方式,使得党委的决策、政府的施政从强制走向协商,从说教走向对话。毛泽东

收稿日期:2018-08-30

作者简介:潘禹斌,中共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功田,中共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委统战部干部。

曾说过我们的政府是“商量政府”，政府就热点、难点问题和百姓协商，“公民通过自由而平等的对话、讨论、审议等方式，参与公共决策和政治生活。”^[9]这种方式可以有效解决或避免政府与民众的矛盾纠纷。

(三)有利于提升决策质量,降低执政成本。基层协商民主服务现代化管理,为社会治理夯实基础、凝聚力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大事要事,在基层群众中有针对性地开展协商,既是发扬民主、群策群力的方式,也是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过程,更是科学决策、提升效率的手段。通过民主协商,一方面促进党委出台的政策更具科学性,另一方面民众对符合共性利益的政策会自愿服从并推动实施,这些都助推了基层党委政府的高效执政。

二、开展基层协商民主由统战部主导的依据

统一战线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和基层协商民主平等、包容的特性一脉相承,由统一战线主导开展基层协商民主是历史所选、时代所需、形势所趋。

(一)历史渊源由来已久。从我国的现代史看,统一战线和协商民主的亲密关系由来已久。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建立了“三三制”政权,这种崭新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开启了共产党和党外人士协商合作的先河。新中国成立前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国协商民主的伟大成果。新中国成立时,宋庆龄、李济深、张澜3位党外人士担任国家副主席,把协商合作提升到新的高度。之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党外人士召开的双周座谈会、协商座谈会、最高国务会等都是行之有效的民主协商形式。

(二)价值取向高度契合。人员的多元化、理念的一致性统一战线求同存异的基本原则和特征,这种多元化与一致性的辩证统一与基层协商民主“在平等对话的前提下理性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寻求最大公约数,最终达成某种共识”,^[10]即多元化主体的利益交汇点基本一致,具体表现为两者在理论理念上的一致性,在内容选择

上的相似性,在功能实现上的互益性,可以说基层协商民主就是统一战线民主的第二会场。

(三)独特优势得天独厚。一是资源优势。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非公经济人士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大量涌现。随着城市化脚步加快,统一战线不断向乡级层面延伸,为推动基层协商民主提供了重要社会资源。二是渠道优势。统一战线具有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渠道优势,并形成了四通八达的联系渠道,通过多种协商形式,畅通了社会各界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为基层协商民主提供了平台渠道。三是制度优势。中共中央及各级党委制定的关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为保障规范化开展基层协商民主、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建立健全协商成果转化机制提供了借鉴。

(四)多方共赢助推发展。开展基层协商民主,畅通了基层群众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增强了基层统一战线的凝聚力、向心力,同时有利于发现培养更多的党外人士,并纳入统一战线,进而充实、壮大统一战线。开展基层协商民主,建立各行业领域精英分子参与的议事组织,深入开展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充实了基层统战职能。开展基层协商民主,有效地将统一战线的理念贯彻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之中,强化了基层统一战线服务中心工作的作为,必将提升统战部门在党委的地位。

三、开展基层协商民主的黄岩实践

黄岩通过试点先行、示范引领、点面结合、整体推进,探索出了由党委领导、统战部门牵头,以统一战线成员为主体、各界人士参与,以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和“四公一热”问题为议题,以“三制五环”法为主要形式,以发挥民众主人翁精神、实现在日常政治生活中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为立足点,以凝聚全社会力量助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目的的基层协商民主形式。

自2013年4月开始,黄岩在2个省级重点镇开展基层协商民主试点工作,期间,在全省率先以县级党委名义出台了《关于推进统一战线领域协

商民主制度建设的实施意见》，制定了《黄岩区基层协商民主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试行)》，成立了由区委副书记任组长，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任副组长的区级基层协商民主工作领导小组。乡镇街道出台对应文件，并建立以副书记为组长，组织委员和统战委员为副组长的协商民主工作领导小组。2017年5月，黄岩召开了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现场会，总结试点期间好的做法和经验，通过统一部署，采用“三制五环”法，由统战部门牵头，在全区所有乡镇街道开展协商民主工作。2017年下半年，全区成立了19家协商民主议事委员会，吸收各行业领域818名精英分子加入，其中以民主党派成员、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等为主的党外人员515人，占63%。2017年7月至2018年6月，全区共召开协商民主议事会议76次，议事员2000多人次参与协商，提出意见建议600多条，被采纳落实400多条。期间，民主党派、统战团体、“统战智库”等专家100多人次参加基层协商民主议事会议，提出专业意见建议200多条。

黄岩区各乡镇街道开展协商民主以来，很多工作取得了意外的惊喜，如宁溪“二月二”灯会的创新性恢复发展。宁溪“二月二”灯会始于南宋，至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曾有楹联“六街花灯光铺地，八宅鼓乐音盖天”描写其盛况，是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8年前因各种因素暂停了此项活动。2017年12月，宁溪镇党委采纳了该镇协商民主议事会的意见，决定于2018年恢复举办“二月二”灯会。在2个月不到的时间里，镇党委政府和议事员同心协力，在保留传统习俗的基础上创新灯会活动形式，打造了宁溪镇“灯彩古镇焕新颜，五光十色点春夜”的盛景，并以灯会带动第三产业全面提升，吸引了130多万游客，促成该镇居民农副产品、服务业收入超5000万元，同比增长400%以上。除了宁溪“二月二”灯会外，澄江街道创建中国黄岩蜜橘观光园3A景区、东城街道老城区改造、平田乡发展西部旅游等难题，议事员都提出了好的意见建议，均被当地党委政府采纳，相关工作

正有序推进。

四、开展基层协商民主存在的问题

基层协商民主作为新兴事物已经展现了其重要价值，但也在实施过程中显露出不可忽视的问题，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一)顶层设计缺乏。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在宏观上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进行阐述，对包括基层协商民主在内的7种协商方式作简要介绍。浙江省的基层协商民主走在全国前列，开展了一系列试点工作，积累了优秀的经验，但还未有效整合、出台制度，对规范、合理、有序开展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缺少切实可行的指导性意见。

(二)思想认识不到位。一些基层党政领导认为开展基层协商民主工作程序复杂，影响了党委政府的工作效率；不愿意把党委政府中心工作作为议题进行协商；组建协商队伍偏向选择“听话”的人员；开展协商活动较随意，对协商成果视而不见，有些还存在“代民做主”的做法。

(三)规律把握不透彻。任何事物都有其规律，只有找到规律、认识规律、遵循规律、利用规律，才能高效地开展工作。基层协商民主建设还处于探索阶段，一些决策者、实施者、参与者还没有把握好内在规律，对开展基层协商民主的方式、方法不熟悉，只是局限于统战部门推动，局限于在统一战线开展，进入了封闭式循环。

(四)主体发挥不充分。地方党委政府在基层协商民主中既是组织者又是参与者还是决策者，导致协商主体间存在不平等现象。一些弱势群体如农民、农民工等，“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他们的利益诉求在基层协商民主中表达得不够充分”。^[5]协商主体参与基层协商民主是兼职工作，时间的局限、人员难安排、被调研单位的消极配合等因素对开展工作有很大影响，导致协商与决策之间的脱节和不连续。

(五)决策与协商不衔接。一般认为公共政策过程主要包括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终结和监督5方面，对基层党委政府而言，即做什么不做什

么、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怎么做和做得怎么样的问题,这些环节、问题都需要来自党政以外的协商参与。因为评价机制、监督机制的缺失或不健全,有些基层党委政府只在临近决策时才搞协商,难免出现走形式的情况,这种协商本身就少价值、无意义,导致党政决策程序和基层协商民主匹配度不高。

五、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对策建议

开展基层协商民主主要由统战部门主导,要把握其内在规律,要注重制度化建设,要能解决实际问题,只有有效的基层协商民主才是党委政府需要的、人民群众满意的。

(一)在党的领导下,由统战部主导开展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协商民主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的。县级开展基层协商民主应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由党委统一领导、总揽全局、把握方向。统一战线在基层协商民主建设中具有独特的优势,统战部门是党委统筹统一战线工作的职能部门,主导基层协商民主是历史所趋、形势所导、职责所在。县级统战部门应解放思想、勇于担当,以构建大统战格局的理念抓基层协商民主,即运用统一战线理论理念、价值取向、渠道平台、程序规则,引领党内外、社会各界人士参与。

(二)把握内在规律,切实解决好5W问题

开展基层协商民主建设要解决好5W问题,既WHO(与谁协商)、WHERE(在哪协商)、WHEN(何时协商)、WHAT(协商什么)、WHO(谁落实协商成果)。

WHO(与谁协商):乡一级应建立协商民主议事委员会(简称“议事会”),议事会是党领导的具有代表性、包容性、统战性的组织。议事员主要由辖区内“两代表一委员”、村居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乡贤和各界人士中代表组成,按照思想素质好、群众基础好、议事能力强的要求,由党委聘任。合理控制人数和党内外比例,议事会主任一般由体制外人员担任。黄岩为进一步扩大协商参与主体的范围,采取了“3+x”的协商模式,即在乡一级党委政府、议事员、对口联系的党派团体作为固定主

体的基础上,视议题的相关性,邀请“统战智库”专家、相关部门领导、村民代表、议题相关当事人等共同参与。

WHERE(在哪协商):开展基层协商民主主要营造氛围,要有特定场所,要根据议题选择场所。乡镇街道应为议事员建立“同心之家”,为他们提供座谈、会友、谈心的温馨场所;创建民主议事厅,通过制定议事制度、协商制度、考察制度等,促进协商议事活动规范化开展。另外,根据议题的特殊性,可以把会场设在农场之中、田野之上、街道之旁……议题在哪里,协商就在哪里进行。

WHEN(何时协商):基层协商民主的特色、重点、价值都在协商,开展基层协商民主应在决策作出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在决策作出之前协商是帮助党委政府科学决策和促进决策科学,在决策实施之中协商是帮助党委政府决策有效落实并对决策的实施过程进行民主监督。

WHAT(协商什么):党的十九报告指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重点把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四公一热”问题(重大公共决策、公共事务、公共利益、公益事业和民生热点难点问题)纳入协商范围。

WHO(谁落实协商成果):开展基层协商民主要求乡镇街道党委作为决策者对议事员的意见建议作出是否采纳的决策,对采纳的意见建议落实相关部门具体负责,相关部门要适时向议事会、相关议事员通报,并接受监督。

(三)做好顶层设计,推行“三制五环”法

为制度化开展基层协商民主,县级党委应出台相关指导意见,如黄岩制定的《关于全面推进乡镇街道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以顶层设计方式明确了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创新推行“三制五环”法(“三制”就是规范组织机制、优化运行机制、创新保障机制,“五环”就是选题、准备、协商、交办、反馈五个关键环节),真正使基层协商民主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1.规范组织机制。一是建立由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乡镇街道组织实施的基层

协商民主工作机制。二是建立县乡两级协商民主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开展协商民主具体工作。三是搭建协商平台,建立学习培训、建言献策、协商议事、调研考察、社会服务等制度,确保议事会日常工作有序、有效开展。

2. 优化运行机制。重点把握以下五个关键环节:选题环节:议事员根据基层党委政府年度中心工作,围绕“四公一热”问题提出议题建议,经乡镇街道协商民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审核,最后由党委(党工委)审定。准备环节:乡镇街道应提前 10 天左右将议题的相关材料送达议事员,以便早作准备,做到协商有理、有节、有据,切实提高协商议事会议的质量。协商环节:采取一事一议的形式,由乡镇街道党委(党工委)主持召开,总体上按照“议题通报——座谈交流——专家指导——归纳总结”的程序进行。交办环节:会后 3 个工作日内专人对议事员的意见建议进行分类梳理,提出交办建议方案,报主要领导审定后,填写《协商议事交办单》交相关部门。反馈环节:相关职能部门就《协商议事交办单》内容在 15 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提出工作方案,对未采纳的意见建议以适当方式予以反馈说明。

3. 创新保障机制。一是深化对口联系制度。县级统战部门可建立民主党派、统战团体联系乡镇街道参与协商民主的相关制度,乡镇街道开展协商民主应主动邀请对口联系的民主党派、统战团体负责人、专家参与,听取他们的指导意见;民主党派、统战团体应高度重视、积极协助乡镇街道开展协商民主建设,视议题挑选专家组建调研组,实地考察,深入调研,撰写调研报告,在协商民主议事会上作专题发言。二是建立“统战智库”。县级统战部按照专业层次高、社会视野宽、建言能力强的标准,在统一战线遴选优秀党外干部、党派团体专家、非公经济代表人士等建立“统战智库”。视具体协商议题,由县委统战部门选派“统战智库”中的有关专家参与协商议事活动,为破解重点难点问

题建言支招。三是促进协商成果转化。建立议事员监督制度、部门限时办理机制等,重视协商成果的实效性,通过制度保障落实。对协商民主成果转化过程进行监督,对出现的分歧进行二度协商,通过监督推动落实。通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基层协商民主开展综合评级,将“软任务”变成“硬指标”,通过考核实现落实。

(四)落实基本保障,营造民主协商氛围

一是争取物质保障。“开展基层协商民主主要积极争取基层协商民主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的配合,要争取县乡两级党委政府在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的支持。二是实施精准培训。把议事员培训纳入统一战线培训计划,不断增强议事员的民主意识,提升他们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三是发挥联动作用。黄岩的做法是成立了社会组织代表人士联谊会,吸收当地优秀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参加,把社会组织的公益性、民间性、广泛性和统一战线的政治性相结合,以点带面吸引更多社会组织成员和社会组织涉及行业领域人员参与基层协商民主,实现联动。四是增强协商意识。统战部门应加强做好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宣传工作,吸引更多群众参与基层协商民主,引导更多统战成员在基层协商民主中发挥主角作用,营造全社会支持、参与的基层民主协商良好氛围。

参考文献:

- [1] 何保东.以统一战线推动基层协商民主发展[J].山西青年,2017(12):174.
- [2] 靳冬玲、车庆芳.统一战线视阈下的基层协商民主研究[J].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9):46.
- [3] 俞可平.协商民主: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N].学习时报,2006-11-06.
- [4] 任中平、王菲.基层协商民主的经验、价值与启示[J].党政研究,2015(4):82.
- [5] 靳冬玲、车庆芳.统一战线视阈下的基层协商民主研究[J].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9):46.

编辑:龚万达

争取话语权与多党合作制度效能的关系研究

刘菊香

摘要:在新时代,全球化态势下我国争取制度话语权亟待多党合作制度效能的提升,转型时期中国政治话语体系构建迫切需要多党合作制度效能的提升,多党合作制度自身话语体系构建需要多党合作制度效能的提升。多党合作制度效能与争取话语权具有正相关关系:历史实践证明多党合作制度效能是争取话语权的基础,改革开放现实成就说明多党合作制度效能是争取话语权的重要抓手,争取多党合作话语权是多党合作制度效能追求的目标,争取多党合作话语权有利于增进多党合作制度效能发挥,并由此形成多党合作制度效能影响多党合作制度话语权的基本逻辑,即效能——话语理论体系——话语权。

关键词:话语权;多党合作制度;关系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9)01-00031-06

多党合作制度面临的一个重大国际压力就是西方国家对政党制度理论话语权和解释权的垄断,打破西方国家对政党政治理论话语权和解释权的垄断是我国政党理论和政治理论研究的重要任务。多党合作制度效能与争取多党合作制度话语权具有正相关关系,两者相互促进、互为补充,这为新时代我国在话语权视角下提升多党合作制度效能提供了理论基点。

一、历史实践证明多党合作制度效能是争取话语权的基础

制度自信源于历史实践经验。一个国家选择建立什么样的政党制度和政治模式通常是由这个国家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国情决定的。周恩来

就曾指出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不取决于任何政党或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由客观的历史发展所决定的,是从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1]。正是因为两党制和多党制适应了西方社会对立法、行政、司法这“三权分立”的要求,适应了西方社会对竞争性民主的追求,所以两党制和多党制在西方社会展现出优于封建制度的极大效能,经过400多年的发展和完善在世界上取得强势话语权。正如克林顿所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美国,没有政治就没有民主,没有政党就没有政治。”^[2]同理,多党合作制度要争取到话语权必须以多党合作制度效能的充分发挥为基础,这在我国选择政党制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已初步被证明。

收稿日期:2018-10-24

作者简介:刘菊香(1976-),女,广西社会主义学院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与参政党建设理论。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ZK20170205)阶段性研究成果。

近代以来,随着封建王朝的没落,无数仁人志士在黑暗中苦苦探索和追求建立什么样的政党政治来实现救亡图存,赢得国人的认同和重获在世界上的话语权。近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与选择什么样的政党制度模式相伴随的。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诞生,开启了我国的政党政治历程。受欧风美雨的影响,资产阶级革命派希望能将西方的多党制照搬到我国实现民族复兴,因而民国初年一时之间产生了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形形色色的各类政党,曾多达300多个。辛亥革命后,通过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起内阁制,在1912年进行了近代第一次内阁竞选,结果国民党以392席胜出取得组阁资格。但就在选举结果出来不久、国民党还未来得及组阁,极力主张多党竞选的国民党主力成员宋教仁就遭到了暗杀,袁世凯更是在随后公开复辟帝制,直接宣告多党制探索的失败。经历了短暂多党制探索的失败后,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共产国际向中国政党伸出了援手,孙中山于是接受了共产国际援手并尝试与中国共产党展开党内合作,对国民党进行改组,于是在1924年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启了我国历史第一次国共合作,迈出了政党合作的第一步。令人遗憾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展不久,孙中山于1925年逝世,蒋介石趁机夺得对国民党的领导权,随即背离孙中山的政党合作路线,进行整理党务和“清党”,将第一次国共合作民主政治道路引上国民党一党专制轨道,从而导致这一次有益的政党合作探索与尝试被迫中断。1937年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国民党在推行一党独裁专制的过程中也不得不顺应当时的抗战大趋势,与中国共产党再次合作,再一次在我国开展政党合作的实践。也正是在国共两党的对峙与合作中,产生了想调停国共矛盾、走“第三条道路”的各民主党派,这些民主党派主张的“反帝爱国、追求民主”等与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可以说不谋而合,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因而越走越近,谱写了诸多团结合作的佳话和美传,结下了难解的友谊。正因为如此,各民主党派才在1948年中

共发布“五一”口号时积极响应,主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实践。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正式由实践上升为一种制度。新中国成立后虽历经波折,但这一制度经过“反右”和“文革”十年的艰难支撑最终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正是随着改革开放后多党合作制度的不断完善,其效能的不断提升,专门的政党制度研究中心如中国人民大学当代中国政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政党研究中心、中央社院政党制度研究中心、重庆多党合作历史研究中心等纷纷成立,学术理论界开始探索构建多党合作制度话语体系”^[3]。因此,多党合作制度的历史实践证明,近代以来我们选择政党制度的实践过程为我们争取多党合作制度话语权夯实了基础。

二、改革开放现实成就说明多党合作制度效能是争取话语权的重要抓手

制度自信源于实践检验。毛泽东曾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4]。实践出真知,我们国家之所以能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个一贫如洗的国家迅速站稳脚跟,并在改革开放以后迅速崛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选择了各民主党派与中共戮力同心的多党合作制度,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提到,“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5]。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再一次强调,“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植根于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鲜明特色”^[6]。从我国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可以看出,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已显示出其独特的优势,其发挥出的效能已成为我国争取国际地位、争取话语权特别是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抓手。江泽民提出衡量政党制度的“五个有利于”标准已经受住了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时间检验,已被我国的现实成就充分证明,具体表现为“民众参与的有序性、社会的稳定性和政府的高效率等”

[7]。

多党合作制度为民众有序地参与政治提供了机会。1949年多党合作制度确立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合法地进入各级政府担任重要职务是民众有序参与政治的重要表现。如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中,在国家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务院各部中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所占的比重均在50%左右。此后,民众通过这一途径有序参与政治的比重虽有所下降,但这一途径在改革开放后一直在加强,如2013年“两会”结束后,13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有5位是党外人士,比重达38%;23位全国政协副主席中有8位是党外人士,比重为34.7%^[8]。2015年《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颁布后,各级政府党外人士所占的比重更是有所加强。与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相比,多党合作制度的又一优势体现在社会稳定上。多党合作制度既摒弃了两党制和多党制因竞争和冲突带来的政局动荡、社会不稳定,又避免了一党制因缺乏竞争和监督带来的僵化和权力滥用问题。如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对世界政党秩序作了一个定量分析,1945年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80个,其中一党制26个,发生政变的6个,占25%,一党居优制的16个,政变的7个,占44%,多党制的20个,发生政变的17个,占85%^[9]。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优势就体现在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政局的稳定性上。多党合作制度的第三个优势还体现在政府的高效率上,我国无论是面对全球的金融风暴,还是应对地震、冰灾等自然灾害,都能高效地从容应对,这都说明了多党合作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有力的证明多党合作制度效能为构建多党合作制度的话语权提供了自信和支撑,是重要的抓手。

三、争取多党合作话语权是多党合作制度效能追求的目标

争取我国多党合作话语权首先必须构建多党合作制度话语体系,向世人准确展示其功能定位

及效能目标。多党合作制度追求的效能目标是多党合作各主体所追求达到的目的结果或所要完成的目标任务,课题组认为,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效能追求的目标可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从宏观层面看,我国多党合作制度追寻的理想状态是提升国内民众的认同度与获得国际上的话语权,概而言之就是获得国内、国外的话语权。“构建多党合作制度国际话语权的实质就是一场争夺民主话语权的意识形态斗争”^[10],显而易见,争取多党合作话语权就是多党合作制度效能追寻目标的题中应有之义。从中观层面看,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在政治上的目标就是通过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来展示多党合作制度的优势和特征。从微观层面来看,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五大功能之一就是民主监督,这是多党合作框架内各民主党派与中共共同的目标追求。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以“追求民主、反帝爱国”为己任,新中国成立以后又以《共同纲领》为纲与中国共产党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改革开放新时期更是通过履行民主监督职能共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而努力。由此可见,无论从多党合作制度追寻的宏观目标,还是从其中观、微观目标来看,可以说是以社会主义民主为载体“积极应对西方的和平演变、打破西方强势话语霸权的压制、寻求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合法性”^[11]。多党合作制度效能追求的目标就是通过解决民主这个全世界的共同性难题来为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如何言说多党合作制度的民主声音,如何讲述中国政党模式,只要多党合作制度效能所追求的目标得以实现,中国人应该是最有制度自信、最有发言权的。因为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是结合中国具体国情与实际、结合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开出的一味“良药”,既具有一党制的稳定高效性,也具有多党制监督制约性,是一种对世界政党制度的取长补短、整合创新。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既具有空前的包容性、广泛有序的政治参与、尊重多数兼顾少数的优势,又能通过合作性的民主监督使

中共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及时发现错误、及时修正方案,保证政策的接续和社会的稳定。正如 2015 年出台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所指出的,包括政党协商在内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有利于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更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有利于促进科学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利于化解矛盾冲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有利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有利于发挥我国政治制度优越性,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12]。由此可见,多党合作制度发展到今天,其追求体现的社会主义民主的目标正在实践中绽放出绚丽花朵,将为世界提供政党制度的方案,争取应有的国际话语权。

四、争取多党合作话语权有利于增进多党合作制度效能发挥

话语权与制度效能关系密切,虽然制度话语权不是增进制度效能的必然条件,但却是非常重要的有利条件。从世界历史发展来看,西方国家的民主模式和政党制度之所以能在“二战”后通过几波民主化浪潮迅速席卷和影响七大洲的大部分国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拥有强势的制度话语权,就在于其较完善的话语体系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民众的认同。目前,我国政党制度话语权仍处于“话语逆差”“被动跟从”“虚力反驳”的状态,虽已打破了近代的“失语”“失声”状态,但这种“西强我弱”的话语权仍然在一定程度影响着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效能的充分发挥。一个典型的表现就在于部分国内民众甚至作为多党合作制度主体组成部分的各民主党派的一些成员也总是对多党合作制度心存疑虑,对制度不够自信。在世界政党政治这个舞台上,每个国家无论强弱作为制度话语主体都拥有说话的权利,但不一定拥有同等的权力。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我们从不认为是世界上最完善、最合理的唯一真理和唯一合理形式,不追求政党制度的话语霸权,但应努力争取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话语权,这将有利于增进多党

合作制度效能的充分发挥,赢得国内外民众的认同,增强我们的制度自信 and 理论自信。

争取多党合作制度话语权的基础是构建多党合作制度话语体系,我国在 2007 年由国务院新闻办向全世界发表了《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用中国的话语、中国的风格第一次向全世界诠释多党合作制度的内涵、特征、功能等,努力争取社会各界和世界各国人民的认同。正是我们持续不断地努力争取政党政治领域的话语权,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才会在出版了《大趋势》《亚洲大趋势》后专门研究中国并著成《中国大趋势》,他才会认为,“中国没有以民主改革的名义使自己陷入政党争斗的分裂局面,而是在现执政体制内进行了调整,通过倾听自下而上的声音并且保持高层的决策权。这一模式显然是中国 30 年成功的一个重要保障”^[13];另一位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也才对自己曾提出的“历史终结论”进行反思,认为有待商榷。这都说明我们在争取多党合作制度话语权方面稍有成绩。那么,这种成绩带来的是多党合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多党合作制度效能的进一步发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多党合作制度效能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指标稳步提升;进入新时代,中共中央加大了对参政党履职的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建设,各民主党派正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要求在各领域切实履行着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三大职能,彰显着多党合作制度的优势。因此,争取多党合作话语权有利于多党合作制度效能的发挥。

五、多党合作制度效能影响多党合作制度话语权的基本逻辑

多党合作制度效能影响多党合作制度话语权的基本逻辑是:多党合作实践效能是构建多党合作话语理论体系的基础和着力点,成熟完整的多党合作话语理论体系才能形成强大的影响力和多党合作制度国内国际话语权;争取多党合作话语权是多党合作制度效能追求的目标,有利于增进多党合作制度效能发挥。概而言之,即效能——话

语理论体系——话语权。在这一基本逻辑中,起桥梁纽带作用的就是话语理论体系的构建。一方面,多党合作制度话语理论体系既来源于多党合作实践,是实践的升华,又指导多党合作实践的发展;另一方面,一套成熟完整的多党合作制度话语理论体系能更大程度地影响和增强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话语权,而多党合作制度话语权的拥有又反过来促进多党合作制度话语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应对其他话语体系的挑战。目前,我国有长达60多年的多党合作实践和成功经验,但并未获得与实践效能“比肩同步”的话语权,其中的关键因素就在于在这一基本逻辑中缺失了多党合作制度话语理论体系这一关键环节,多党合作实践还未上升到成熟、科学的理论概括,还未形成一套科学完整且合乎逻辑能有效应对西方话语体系挑战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话语体系。因此,构建完整科学的多党合作制度话语体系成为当前政党制度理论研究领域里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要弄清楚多党合作制度话语理论体系的学理基础、政治基础、文化基础等,逐步探索建立多党合作制度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等。

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多党合作制度话语理论体系的内核和学理基础,多党合作制度是在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学说、民主政治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的产物。“无产阶级要获得彻底解放,必须建立自己独立的革命政党”“无产阶级政党要团结其他革命政党,并与其合作”“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联合支持一切民主政党,同时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坚持自己的原则”“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的自身团结统一和同盟军的问题”等^[14]诸如此类的政党合作、阶级合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随处可见,这些观点构成了我国多党合作制度中“合作”“团结”“民主”等基本概念和学理基础。我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建立了多党合作制度并不断充实多党合作制度的基本内容,产生了毛泽东的多党合作思想、邓小平的多党合作思想、江泽民的多党合作思想、胡锦涛的多

党合作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关多党合作的最新概括,这些既是多党合作话语理论体系架构的指导思想,也是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基本内涵,为多党合作理论话语体系构建提供了学理依据,亦为提升多党合作话语权提供了学理支撑。

多党合作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是多党合作制度话语理论体系的强大政治基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革命导师列宁曾说,“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15]。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正是都有对民主这个共同的追求才在长达20多年与国民党的斗争中携手并肩走到了一起,建立了体现民主的多党合作制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实现了人民民主,就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实行人民当家作主,这种理念渗透到制度中就是多党合作制度,民主精神贯穿于多党合作制度的价值和功能之中——政治参与、民主监督、利益表达等,尤其是民主监督反映了人民民主的内在要求,正如周恩来所说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实际上是扩大民主”^[16]。以民主党派作为协商主体的政党协商、政协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目前七条协商渠道最成熟且有制度保障的两条协商渠道,可以说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人民民主的本质。这些都奠定了多党合作制度强大的政治基础。

多党合作制度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质,是多党合作制度话语理论体系的文化基础。多党合作制度不是从西方移植或嫁接的,而是从自身深厚的传统文化中内生的,这是构建多党合作制度话语理论体系必须讲清楚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文化根源,如果忽视这种特有的文化基础就无法科学解读多党合作制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以“和合”为核心思想的,由“和合”而产生“阴阳调和”“天人合一”“以民为本”“有容乃大”“贵和尚中”等思想。这种“和合”思想反映在近代政党制度的选择上就是经历短暂的多党制和不完全的一党

制后顺理成章地产生出各党各派各界都认可的以“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为特征的多党合作制度,将传统文化中的“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团结和谐”“协商共赢”等思想充分包容其中。毛泽东关于多党合作方针的阐述:“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还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这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7]。这个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内涵的方针奠定了多党合作的基本格局和思想基础。

参考文献:

- [1]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47.
- [2] 李铁明.美国政党组织的衰落及其原因分析[J].文史博览,2005(18):35.
- [3] 刘菊香.构建多党合作制度国际话语权的思考[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1):24-28.
- [4] 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1.
- [5]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05(01).
- [6] 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广泛力量支持[N].解放军报,2015-05-21(01).
- [7] 刘菊香.构建多党合作制度国际话语权的思考[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1):24-28.
- [8] 刘菊香.民主党派参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思考[J].领导科学,2015(10)中:19.
- [9]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M].张岱云,聂振雄,石浮,宁安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439.
- [10] 刘菊香.构建多党合作制度国际话语权的思考[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1):24-28.
- [11] 刘菊香.构建多党合作制度国际话语权的思考[J].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1):24-28.
- [12] 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EB/OL]. (2015-02-09) [2017-12-28].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2/09/c_1114310670.htm.
- [13] 肖枫.中国实行的是独具特色的多党制[N].学习时报,2011-05-03.
- [14]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5.
- [15] 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82.
- [16]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50.
- [17]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4.

编辑:鲍跃华

制度自信: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发展和完善的重要保证

强亦忠 许红

摘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也是我国独创的新型政党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而制度自信是巩固、发展和完善这一政治制度的重要保证。本文从制度自信与制度自觉的关系、历史的眼光和世界的视野、政治制度判断标准以及辩证唯物史观等五个方面来讨论制度自信和制度自觉,阐述制度自信的含义、重要性及其理由和依据。

关键词:制度自信;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政治制度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9)01-00037-0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一个国家的各种制度中,政治制度处于关键环节。所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首先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信,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1]习近平的这段讲话为进一步巩固、发展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指明了方向。

一、制度自信与制度自觉

(一)制度自信与制度自觉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

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断奋进的强大动力和精神支撑。只有足够的自信,才能使我们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开创未来,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制度自信是指人们对政治制度自发萌生和成长起来的一种信念和信心。对于我国政治

制度的自信而言,其中包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这一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自信。邓小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的一次讲话中强调指出,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2],因此制度自信就显得格外重要。

制度自觉是指对制度的自我觉醒和领悟,对制度的认同和肯定,从而自觉地不忘多党合作初心,自觉地坚守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的政治信念,自觉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制度自信是立足于制度自觉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坚实的制度自觉,就不可能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其演进过程是逻辑使然,即通过增进和提升对政治制度的认知、认同和理解——制度自觉,从而达到对这一政治制度的肯定、确信和坚守——制度

收稿日期:2018-11-15

作者简介:强亦忠,民进会员、苏州大学教授;许红,民进苏州市委组织处处长。

自信,进而促进对这一政治制度巩固、发展和完善的自信心、责任心和使命感,这已成为当今我国政治制度建设的一项根本任务和重大课题。

(二)制度自觉的历史发展过程

制度自觉不仅是对国家、民族而言的,不仅是对政党、群体而言的,也是对每个个体而言的。制度自觉需要对制度演进过程的历史审视和理性反思,充分了解、比较和认识国内外政治制度的长处和短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从中寻找真正符合我国国情的政治制度。考查一下我国近现代史可以发现,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对政治制度的自觉、自醒过程就从没有停止过。特别是自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国人民对政治制度的审视、反省和探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中国人民对政治制度自觉的过程是一个复杂、曲折而又艰苦的探索过程,也是一个在世界政治文明演进的潮流中逐步觉醒和提升的过程。近一百多年来,在西方政治制度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在“西为中用”、“全面西化”等思潮的冲击下,中国应建立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实行什么样的民主政治,曾陷入混乱与迷茫之中。唯有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纷繁复杂的争论和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拨开迷雾,指明了方向,最终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得到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全国人民的拥护,开创了新型政党政治和民主政治的新纪元。正如邓小平所总结的那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3]

(三)从政治制度判断标准看制度自信

政治制度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积淀,对一个国家而言,政治制度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保证,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的重要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4]判断政治制度是否正确、合适、先进,要看它是否能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反映其政治诉求,进而看它是否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发

展,看它是否适合本国国情,是否受到广大人民群众认同和拥护,简而言之,就是邓小平所强调的“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5]我国改革开放 40 年来各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我国的政治制度是无比优越的。但当今世界,在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政治勃兴的潮流中,仍有暗流在涌动,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对我国的政治制度仍在不断发起挑战和冲击。国人特别是知识阶层中,有不少人对西方民主制度盲目崇拜、迷恋,念念不忘。因此,今天国人政治制度自信的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就显得更加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我们需要借鉴国外政治文明有益成果,但绝不能放弃中国政治制度的根本……对于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应该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虚心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但决不能囫囵吞枣、决不能邯郸学步……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6]我们要坚持以我为主、开放包容的方针,坚持不盲目排外,积极吸收国外一切优秀的政治文明成果,择善而从、为我所用的方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不断补充、修正、拓展、完善我国的政治制度,这也是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

(四)从世界的视角看制度自信

当今世界,协商民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社会政治生态的演进和政治生活的变化而蓬勃兴起,已成为世界民主政治发展的大趋势。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协商民主的肇始,其历史之持久、规模之宏大、制度化之成熟、经验之丰富、成果之突出,在当今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早已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近年来各国政党、政要、智库和媒体纷纷发表言论,表示赞许。他们认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和民主政治植根于中国土

壤,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符合国家治理的需要,符合中华民族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的优秀文化传统,是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为破解世界政治难题,创新民主形式和推动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和方案。^[6]有国外学者感叹:世界需要重新认识中国制度的优势。甚至有国外学者发表署名文章公开宣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主要的进步是制度上的进步。西方说中国制度建设低水平,不确定性高。这不仅仅是因为西方人对中国制度进步的认识不足,也因为中国本身忽视了以制度建设来衡量国家的进步。”笔者认为他说的虽有偏颇之处,但还是很中肯的。总之,国际社会的热议以及从中所表示的赞同与敬意应该也是我们增强制度自信的一个重要依据。

(五)从辩证唯物主义史观看制度自信

当然,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在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曲折甚至是重大失误,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它是一个新生事物,有一个逐步成长、磨合的过程;也因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政治制度也有一个逐步适应、调整的阶段;加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犯过不少错误,有的甚至是重大挫折和失误,如“反右”和“文革”,严重影响了我国政治制度的发展。但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最大优点和特点是党的领导,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最善于自我革命、自我修正的政党。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12月13日省部级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的最大优势。”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不断应对挑战、抵御风险、克服阻力、战胜困难、解决矛盾、扭转危局,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和自我修正、自我完善的优良机制,也源自于中国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锐利武器,注重政治建设的优良传统以及中华文化善于自省的

文化基因。我国这一基本政治制度的另一个突出优点就在于基于协商民主的运作模式,这种民主模式在更广泛、更深入行使民主权力、寻求政治意愿和诉求的最大公约数方面显得更为有效。它与基于票决民主模式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大体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社会主义民主主体制架构,它既克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两党制和多党制当今凸显的强权政治、金钱政治、恶性竞争、效能低下、公众厌弃等弊端,避免了原苏联和东欧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一党专政导致红旗落地的宿命,又消解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一党执政出现的权力过于集中、民主决策不足、人治突出、监督乏力、法治薄弱、腐败严重等缺陷,创造了一种执政党与参政党密切配合的执政方式和共商共治的国家治理模式,创造世界政治运作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我们应该从辩证唯物主义史观出发,充分看到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历史必然、独特优势、内在活力和发展前景,牢固树立坚定的政治信念和理论自觉^[7]。这是我们制度自信的压舱石。

二、怎样增强制度自信

(一)加强学习与宣教工作是增强制度自信的根本保证

关于学习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过。他在2013年3月中共中央党校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任务。把学习型放在第一位。”^[8]他还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要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国家法律法规,还要学习经济、历史、政治、文化、社会、科技、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知识和中国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虽是针对党的领导干部说的,但对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也是完全适用的。因为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增强制度自信都需要丰厚知识、思想和理论的涵养;因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要求执政和参政双方必须相匹配,才能适应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要求。当前,我们要着重学习好党

的十八大、十九大的精神,特别是学习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它作为指导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南,不断提高把握方向和把握大局的能力,保持政治方向、坚定政治信念和增强制度自信的定力。二是要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民主党派创始人学习,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民主思想、科学态度和创新勇气,学习他们建立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丰功伟绩,学习他们风雨同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坚定信念、优良传统和高尚风范。三是要重新深入学习民主。要了解民主政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解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历史,了解当今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势和世界各国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及反面教训,以便从中借鉴,以利于我国民主政治特别是当前协商民主的发展^[7]。我们所需要的制度自信不仅要有中国立场,而且要有世界眼光,不能自我满足、自我欣赏、自我陶醉,更不能自我封闭、自我得意、自我迷恋,要勇于从世界政治文明不断发展的进程中发现矛盾,直面矛盾,以开放包容的气度,吸纳借鉴,为我所用。四是做好宣教工作。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个自信”的论述为纲,做好“四个自信”其中包括制度自信的宣传教育工作,使制度自信深入人心,在广大群众中扎根,成为全社会的思想觉悟、价值共识和政治素养,从而坚定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心。

(二)将制度自信融入“四个自信”之中是增强制度自信的重要环节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强调:“全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因此,我们应该把制度自信放到“四个自信”整体之中来考虑。

道路自信是指对我国发展方向和未来命运的自信。道路问题是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首要问题。因为只有走什么道路确定之后,理论、制度和文化的构建、发展和创新才能有所依

附、有所遵循。因此,道路自信具有根本性和基础性。^[8]理论自信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的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自信,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支柱,是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思想基础。制度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优势的自信,它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保证,是具有决定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久性的因素,这在前面已有论述。文化自信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能量,是对我们所选择和坚信的社会发展道路,我们所掌握和遵循的社会发展理论,我们所认同和坚守的政治制度的文化支撑。文化化人、深入人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三)重视政治建设、构建良好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态是增强制度自信的重要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指出:“党的政治建设是一个永恒的课题。要把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提高政治能力,为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重要保证。”习近平的这一指示不仅是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来的,对于参政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也是完全适用的。我们要坚决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鲜明的政治导向引领制度建设,以政治认同、政治信仰为前提,牢牢抓住政治思想教育这个纲,搞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坚持政治标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提高人们的政治意识、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坚定政治方向,永葆政治活力,使之真正在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中发挥作用。对于民主党派而言,要推进政治交接和自身建设,坚持党的领导,不忘多党合作初心,确保多党合作事业薪火永续。

在加强政治建设的同时,也要构建积极健康的政治文化和良序发展的政治生态,并以政治文化建设涵养政治生态。政治文化是社会的政治关

系、政治过程、政治制度、政治活动诸方面在人们精神领域的反映,并体现在政治体系的各个方面,它是政治体系得以存在和维持的必要基础,是影响政治制度模式的重要因素,并决定着政治制度的运作状况^[10]。政治建设、政治文化、政治生态是紧密相联、相辅相成的,可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巩固、发展和完善营造良好政治氛围和宽松的政治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2月与各民主党派共迎新春的讲话中指出:“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的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正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在2016年12月30日出席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时指出:“努力寻求社会意愿和诉求的最大公约数,画出民心民意的最大同心圆,广泛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能量。”他在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讲话时指出:“正确处理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关键是要坚持求同存异。一方面,要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包括巩固已有共识,推动形成新的共识,这是基础和前提。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包容差异……只要我们把政治底线这个圆心守住,包容的多样性半径越长,画出的同心圆就越大。”^[11]2017年香港“七一”回归庆典上,习近平主席提出“求大同、存大异”的新提法,这是对我国传统“和合”文化、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和党的统战文化的一个重大突破和创新。习近平的这一系列的讲话,为我们构建良好的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态,进而为巩固、发展和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指明了方向。

(四)撸起袖子加油干,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是增强制度自信的物质基础

一个国家的实力与一个国家的自信心密切相关,自信心又是国家实力提升的精神牵引。而制度

自信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必须有物质条件作支撑。因此,我们要增强制度自信,首先要坚持党的基本方针,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按照中共十九大制定的路线图、时间表和任务书,全面贯彻落实“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方针,“两个一百年”的总目标和“三步走”的战略部署,撸起袖子加油干,加快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不断增强国力,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夯实制度自信的物质基础,向全世界充分展示我国政治制度的强大优势和伟大力量,进而又增长我们自身的制度自信,按照“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唯物辩证法则,循环往复,螺旋上升,这是制度自信的最佳状态。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88.
- [2]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33.
- [3]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05.
-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286.
- [5] 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13.
- [6]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一项伟大的政治创造——国际社会热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N].光明日报,2018-10-19.
- [7] 强亦忠.协商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选择[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第6期:18-22.
-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403.
- [9] 覃正爱.谈谈中国共产党的“四个自信”[N].光明日报,2018-1-24.
- [10] 王喜成.以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涵养良好政治生态[N].光明日报,2018-4-16.
- [1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04.

编辑:鲍跃华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态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 南京师范大学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理论江苏研究基地联合课题组

摘 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既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撑力量,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促进力量。本文对江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态度情况进行学术解读,为形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引领理论提供数据基础和分析支持并提出对策。

关键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态度;影响因素;分析研究

中图分类号:D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9)01-00042-08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中,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既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撑力量,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促进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加强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发挥他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围绕“新时代”背景,对“如何培育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树立良好社会态度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既是对新的时代需求与新的矛盾问题的积极响应,也是对我们党新时期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的进一步探索。

在省委统战部的领导下,本课题组围绕江苏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态度问题,于2018年5月至8月进行了专题调研。研究内容由三部分组成:第一,从社会认同感、社会压力感、社会冲突感、社会安全感和社会公平感五个维度入手,全面考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态度的整体状况、内部差异和存在问题;第二,从内部个体和外部信息接触两个层面,探究影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态度的因素,厘清其社会态度的形成机制;第三,在全面掌握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态度基本情况、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的基础上,设计针对性策略,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树立健康良好的社会态度。

本课题的研究价值体现在多个维度:一是通过扎实的问卷调查和实地调研,对江苏省13个省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态度现状进行摸底,为总体把握和精准开展全省新的社阶层人士引导工

收稿日期:2019-1-27

课题负责人简介:张伟伟,博士,南京师范大学网络与新媒体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媒介化社会、新媒体与新社会阶层,执笔人。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度江苏统一战线工作研究专项课题、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课题(课题编号:18TZB005),该课题获2018年度全国统战理论政策研究创新成果一等奖。

作提供重要依据;二是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剖析江苏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态度的形成内因、外因,提出意见建议,为后期研究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形成解决对策提供路径;三是通过获取第一手资料,对江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态度情况进行学术解读,为形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引领理论提供数据基础和分析支持。

一、江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调查发现

从区域来看,江苏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要聚集地之一。目前全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约420万人。其中,民营和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较其他三类人员而言,所占比例较大。2015年一项统计数据显示,截止2014年底,江苏省私营企业从业人数已达1973.4万人,外资企业(含港、澳、台商投资单位)吸收就业人数达463.3万人,分别占全省常住人口的24.9%和5.8%。而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自2015年开始,在《江苏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发展互联网经济的意见》、《中国制造2025江苏行动纲要》等政策推动下,江苏省互联网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全省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处于全国前列。省会南京成为首个“中国软件名城”,江苏新媒体从业人员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比例不断增长。江苏中介组织与社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所占比例虽然低于民营和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但其发展速度均位于全国前列。根据2014年统计,江苏律师事务所办理案件数和税务师事务所业务收入均排名全国第三,会计事务所业务收入排名全国第四。2012年至2014年社会组织数量以年平均25.1%的速度增长,远超过全国平均发展速度。根据2015年的一项摸底调查,江苏自由职业人员约有8万人左右,尽管数量不多,但在文化艺术界(包括网络作家、自由画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拥有较强影响力。

为了解江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态度的真实情况,课题组于2018年5月-8月,先后对江苏省13个省辖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进行了走访调

研。根据江苏新的社会阶层群体的分布特点,课题组采用配比抽样的方式,针对四类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发放问卷1300份(回收有效问卷1061份,回收率为81.6%),访谈和座谈52人,并深入其工作生活的重点场景进行长期参与观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关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态度的基本认识和研判。

(一)江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画像

课题组通过分析问卷数据,发现江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具有年纪轻、学历高、经济实力强、党外人士为主、体制外流动频繁五大突出特征。这五大特征形成了认识和分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这一群体的基础判断。

第一,年龄结构上以“新生代”为主,80后和90后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主力军,整体呈现出“年龄越大,人数越少”的特点。如表1所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因年龄呈现出显著梯度分布特征,随着年龄上升,人口数量下降,表明这是一个年轻化趋势明显的群体。

表1:江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年龄分布

年龄	百分比
20—30岁	46.7
31—40岁	28.8
41—50岁	19.3
51岁以上	5.2
总计	100

第二,教育构成上以“高学历”为主。调查发现,如表2所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大多具有本科学历,其学历构成为:本科学历占比为62.1%,本科以下学历占比31.1%,研究生(硕士和博士)学历占比6.8%。

表2:江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学历分布

学历	百分比
本科以下	31.1
本科	62.1
研究生(硕士和博士)	6.8
总计	100

第三,经济地位上属于“物质中产阶级”。从收入情况来看,74.5%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收入高于地区平均收入。(2017年江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3622元。调查数据显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年收入高于地区平均收入的比例分布为:“5-10万元”占比31.3%，“11-30万元”占比36.9%，“30万元以上”占比6.4%,合计占比74.5%。)从住房情况来看,76.5%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拥有房产。从私家车拥有情况来看,62.1%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有车族。因此,从收入、住房和生活方式三个物质维度来判断,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可以被归为“物质中产阶级”。

第四,在政治面貌上,“党外人士”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主要特征。调查发现,近七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党外人士(69.6%),中共党员仅占比30.4%。

第五,在职业发展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呈现“体制外流动性生存”特征。调查发现,68.6%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换过1-3次工作”,12%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换过3次以上工作”,仅19.4%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没有换过工作”。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江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可以用“新生代”、“高学历”、“物质中产”、“党外人士”、“体制外流动”这些词语来进行群体画像。这样的群体画像反映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一个年纪轻、有文化、思想活跃、经济实力较强、流动性大、较为分散的群体。

(二)江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态度的基本情况

本课题组主要从“社会认同感”、“社会压力感”、“社会冲突感”、“社会安全感”和“社会公平感”五个维度考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社会态度。调查发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态度的基本情况可以归纳为“有压力有认同、忧风险患不公”。

1.社会认同感。社会认同感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进行社会行动的起点。本课题从制度认同、政党认同、执政认同三个层面,采用五级量表进行调研。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认同感由1-5进行赋值。1表示非常不赞同,5表示非常赞同。调查发

现,江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具有很高的社会认同感(均值3.98),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认可度最高(均值为4.43),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可度也非常高(均值为4.15)。相较而言,他们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认可度要低一些(均值为3.36)。在四类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新媒体从业人员”的认同感最高(均值为4.04),“自由职业人员”其次(均值为3.97),“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第三(均值为3.94),“私营企业和外企管理技术人员”的认同感最低(均值为3.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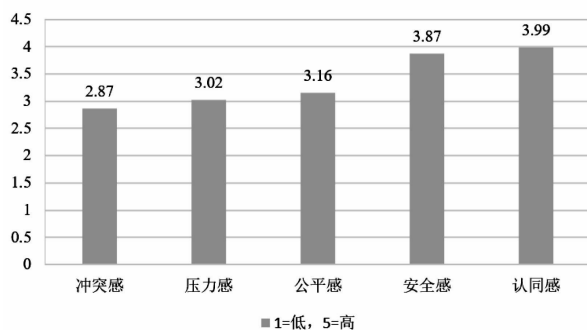


图1:江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态度整体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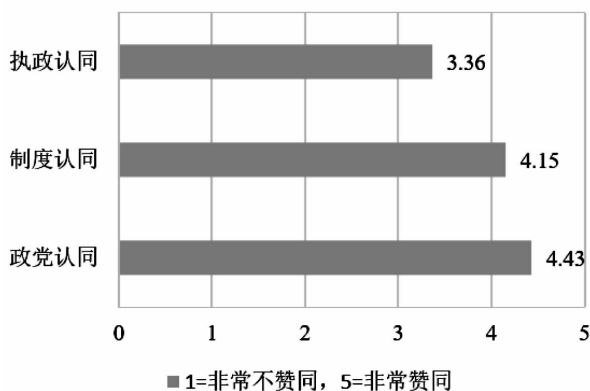


图2:江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认同整体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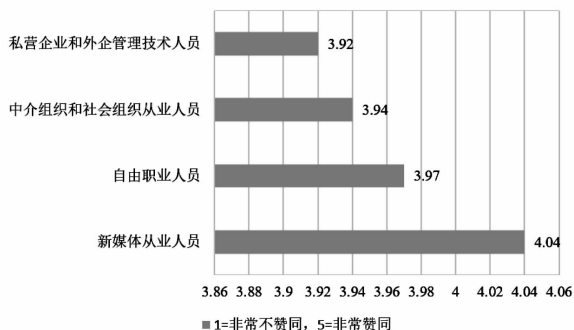


图3:江苏四类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认同比较

2.社会压力感。社会压力感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对社会赋予自身要求的感知。本课题从“公”(工作压力)和“私”(生活压力)两个方面考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社会压力感,采用五级量表,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压力感由1-5进行赋值。1表示压力非常小,5表示压力非常大。调查发现,江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普遍感受到较高的社会压力(均值为3.02)。相较而言,他们的工作压力(均值为3.07)高于生活压力(均值为2.97)。

在四类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压力感最高(均值为3.19),“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次之(均值为3.03),“自由职业人员”再次(均值为3.00),“新媒体从业人员”的压力感最低(均值为2.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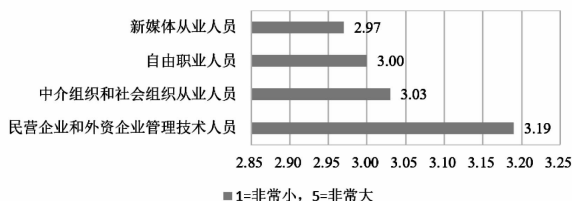


图4:江苏四类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压力比较

3.社会冲突感。社会冲突感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对社会风险的感知,反映他们对社会稳定状况的判断。本课题从“贫富冲突”、“干群冲突”、“劳资冲突”、“城乡冲突”、“城市新移民和原住民冲突”五个方面考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冲突感。采用五级量表进行调查,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冲突感由1-5进行赋值。1表示没有冲突,5表示冲突很大。调查发现,江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具有适度的社会冲突感(均值2.87),他们认为最严重的社会冲突是“贫富冲突”(3.12),其次是“干群冲突”(2.90),第三是“劳资冲突”(2.87)。他们认为“城乡冲突”(2.78)和“新移民与原住民冲突”(2.67)的程度比较轻。这说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非常担心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分化问题,他们对贫富矛盾的感知最为强烈。

在四类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新媒体从业人员”的冲突意识最强,均值为2.93;“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冲突意识次之,均值为

2.84;“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冲突意识再次,均值为2.83;“自由职业人员”冲突意识最低,均值为2.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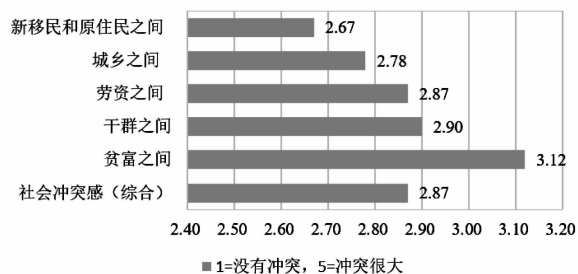


图5:江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冲突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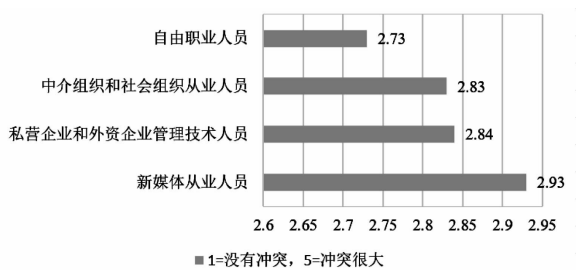


图6:江苏四类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冲突感比较

4. 社会安全感。社会安全感作为一种心理状态,反映的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对社会环境确定性和可控性的感知。本课题从“个人和家庭财产安全”、“人身安全”、“医疗安全”、“食品安全”、“劳动安全”、“交通安全”、“个人信息和隐私安全”七个方面考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安全感。采用五级量表进行调查,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安全感由1-5进行赋值。1表示很不安全,5表示非常安全。调查发现,江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具有较高的安全感(均值为3.33),这反映出他们对社会的保障体系较为满意。相较而言,他们最具安全感的前三位是“人身安全”(3.94),“个人和家庭财产安全”(3.87)和“劳动安全”(3.61)。在“食品安全”和“个人信息和隐私安全”方面,他们的安全感比较低,均值都在3分以下(分别为2.76和2.35)。

在四类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自由职业人员”安全感最高(3.36),“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和“新媒体从业人员”的安全感相当(3.33),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安全感稍微

偏低,均值为 3.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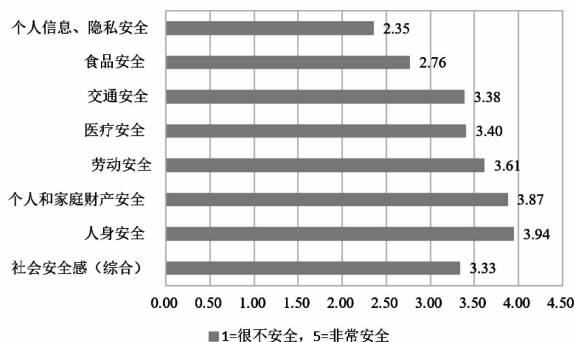


图 7: 江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安全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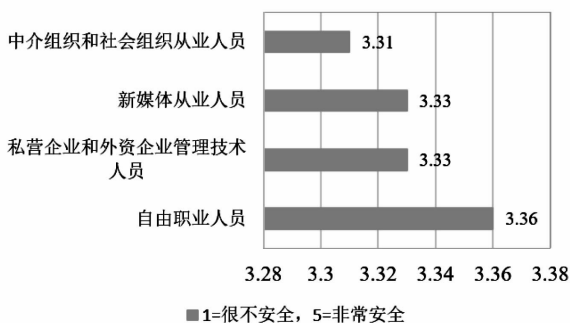


图 8: 江苏四类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安全感比较

5. 社会公平感。社会公平感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对社会资源分配公平程度的感知。本课题从“财富及收入的分配”、“工作与就业机会”、“公共医疗”、“义务教育”、“实际享有的政治权利”和“司法与执法”六个方面考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公平感。采用五级量表进行调查,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公平感由 1-5 进行赋值。1 表示很不公平,5 表示很公平。调查发现,除了“财富及收入的分配”低于 3 分外(2.75),江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对其他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情况,均打分超过 3 分,他们综合公平感均值为 3.16。这说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整体上认为社会资源的分配是公正合理的。他们认为资源分配最公平的前三位是“司法与执法”(3.34)、“义务教育”(3.33)和“实际享有的政治权利”(3.25)。

在四类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自由职业人员”和“新媒体从业人员”的公平感较高,均值分别为 3.19 和 3.18;“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和“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公平感较

低,均值均为 3.12,低于群体的平均值(3.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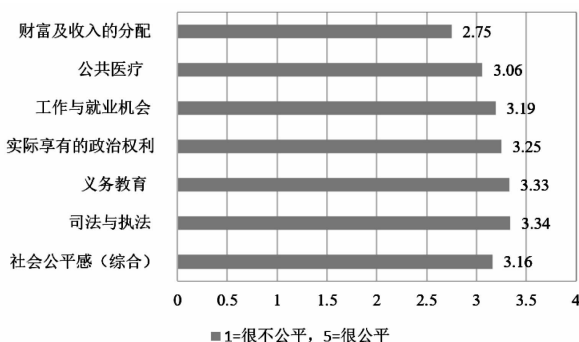


图 9: 江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公平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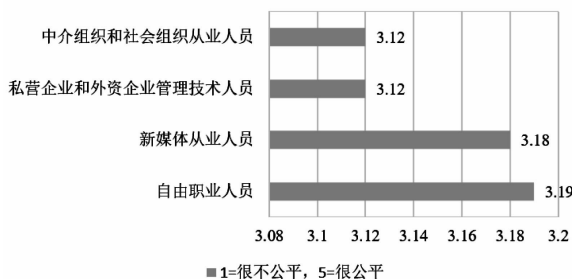


图 10: 江苏四类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公平感比较

(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态度的形成机制探究

1.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态度的影响因素

本课题从内部和外部两方面探究影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态度的因素。内部方面,主要考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个人因素影响。外部方面,由于社会态度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对社会环境秉持的一种主观性感受,它建立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对社会的基本认知之上,因此本课题主要考察信息接触因素(媒介使用)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态度的影响。

本课题采用多元回归分析,统计结果显示,内部个人因素——文化程度、政治面貌(是否为党员和个人收入,外部信息接触因素——报纸使用、广播使用、电视使用和网络使用,分别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态度的不同维度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对于社会认同感,模型 1 显示政治面貌、报纸、电视和网络使用具有显著正向预测力;对于社会压力感,模型 2 显示个人收入、报纸和网络使用具有显著正向预测力;对于社会冲突感,模型 3 显

示文化程度具有显著反向预测力,广播和网络使用具有显著正向预测力;对于社会安全感,模型4显示报纸、电视和网络使用具有显著反向预测力;对于社会公平感,模型5显示个人收入具有显著正向预测力,而报纸和电视使用具有显著反向预测力。

综合而言,回归分析表明个体因素和信息接触因素均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态度发挥着显著影响。个体因素分析显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党员比非党员具有更强的社会认同感,文化程度越高,他们的社会冲突意识也越高,收入水平越高,他们的社会压力感和社会公平感也将随之提高。信息接触因素分析显示,报纸、电视和网络使用有利于促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社会认同感,但报纸和电视使用也会降低他们的社会安全感和公平感,而网络使用还会提升他们的社会压力感和社会冲突感;此外,广播使用也会一定程度地提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社会冲突感。

2.形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态度的“认知-整合”机制

根据多元回归分析,可以发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态度的形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由“认知”到“整合”的过程。首先,“个体经历”和“信息接触”帮助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建立对社会环境的基本认知。在基本认知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的社会认同感、社会压力感、社会冲突感、社会安全感和社会公平感。最后,经过表达与整合,发展成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社会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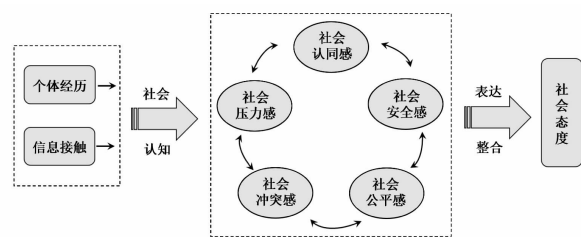


图 11: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态度的形成机制

二、江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态度存在问题

调查显示,江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态度整体较为良好,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层面的问题。

(一)从社会态度基本情况看,主要存在三种现象

一是社会认同感内部存在不均衡。调查发现,在社会认同感的三个层面中,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拥有较高的制度认同和政党认同,但执政认同相对较低。反映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虽然非常认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他们对当前政府的执政水平还有很高的要求和期待。未来如果不能提升他们的执政认同,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政党认同和制度认同,降低整体社会认同感,乃至削弱他们进行社会行动的积极性。

二是社会压力感较高。调查发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普遍具有较高的工作压力感和生活压力感。在调查中,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反映,当前国际形势的不稳定,尤其是中美贸易摩擦等事件带来宏观经济走势的不明朗,使得他们的压力感非常大。他们非常渴望政府相关部门能够出台政策和措施,缓解他们的压力,提升他们的信心。

表 3: 江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态度影响模型

变量	模型 1 社会认同感	模型 2 社会压力感	模型 3 社会冲突感	模型 4 社会安全感	模型 5 社会公平感
性别	0.38	1.42	1.91	1.11	-0.76
年龄	-2.15	2.22	-0.14	-0.08	-0.05
文化程度	0.55	-1.12	-3.00**	1.16	-0.78
政治面貌	2.77**	0.72	-0.49	0.40	-0.71
个人收入	0.50	4.78***	-1.02	-1.31	2.13*
报纸使用	5.18***	2.22*	0.38	-1.32*	-1.82*
广播使用	1.38	0.32	2.00*	-1.19	-0.16
电视使用	2.01*	-0.93	1.05	-1.95*	-2.26*
网络使用	3.67***	2.92**	2.31*	-0.23*	-1.56
常数项	12.96	10.99	8.20	11.49	13.68
样本总量	1061	1061	1061	1061	1061
R-squared	0.16	0.05	0.05	0.04	0.4

三是对贫富分化极为敏感。调查发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虽然具有较高的社会公平感以及适度的社会冲突感,但他们对社会贫富分化的情况极为敏感。在社会公平感中,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认为“财富及收入的分配”的公平程度最低,而在社会冲突感中,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认为“贫富冲突”是目前最严重的社会冲突。调查中,作为物质中产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表达出对社会贫富分化状况的忧虑。

(二)从社会态度的形成原因看,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

一是文化程度和收入水平对社会态度的负面影响。调查发现,文化程度高和收入水平高分别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社会冲突感和社会压力感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一些文化程度较高有海外经历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他们表达出对当前社会冲突、尤其是贫富冲突的强烈忧虑。一些以外企和民企高管为代表的高收入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纷纷倾诉其在工作 and 生活中的巨大压力。

二是网络等媒体对社会态度的负面影响。调查发现,报纸、电视和网络不同程度地提升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社会冲突感和压力感,降低了他们的社会安全感和公平感。调查中,一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反映,媒体往往把社会矛盾和底层情绪放大,他们频繁接触此类信息,极易形成负面悲观的社会态度。

三、关于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树立健康社会态度的对策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在新时代,如何凝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树立健康的社会态度,共同致力于经济社会发展是课题的主要落脚点。本课题通过扎实的调研,针对上述问题分析,提出以下对策。

(一)顶层设计:激励体系建设

调查发现,四类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社会认同感、社会压力感、社会冲突感、社会安全感和社会公平感上差异性显著。例如,“新媒体从业人员”的社会冲突感最高,主要是由于他们从事新媒体

工作,比其他三类群体更经常接触到与社会群体冲突相关的信息,造成他们的社会冲突感最高。又例如,“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的社会压力感最高,这与他们的高工作强度密切相关。因此在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树立健康良好社会态度的过程中,统战工作不能铁板一块,而要从物质激励、制度吸纳和精神感召三个层面建立分层次、差异化的激励体系。

1.对于“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他们普遍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但他们也是社会压力感较高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他们是市场经济的受益者,但社会认同感与社会公平感在四个群体中最低。对于这部分群体,相关部门对其激励体系建设,应当将重心放在制度吸纳和精神感召层面,一方面通过制度吸纳,培养他们的共同体意识,一方面通过精神感召,增强他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2.对于“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他们的工作直接面向群众,在满足群体兴趣、维护群众权益、推动群众参与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是社会安全感最低的群体,对社会公平的感知程度也比较低。对于这部分群体,相关部门对其的激励体系建设,应当将重心放在制度吸纳层面,通过制度吸纳将其整合进现行体制中,提升他们的社会安全感和公平感。

3.对于“自由职业人员”,他们重视个人的自由与个性,追求工作的创造性和成就感。因此,他们尽管没有固定的职业,但他们并不缺乏安全感。在四类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他们的社会安全感是最高的。对于这部分人群,相关部门应当尊重他们的自由性和独立性,对其的激励体系建设重点放在精神感召层面,培养他们的大局意识,激发他们的价值认同。

4.对于“新媒体从业人员”,他们是新的社会阶层中发声能力最强,思想观念最为活跃且掌握一定话语权的群体。他们大多数受过良好的教育,以文科生为主,相当一部分具有体制内媒体的工作经验。大多数对工作收入不太满意,同时又认为自

身的工作受到了一定社会认可。与其他三类新的社会阶层群体相比,他们对社会矛盾和冲突感知最为强烈。对于这部分人群,相关部门对其的激励体系建设,应重点放在物质激励层面,通过物质手段规范他们的行为,达到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的效果。

(二)基层操作:激励手段落实

在分层次、差异化激励体系的引导下,参考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社会态度形成机制,采取针对性的激励手段。

第一,在物质激励层面,结合个人收入对社会公平感的提升作用,相关部门可以有的放矢地使用一系列物质激励手段。例如对于新媒体从业者,可以通过购买服务、项目合作、合办大型赛事等形式,给予政策支持,提升他们的物质待遇,缓解他们的社会压力。

第二,在制度吸纳层面,要探索建立起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综合评价体系,建立跟踪管理机制,对他们的政治表现、业务能力、思想状况等情况进行动态跟踪与评估,把优秀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吸纳到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队伍中来,或推荐其为行业监督员、特约评论人员,或选派一部分优秀代表人士进入群团组织和政府机关挂职锻炼,让他们充分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注和支持;要重点掌握一部分热衷于自媒体进行意见表达的网红律师、公益达人,重点关注他们的思想动态和行为倾向,并加强常态化的沟通交流,引导他们采用合理的方式发表意见,努力将有一定政治立场的意见领袖发展为统战工作力量,代表党和政府在网络上正面发声;要注重关注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政治要求,比如可以邀请他们以专家身份开展课题研究,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等热点难点问题上,邀请群体内代表人士参与研究讨论。

第三,在精神感召层面,结合媒体使用对社会态度的反向影响(对社会冲突感和压力感的提升作用,以及对社会安全感和公平感的降低作用),相关部门可以借助媒体手段实现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精神感召。例如,可以通过官微官网,或者与具有较高影响力的网络媒体合作,通过网络媒

体实现统战信息的交流、统战政策的解读和统战成果的展示。可以充分发挥社交媒体的即时性、便捷性和趣味性的特点,利用微博、微信、QQ等社交工具,及时跟踪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思想动态,以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实现思想引导。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开发政治学习的相关APP,鼓励各级联谊组织、非公企业党组织、团组织突出新的社会阶层这一群体,开展各项帮扶活动、公益活动,在潜移默化中团结人心,凝聚力量。

四、结语

2017年中央统战部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总体规模为7200万人,其中民营企业 and 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约4800万人;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约1400万人;自由职业人员约1100万人;新媒体从业人员约1000万人(因各类群体存在人员交叉现象,故数据加总多于7200万人)。这一系列数据充分表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已经发展成为现实政治生活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对社会主流价值和现存秩序有着不可替代的支持作用。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还将继续存在并扩大其影响和范围。因此从某种层面上来讲,新的社会阶层的演变是关乎全局的问题,它直接或间接地推动或制约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作为一个规模庞大、实力雄厚、文化水平较高的群体,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如果得不到关注,利益诉求得不到表达、维护和保障,他们的发展和上升通道得不到有效解决,必然会给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本身的特质,又使其具有一些超出其他阶层的资源能量和动员能力。当一些敏感事件发生时,他们可能扮演“杠杆”或“助推”角色,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放大器和催化剂。因此,我们需要从巩固党的领导、推动人民民主、实现社会和谐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树立健康良好社会态度的价值与意义。

编辑:王芳

依托“两新”党组织 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机制研究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课题组

摘 要:本课题基于江苏“两新”党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新理念与新实践的实证分析,对推进“两新”党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提出了“双覆盖”和“双融合”的优化路径,即树立“依托、服务、融合”理念,构建新的社会阶层基层党建与统战“组织、阵地、队伍、方法”四位一体、融合共建的“双覆盖”“双融合”工作格局,以实现大党建与大统战合力推进党的中心工作的共赢局面。

关键词:“两新”党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融合机制

中图分类号:D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9)01-00050-10

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会议和《关于加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在新的社会阶层组织中加强党建工作是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前提和条件。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大多数集中在基层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简称“两新”组织)中,“两新”组织是新的社会阶层组织的主体,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是“两新”党组织党的重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更好地分析研究新形势下“两新”党组织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基本情况,2017年5月份以来,课题组选取江苏省

为调研对象,在省委统战部的指导和支持下,通过座谈调研、实地走访、个别访谈、函调等方式,赴南京市玄武区、盐城市、南通市等多地实地调研,认真听取各级统战部门领导、基层党政主要领导及相关部门领导、“两新”党组织负责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等多方面意见建议。省“两新”组织党工委、民政厅等相关部门单位积极配合、提供了重要基础数据。

在此基础上,我们认真研究思考,形成了关于当前“两新”党组织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一些基本分析和观点。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

收稿日期:2018-11-10

课题组简介:任世红,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教授;夏斌,江苏省委统战部八处副处长;许家鹏(执笔),上海市宗教事业服务中心主任;陈韶华,大连市委统战部知工处副处长;陈星辰,天津滨海新区统战部干部;杜泓,中央统战部信息中心六级职员;吴文鑫,中央统战部研究室干部。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度江苏省统一战线工作研究专项课题、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的社会阶层基层党组织统战工作研究”(项目编号:17TJB005)研究成果。

指的党建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党建是指党的建设,是指作为整体的党的工作,而狭义则主要是指组织工作。可以把广义的党建称之为“大党建”,而组织工作可以看作是“小党建”。这一区分,不仅是全称与简称问题,更是与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领域中普遍面临的,将广义的党建概念理解成狭义的“小党建”的现状紧密相关。当前,随着“两新”党组织“两个覆盖”工作的推进,新的社会阶层基层统战工作依托不断增强,基层党建与统战在组织、力量、阵地等方面的融合发展不断探索,正从各自为政的“两张皮”状态逐步向“大融合”局面迈进。立足当前实践探索中存在的思想认识不到位、组织依托不均衡、平台载体壁垒过于分明、方式方法融合不深入、指导协调尚待加强等问题,课题组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我们认为,在基层,党建与统战工作的融合具有重要性、必要性,也有可能性和可行性,加强基层党的建设、推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要求我们解放思想,树立“依托、服务、融合”理念,构建新的社会阶层基层党建与统战“组织、阵地、队伍、方法”四位一体、融合共建的“双覆盖”“双融合”工作格局,以实现大党建与大统战合力推进党的中心工作的共赢局面。

一、大党建与大统战:“两新”党组织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战略考量

(一)加强“两新”党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重要意义

加强“两新”党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是推进新形势下基层党的建设的重要方面。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是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必须团结依靠的力量,做好他们的工作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治国理政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他们绝大多数是党外、体制外人士,数量大、分布广,有强烈的“社会人”属性和“体制外”特征,加强团结引导、凝聚共识的任务繁重。同时他们中不少人具有较强的组织归属感,大部分分布在大中城市的楼宇、园区、街区、街道、社

区等各类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可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的重点和重心应该是基层和基层组织。“两新”组织中的党组织是党的工作的基本承载者。《党章》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两新”党组织是与时俱进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的主阵地。因此,在加强基层组织党建的基础上加强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团结引导,把他们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是推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时代要求。

加强“两新”党组织统战工作是推进新形势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关键环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高度重视,将其摆在党和国家工作重要位置,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他们的工作,要用“组织起来”的方式。《意见》提出了要坚持党的领导,切实加强新的社会阶层组织党建工作,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部署。俞正声主席在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在新的社会阶层组织中加强党建工作是做好新的社会阶层工作的关键,也是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前提和条件。准确全面理解“组织起来”重要思想,不仅要将其落实到平台载体工作方法等领域,更需要我们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所在基层组织,即“两新”组织党的建设作为统战工作的基本依托。当前,“两新”组织党的建设“两个覆盖”工作不断推进,覆盖率持续提升,形势喜人,但依然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方面,一些领域依然没有覆盖到,一些覆盖到的地方有形式无内容的情况较为突出;另一方面,在覆盖到的领域中普遍存在党建与统战各自为政“两张皮”的情况,即长期以来,统战主要将力量集中于其中的代表人士工作,而党建主要聚焦于新的社会阶层组织中的中共党员工作,群团等部门的工作覆盖力又相对不足。从实际调研情况看,这种“小党建”“小统战”的局面造成许多工作的“真空地带”,使广大新的社会阶层普通人士游

离于党的工作视野之外,从而直接影响党的整体工作。从当前理论界研究现状看,视野偏窄的特征也很明显:研究“两新”组织党建的成果主要是组织部门视角,很少涉及统战领域,而研究统战的成果则绝大多数聚焦于代表人士工作。同时相关群团方面的研究则指向较为多元,并未更多聚焦党的建设主题。

“两张皮”情况形成的原因较为复杂,其主要原因是部门职能的过度强化。而这一强化有着强烈的体制内历史背景,即在新的社会阶层未大量涌现的年代,统战主要是做体制内的党外人士工作,统战和组织部门各司其职,党外代表人士和党员两者之外的工作对象由相关群团组织承接,由各基层党组织托底。今天,做体制外党外人士的统战工作,必然要调整这一格局,从分离分立走向融合共赢。在“大党建”“大统战”视野下加强“两新”党组织工作。

(二)“两新”党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定位

在分析了从“两张皮”到大融合的必要性 and 重要性之后,我们从基层党组织职能、基层工作的特殊性质和统战工作的服务性等方面对融合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

群众工作是“两新”党组织特别重要的基本任务。《党章》明确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在基层党组织基本任务中有明确规定:“团结、组织党内的干部和群众,努力完成本单位所担负的任务。”“密切联系群众,经常了解群众对党员、党的工作的批评和意见,维护群众的正当权利和利益,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挥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发现、培养和推荐他们中间的优秀人才,鼓励和支持他们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同时,特别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任务做了明确要求。“两新”党组织的工作对象绝大部分是党外群众,其中又有很多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党章》中关于做好群众工作的许多

表述其实很多也是统战工作的目标要求。

“两新”党组织工作具有党建与统战天然融合的特殊性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重心在基层。基层工作任务繁杂琐碎,但同时却具有党建与统战天然的融合性。一是因为工作对象的融合性。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的对象主要是三类: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党员和少数入党积极分子,新的社会阶层党外代表性人士及新的社会阶层普通群众。党外群众在许多地方(如中介和社会组织、新媒体企业等)也就是统战工作的对象。二是因为工作力量的融合性。由于基层专职工作力量不足,党务工作者、统战工作者乃至统战成员往往是一人来担当或身兼数职,工作阵地和活动内容也基本在一起,客观上促成了统战和党建工作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融合态势。尽管这种融合多属于被动和自发状态,但却为以后的自觉状态奠定了一定基础。这实际上彰显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的“基层”的特殊内涵:党外、体制外的基层工作环境,一方面要求我们党应当更多以综合系统的形象而非职能分工的角度去做团结引导的工作;一方面也启发我们,毕竟不是革命年代,在执政状态下,将组织和群众工作融合推进并无太大的阻力,只要坚持信任尊重团结引导和适当区分,我们的统战成员一般都能接受。

“两新”党组织党建与统战工作相互融合具有现实可能性。当然,融合的现实可能性和动力基础在于二者的相互需要性。一方面,统战需要依托党建。一是因为毕竟是党的统战工作,统战工作的开展需要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为前提和条件。二是因为毕竟是党领导全局,新的社会阶层工作应当坚持党建优先,统战要服从服务于党的建设大局。此外,从现实情况看,基层党建各项资源非常丰厚和便利,统战工作完全可以依托利用、资源共享,而不必要完全新起炉灶。另一方面,党建也需要统战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是因为统战可以为党组织密切联系群众提供组织和人才保证。统战成员本身是群众,同时代表并联系着一批群众,通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党员、入党积极分子

和党外代表人士,可以更好完成群众工作任务。尤其在一些党员和党组织覆盖不力的基层地方,统战组织和成员可以发挥拓荒者的独特作用。二是因为统战可以为党组织建设发现储备优秀人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优秀分子,通过统战工作可以推荐输送到党员队伍中,或者输送到统战社团中通过各类安排发挥作用。尤其是在当前非公企业党建迅速发展的态势下,不少地方已经出现入党积极分子很多而党员批准比例有限的矛盾,据报道,三星电子(苏州)半导体公司2015年有741人申请入党,但上级党组织给的入党指标只有5个。通过统战工作,这一矛盾必将得到很大程度上的缓解,这是推进党的干部人才工作的重要方面。

二、新理念与新实践:江苏“两新”党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实证分析

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江苏统战部门贯彻落实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会议和《意见》精神,不断探索新工作理念,不断实践创新,“两新”党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本着具体聚焦、精准分析的研究目的,现将几个方面的实践探索以个案分析的方式呈现。

(一)工作格局共筑

一是积极扩大基层党建的“两个覆盖”。一方面,全省新的社会阶层基层党建“两个覆盖”工作推进成果显著,为统战工作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截至2015年底,全省29.7万多家非公有制企业共有从业党员59.7万多名,单独或联建党组织79923个,覆盖企业27.2万家,党组织覆盖率为92.3%,其中单独建立党组织的非公企业有6.9万家。社会组织党组织总体覆盖率为70%。以注册会计师协会为例,全省共有注册会计师事务所503个,党支部306个(其中独立支部257个,联合支部49个),覆盖率100%。全省13个设区市均建立了行业党组织。13个设区市级注协中有专人负责党建工作,统战和群团工作力量也均配备。在县区层面,大部分地区符合条件的“两新”组织均

建立了党组织。如东台市非公企业近2万家,社会组织186家,全市具备条件的“两新”组织全部建立了党组织,条件不足的全部选派了党建工作指导员,“两个覆盖”动态保持100%。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如昆山,“两个覆盖”也已达到100%。江苏省在非公党建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和工作品牌。

另一方面,在多年实践中,一些基层地方探索建立了行之有效的“两新”组织党建管理模式,保障了“两个覆盖”的有效有力。如盐城市建立了党委统一领导下组织部门抓总、登记管理机关牵头、业务主管部门具体负责的“三位一体”领导机制和“协会加党委”的工作机制。建立各级领导干部“两新”组织党建工作联系点121个,建立律师、注册会计师等9个行业协会党委,形成了业务主管部门党组织管理为主、行业协会党组织为依托,市县分级负责的党建工作机制,下发专门通知,以党组织集中组建攻坚行动不断扩大“两个覆盖”,实现对新的社会阶层有效管理引导。如积极推行“两新”组织登记申报时建立党组织,党建工作信息半年报、“双报双推”等制度。从五个方面明确隶属关系:主管部门党委负责管理与业务主管部门联系比较紧密的“两新”组织党组织,行业协会党委负责管理行业管理比较正常的“两新”组织党组织;社会组织综合党委负责管理行业管理比较松散的“两新”组织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会力量创办的单位党组织负责管理所创办的“两新”组织党组织;乡镇、街道兜底管理没有行业准入限制、没有明确业务主管部门、市场发育尚不成熟的和乡镇、街道新办的“两新”组织党组织等。

二是完善协作协调机制。一些基层地方,如盐城,统战部门与组织部门密切配合,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纳入“两新”组织党建工作体系,扩大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基层党组织覆盖面。他们与相关政府部门共建,形成合力。在盐城市委“两新”工委统一协调下,统战部门与组织、人社、财政、经信等17个部门联合,多领域多层次加强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系服务。如连续四年联

合开展“五好”出资人队伍建设,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一同评比表彰。他们依托“两新”工委平台,统战部门参与到大党建工作格局中,形成了上下联动的局面,有效实现了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和基层组织的联系引导。如以每月固定的“统一活动日”为契机,集中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开展学习活动,深入了解他们的思想工作生活状况。他们注重发挥行业商会协会党组织作用。如 2014 年成立的盐城市总商会党委,把各行业商会协会中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纳入党建统一管理。总商会党委成立以来,积极开展以“铁军精神”为主要内容的红色文化教育、争当“四有”新苏商教育等活动,涌现出江苏仁禾中衡咨询集团等党建与统战融合促进的先进典型。

(二)工作阵地共建

实践证明,单纯就党员而党建的思路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下的“两新”组织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江苏各地锐意探索党的组织建设与统战工作同步推进新思路,以工作阵地共建为聚合点,不断摸索出富有成效的工作模式。

其一:玄武区党建服务中心模式。南京市玄武区中山路国际名品街区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富集的区域,玄武区委统战部与街区所在新街口街道党工委积极探索党建与统战融合发展模式。2012 年,党工委成立“两新”党组织——街区党委,并在推进“两新”组织党建工作过程中,坚持将有一定影响和政治参与能力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思想政治引领纳入大统战格局,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纳入大党建目标任务,开创性地建立了党建与统战相融合的活动平台,2014 年注册成立了具有统战性的开放式、联谊型、服务型社会组织——玄武区新领空间白领服务中心,中心由街区党委副书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担任法人代表、理事长,佳汇大厦党建服务中心为固定活动场地。中心成立两年多来,按照“一中心五阵地”+“五大板块活动”的组织活动架构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企业及白领提供服务对接共 235 次,涉及企业百余家、白领 1500 余人次,开展五大板块各类

活动 80 余场次。同时街区党委将一批代表人士培养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特约检察员、群团组织领导等党外人才或授予荣誉称号,并发展了 13 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入党。党建工作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在共同阵地的建设上取得了相得益彰的良好效果。

其二:吴中区党群服务中心模式。在苏州市吴中区委统战部、组织部等多部门的推动下,吴中区胥口镇在党建基础较好的日立电线(苏州)有限公司设立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示范基地——企业党群服务中心,周边外资企业的管理和技术人员也以日立电线的党群服务中心为基地,定期参与活动,组织学习,接受服务。有了良好的党建及联动运作背景,通过排查摸底、朋友圈发动、筛选考察等方式,吴中区委统战部推动胥口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有序地加入吴中新阶层人士之家“新英汇”组织。“新英汇”平台强化党组织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引领、服务,加强对代表人士的政治培养,引导“新英汇”会员多活动多交流,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紧紧团结在一起。为了让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平台上更能找到归属感,体会到家的温暖,胥口镇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纳入镇党委工作的重点,在推进平台建设的过程中,倡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和党员一道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爱党爱国,并以“文化之家”“温馨之家”“安全之家”“民主之家”“和谐之家”的“五家”为平台建设目标。胥口镇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嫁接在党群服务中心平台,352 名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统战工作扎根在外资企业党群服务中心,融入镇党建大平台,工作得到迅速推进,基层党建变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健康成长的营养土。

其三:虹桥街道公共服务中心模式。南通市崇川区虹桥街道首创“一心、两体、三会”社区组织新架构,即以党委为核心,以社区居委会为主体、社区公共服务中心为载体,同步组建共建协调委员会、“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指导委员会、党员服务群众联络委员会。街道大胆探索“支部建在社团上”

的党建模式,坚持“支部领导社团、党员融入社团、社团凝聚群众”,相继成立各类社团党支部,同时成立社团党建工作室,为社团选派党建引领人,成立服务站,让社团开展服务、参加活动有阵地。虹桥街道虹桥社区以社区公共服务中心为共建阵地,将属地内“两新”组织划归社区管理,建立“两新”组织党支部,通过拓宽发展思路,培育了“孙爷爷谈心室”等一批服务于各界人士的优秀社会组织,同时创造性地在街道、社区探索统战民主协商、联谊交友等传统功能向基层党建、基层社会治理延伸,在推进基层社会组织的成长、激发基层活力、解决民生难题上取得了良好成绩,逐步形成了党建、统战、社会治理融合工作法。

(三)工作力量共享

在推进党建与统战融合过程中,江苏统战部门根据实际条件,通过探索创新,将专职工作力量不足的劣势转化成工作力量融合共享的良好态势,并注重通过基层党组织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党员的示范带动作用,积极打造融合型工作力量,形成以点带面的良好效果。

其一:党建指导员也是统战信息员。南京市玄武区在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过程中,充分发挥党建指导员作用,成功解决了摸清党外代表性人士底数的难题,走出了一条融合新路。过去,要掌握中山路国际名品街区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的基本情况,靠统战部—统战专员—社区书记—社工这一条线,往往有两个问题,一是难以进入企业,情况摸不上来,二是摸上来的人头往往代表性不够。为此,统战部门联合街道和街区党委,聘请多位党建指导员为兼职统战指导员做这项工作并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果。工作成果的取得,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党建指导员一般都是从企业退休的专职党务工作者,经验丰富。二是上门“扫楼”前经过统战部门大量培训,配备专门工作证件,经费由区“两新”工委、街道和统战部门提供,摸上来的越多补贴越多。三是有明确的工作要求和规范,如进门即亮明身份;只“猎头”代表性人士;只做口头了解不当面填表,后台由统战部负责

对初步人选进行筛选等。由于经验丰富、准备充分、又本着增进了解、做好服务的目的上门,党建指导员受到了受访单位的热情接待和积极配合。

其二:“领航工作法”的引领型融合。江苏仁禾中衡咨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梁泽泉是一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同时也是一位认真践行“围绕业务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理念的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领航工作法”,其中就渗透着党建与统战融合发展的因素。集团始终把党建工作制度建设放在首位,制定并认真落实15项制度,其中,党员联系群众制度的规范实施保证了党员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密切关联。扩大党建培训覆盖面,曾选派包括入党积极分子在内的业务骨干40多人到党校学习。采取“学习引航、谈心引导、培训引智”等方法,帮助管理层提高思想认识,加强思想作风建设。切实加强诚信建设,集团首创的党员带领员工向部门、部门代表员工向公司、公司向社会公开承诺“执业质量、服务态度、职业道德”的“三三承诺”做法,得到财政部、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党委的充分肯定。加强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建设,集团工青妇工作均获得国家、省、市、区荣誉表彰,集团管理层与员工、员工与员工关系融洽、团结和谐。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注重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涌现出面临威胁仍坚持原则执业的党员等一批先进典型,带动群众爱岗敬业,依法执业,确保零质量事故。党委关心员工政治生活,积极培养推荐到党委、人大、政府、政协、民主党派、工商联、行业协会兼任相关职务。

其三:“融合工作法”的融入性实践。江苏昆山市台资企业——沪士集团党委书记陈惠芬在约20年党务工作实践中,创造性地将“融和”的理念运用到外资企业党建工作,形成了“融合工作法”,陈惠芬本人更是以“五易办公室”的佳话成为非公党建的传奇典范。事实上,“融合工作法”已经不自觉地将党建与统战工作融合开展了。如坚持方向引领,把教育引导融入亲商服务。企业党组织通过建立制度双向沟通、主动服务排忧解难、文化认同形成共识,做好对资方的教育引导。在双向沟通方

面,建立党组织与企业管理层共同学习制度,引导和监督企业保持健康发展方向。建立党组织与企业管理层联席会议制度,共同研究重大问题。建立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定期召开民主恳谈会,开展“为企业发展建言献策”活动,为企业科学决策服务。这些活动均是以党组织牵头,许多活动的主体是企业中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这实际上已经是统战工作范畴。此外,向上级党组织和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企业合理诉求,争取政策、金融、财税等方面支持,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为台商做好寻医问药、子女入学、家政联系等服务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这些同样也属于非公和对台领域的统战工作。集团党委坚持有为有位,把组织活动融入生产经营。围绕生产经营中心,开展“三亮”、“三区(岗、组)”、“三比”活动,通过提升党员先锋模范形象,企业管理技术人员工作积极性得到有力激发。通过建立员工住院、工伤、分娩“三必访”制度,设立企业职工互助基金等多渠道帮助职工解决实际困难;通过建立“谈心接待日”、劳动争议调解等制度,推动建立企业利润员工分享机制,实施员工福利待遇递增计划等多渠道维护职工权益,协调各方关系,构建和谐企业。在这些党的群众工作过程中,对管理技术人员等群体已然实现了工作覆盖。

以上这些经验表明,只要我们开拓思路、积极实践,向阵地共建和创新工作方法要效益,向工作力量融合方向努力,基层就可以成为拓展统战领域、提高党的凝聚力的前沿阵地,新的社会阶层工作领域党建与统战融合互促的局面就可以期待。以上几种模式,侧重和特色各有不同,但共同特征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紧密依托并服务于党的建设,同时“两新”组织党建也运用统战工作原则和方法中获得发展。

三、“双覆盖”与“双融合”:推进“两新”党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路径选择

尽管在理念与实践方面获得了若干突破,积累了一些工作经验,然而,“两新”党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毕竟不同于传统的统战工作和

“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缺乏可遵循的路径和方法,面临着诸多难点与困境。要突破这些困境,必须进一步更新观念,尤其是统战部门要牢固树立“依托、服务、融合”理念,积极打造“组织、阵地、队伍、方法”四位一体、融合共建的工作机制,构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领域党建与统战“双覆盖”“双融合”的工作格局,努力实现大党建与大统战合力推进党的中心工作的共赢局面。

(一)薄弱环节

1.工作职责认知不足。主要是许多基层党组织对于团结引领的工作任务、党员对于团结联系的义务、党组织责任人对自身为统战工作第一责任人的意识不足。一些党组织固守藩篱,将党建工作仅仅理解为组织工作,对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的任务及其关系理解不够,认为在基层统战不是重点,甚至少数人还有“基层无统战”的意识。“两新”党组织中的党员往往对《党章》中党员必须履行的“密切联系群众”义务认识不够,认为做群众工作、统战工作不是分内之事。统战部门也有认识误区,认为统战工作既然是做党外人士的工作,那就要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党员和非党员严格区分,既然基层党组织固守党建轨道,无法依托,那就只能另辟蹊径、孤军奋战。一些有“闯劲”的基层统战部门,在基层,特别是在党建薄弱或空白地带积极作为,工作有声有色,但除了党外干部政治安排方面与组织部门有合作外,其他几乎无党建色彩,导致区域内许多群众只知有统战组织而不知有党组织。许多相关部门单位的党组织也存在对自身统战职责认知不足,配合不力的问题。一些基层组织中,负责人是党员的,对于建立党组织一般比较积极主动,因为有助于提升负责人地位和本组织“正规化”程度,而一些非党员负责人则颇有疑虑,主要是因为党组织建立后客观上另外形成了一个中心。这种心理在非公企业和社会服务机构中并不明显,毕竟负责人一般都是主要出资人,地位不易撼动,但在社会团体中表现则相对明显。

2.工作依托不够均衡。基层党组织和工作队伍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基层统战工作的基本依托。

虽然总体上江苏省“两新”组织党建“两个覆盖”工作不断推进,但依然存在基层发展相对滞后、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不够均衡等问题。调研中,基层部门反映,“两新”组织自身运转存在不稳定因素,动态变化频繁,上级党组织和归口监管单位很难全面掌握“两新”组织动态,党的工作覆盖相对滞后。部分镇区党(工)委对非公企业党组织管理松散,甚至出现企业已停运但党组织仍未撤销等现象。一些地方党组织虽然覆盖率高,但功能发挥不足,有组织无活动、有分工无人抓、有职责无责任、有安排无经费的现象时常发生,领导力也不够强,主要是队伍不齐,许多富有经验的退休老党员干部受政策限制无法进入企业。相比于非公企业,社会组织的“两个覆盖”率一直发展缓慢,据统计,2010年江苏省社会组织党组织覆盖率为49.2%,而5年后这个数字也仅为70%。发展缓慢的原因较为复杂,其中外部主要是社会组织归口监管部门多、组织隶属关系不够清晰,一些行业协会甚至不知上级主管部门是谁,抓管理抓党建的责任意识还没有普遍建立;而内因则是大部分社会组织自身运转不够规范,工作队伍不整齐,给组织建设和管理带来较大难度,还有许多中介组织人数不多、党员少、工作时间紧张,拿不出专门人员、专门精力搞党建。

3.工作载体壁垒分明。调查发现,联谊组织在团结服务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同时,也存在党内党外界限过于生硬的问题,导致“两新”党组织和新的社会阶层党员不能进入其中实现职能、发挥作用。有基层同志反映,上级要求上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人物库名单,强调一定是党外人士,但在县区层面,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有代表性的非党人士本来就不多,尤其是自由职业者和新媒体人士就更少。而且将形成悖论:如果发展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入党,是否就要退出联谊会?工作做得越好,工作对象就越来越少?许多党员身份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尤其是单位负责人也有这个疑惑。同样,各类党员组织更是壁垒分明,这里有组织原则,也有传统意识的影响,一些可以容纳群

众的组织习惯性地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关上大门。在工作部门联席制度平台方面,一些地方原本已有组织部门牵头的非公党建联席会议,为加强工作又计划新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组织党建联席会议,工作初衷很好,但工作效果并不会很理想,因为新旧两个联席会议的成员单位基本一致,增加工作内容只能是重复劳动,而且缺少组织部门牵头,统筹力度将大为削减。

4.工作方法缺乏融合。调研发现,一些基层统战部门组织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活动要么过于行政化,要么过于娱乐化。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一些教育培训理念较为陈旧,方式较为单一,许多内容脱离基层实际,很难满足思想活跃多元的学员的接受心理和学习需求;而在进行联谊联系、服务对接时,一些活动则一味迎合工作对象的休闲娱乐心理,刻意回避红色主题,导致活动效果热闹有余而导向不足。还有一些基层党组织组织的覆盖党外人士的活动往往在内容和形式上无法兼顾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需求。

5.工作指导协调有待加强。当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在新的起点上开局,虽然从2001以来开展了一些领域的工作,也相继出台了几个相关政策文件,在基层统战方面也有了多年的积累,非公党建方面也有相当多的政策文件基础,社会组织党建也有政策文件,但具体落实到“两新”党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方面,则相关政策指导就显得过于宏观或针对性不足,关键是党建与统战的融合思路不够清晰。调研中感觉很明显,基层对于政策指导的需求非常迫切。关于该项工作最新政策精神的宣传普及力度欠缺,县区级以下了解和掌握相关政策精神的渠道有待畅通。由于工作缺乏相对明确统一的要求,加之目前已有的一些工作典型特殊性有余而可复制性不足,导致工作指导性和规范性不够。

(二)对策建议

1.提高认识,明确职责。一是要更新理念,提高认识,在新的社会阶层基层统战领域牢固树立党建与统战“双覆盖”“双融合”思路,即党的组织建

到哪里,党的统战工作就开展到哪里;党的统战工作开展到哪里,党的各项工作就覆盖到哪里。要从《党章》规定的党组织基本任务和党员义务出发,明确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是党组织和党员的基本义务,是实现和体现党的宗旨的基础工作,党的各级组织是开展统战工作的主体力量。要深刻理解党的组织工作、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的内涵和相互关系,明确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是做好统战工作的组织和政治保障,开展统战工作是服务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方式。做好统战工作完全可以成为组织工作的先锋,即牢固树立“依托、服务、融合”理念,对于没有党组织的空白地带,通过先行选派统战工作联络员等方式延伸工作触角,建立统战工作基地,扩大党的影响,发现培养优秀分子,待时机成熟后协助建立党组织,实现党建覆盖并进一步深化统战工作。“双覆盖”的基础是“双融合”,即党建与统战在工作力量上实现融合、在平台载体方式方法等工作机制上实现融合,具体而言,是努力营造“组织、阵地、队伍、方法”四位一体、融合共建的工作机制和良好态势,实现党的组织、统战、群众工作协同共进的共赢目标。二是准确把握组织起来的科学内涵,树立分层分类、相互融合的组织运作思维。组织起来当然要以基层党组织和党建为基本依托,但并不意味着在每个“两新”组织中都建立党支部。有意愿建立也适合建立的可以建立,没有意愿建立的不宜强行推进,否则会引起负责人抵触或弱化代表性人士的作用。调研中有基层同志建议,对于没有意愿或条件建立党支部的社会组织,在单个具体社会组织之外建立联合支部可能是个好办法。但不管是何种组织,都必须善于运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乐于接受的方式开展工作,要以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社会化、网络化为基本方向和途径。

2.理顺关系,加强依托。一是在继续深化“两新”组织党建两个全覆盖的基础上补好短板。一方面加强非公企业党组织领导力建设,选配、培养专职党务工作者充实党组织领导班子,通过合理发

挥老同志传帮带作用,注重培养年轻党务干部。另一方面,要发挥社会组织党工委统筹领导作用,重点解决社会组织党组织关系理顺问题。根据中央关于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方案,社会组织的党建管理体制将由业务主管部门负责、登记管理机关配合的方式逐步改为由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机构统一领导管理,地方上的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由省市县社会组织党工委负责。关系理顺之后,社会组织党工委应当认真履行统战职责,统筹谋划本领域、本地区社会组织统战工作,督促指导所属社会组织党组织开展统战工作,发挥行业或区域党组织的枢纽作用,指导社会组织基层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鼓励社会组织中的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做好代表人士的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二是整合基层党组织、基层统战部门、相关部门单位党组织工作力量,建设“编外统战干部”队伍。在努力争取设立统战专职工作力量的基础上,总结推广南京市玄武区党建工作指导员与统战工作者融合工作的经验,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统筹协调作用,将党务工作者、统战工作者、党建指导员、统战指导员、社区干部、社工、志愿者等各方力量整合起来,通过项目制、模块化等方式,通过加强各工作力量相关党建、统战、群众工作理论政策、方式方法方面的综合培训,提升工作能力,打通组织、统战、群众工作区隔,实现力量融合。三是在工作队伍融合基础上促进阵地融合。要总结推广玄武区、吴中区、虹桥街道的阵地共建经验,学习借鉴北京、上海、武汉等地有益经验,努力形成阵地共建切实有效的工作模式,拓展阵地融合的广度和深度。

3.加强组织,强化融合。一是通过设立团体会员制度等方式将党员合理纳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组织。新的社会阶层联谊组织不应排斥党员,但应当以合适的形式将党员和党组织容纳进来、联结起来。调研中,有同志建议借鉴工商联的做法,在新联会中设立团体会员制度,这样一些新的社会阶层组织的党员负责人就可以该组织的代表参加进来。当然,党员比例不能太高。此外,新联会

中的党员也应当组成党支部,当然运作上可采取会外的方式,尽量避免非党会员的不适感。实践证明,适当比例的党员可以在新联会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影响,进而带动党外会员。二是以组织和活动共建促进融合。一些传统党建类组织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建立外围组织等方式吸纳部分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进入。关键要注重通过共同组织活动扩大包容面,如共同搭建一些基层协商、志愿服务等活动载体,通过项目制、积分制等形式,汇集党内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增进交流、汇聚力量。三是继续加强队伍建设出口阶段的合作。统战部门要积极会同组织部门、人事部门研究推动扩展政治吸纳、社会安排、改革公务员招录政策等,为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进入体制拓宽路径。四是整合提升联席会议制度效能。注重体现实际效能,视情况或者在基层现有的非公党建联席会议制度之中增加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联席专项,这比较符合许多基层的实际;或者在该项制度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之间,建立双边协调协作机制,如规定定期研究涉及新的社会阶层基层党建与统战的有关重点问题。

4.方法融通,相互学习。一是明确“两新”党组织工作方式的特性。新形势下,在体制外工作环境中,“两新”党组织和新的社会阶层组织中的党组织不再完全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更多需要依靠团结引导、联谊交友等统战工作方式实现和坚持党的领导,因此在新的社会阶层党组织中充分发挥统战工作职能作用、以社会化和网络化方向创新方式方法、以非行政化或弱行政化的方式实现组织意图就显得尤为重要。二是要正确处理好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发挥优势、相互学习,力避行政化和娱乐化倾向。建议进一步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更贴近新的社

会阶层人士内心、情感和实际,在形式上更符合他们的工作环境、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充分发挥网络和新媒体的渠道优势,注重寓思想引导于服务帮助之中,注重实践体验与实践锻炼,不断提升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坚持底线思维,对错误苗头敢于和善于斗争,在交流交锋中交融共进。要举办和创新丰富多彩的活动,通过活动加强联系、提供服务、发现人才、发挥作用,力争让每一个活动都能最终指向凝心聚力,指向巩固和完善党的领导,在这方面,组织部门和统战部门都各有传统优势,完全可以做到优势互补。

5.加强指导,探索创新。一是尽快研究制定“两新”党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相关政策文件。建议综合本领域已有的相关政策文件精神,进一步提升融合理念和提炼各地实践探索成果,尽快研究制定“两新”党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专项政策文件。政策文件务求务实管用,通过调动组织部门和统战部门工作积极性,制定科学合理、系统明确的工作标准,对工作是什么、为什么做、谁来做、做什么、怎样做、效果怎样评判等“四梁八柱”做出清晰的谋划部署。推进相关重点政策尽快出台。二是设立“两新”党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示范点。在一些条件成熟的地方,根据层次类别设立若干示范点,建立探索创新机制,先行先试,为面上工作积累经验。三是加大工作宣传力度,营造积极工作氛围。通过组织、统战、宣传等党的工作部门,通过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渠道,加大对优秀人物、典型经验、实践创新示范点的宣传,以点带面,推动工作;加强理论政策研究,在全社会营造党建与统战融合共赢的良好氛围。

编辑:郭晓东

宗教组织开展慈善事业的资源构成研究

——以江苏省 S 市基督教为例

刘 影 孙卉樱

摘 要: 本文以江苏省 S 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为个案,考察了当前宗教开展慈善事业的资源构成状况。研究发现,教会内部拥有较为丰富的人力资源;资金资源逐年增加,财务监督机制也较为完善;教会同时还努力在其与世俗世界发生交集的过程中争取关系资源,为宗教开展慈善公益拓展领域。

关键词: 基督教;慈善;资源

中图分类号: B9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码:** 1672-3163(2019)01-00060-04

一、引言

作为宗教组织进入社会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宗教慈善或公益事业越来越多地出现于公众视野。这一事实源于内外两种力量,一方面来自政界与学术界的推动,他们对中国宗教界的社会性予以强调,不仅希望宗教界在公序良俗、社会道德、稳定人心等发挥作用,更希望宗教界以各种类型的宗教组织为基础,在诸如社会福利、扶贫抗灾、民间互助等方面体现出实质性的参与;另一方面,宗教组织作为具有自我理性的“行动者”也在不断探索其发展之道,越来越多的信徒认识到,信

仰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怎样“活出信仰”。由此,无论是主动希望或被动期待,宗教慈善,作为适应和服务社会最佳途径,开始陆续呈现出来。

那么,宗教组织开展慈善公益事业的现状如何呢?以基督教为例,国家宗教局这样评价其社会服务:“基督教界重视社会公益慈善活动的领域主要包括:医疗卫生;养老托幼;助残扶贫;助困资学;灾害救助;公共设施建设;环境保护等。目前的慈善义举多数具有临时性、突发性、偶然性、应急性、零散性、随机性、单一性等特征,还远未形成社会服务及公益慈善事业参与的机制化、常态化。多

收稿日期: 2018-12-20

作者简介: 刘影(1982-)江苏南京人,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孙卉樱(1983-)江苏南京人,南京市六合区委党校讲师。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2017 年度“资源动员视角下宗教慈善转型及风险控制研究(17CSH080)”、2016 年度江苏省教育厅、南京农业大学课题“农村空心化背景下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研究——以江苏省为例(2016SJD840001、SKPT2016028)”的阶段性成果。

数活动尚处于自发自愿、分散无序的状态,大都缺乏长远规划。有的还未走出初期零散的、自发性的、信徒间友爱互助的内部服务模式;有的仅是为应付各级有关部门的号召和要求。”^[1]华东师范大学李向平教授带领的学术团队在对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三省市的基督教慈善调研中也发现,“长三角基督教开放堂点共计 8192 处,他们的公益慈善参与限于其宗教团体身份,通常以直接的资金、人力输出为主。公益慈善参与的范围主要包括敬老养老服务、社区服务、社会救济、社会援助及教会内部的肢体互助……呈现小规模、有限范围、不完整的特征”^[2]。类似的结论还可见于王莹^[3]、黄海波^[4]等学者的研究中。

而本研究的考察对象——江苏省 S 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其开展的慈善活动则突破了以上结论框架,更加凸显出“现代慈善”的意蕴:从内容上看,S 市已开展的社会服务中既有常规的慈善活动,如助学、救灾,更有新型的慈善形式,如环境保护、心理咨询、文化艺术,社区建设等,可持续性显著;从受益人群上看,既有信仰共同体中的人,更兼顾到一般社会大众;从组织性上看,S 市教会开展的慈善活动多为制度性的,而临时、无计划性的活动极少。

由此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相似的政策环境下,各地教会开展慈善、公益活动呈现不一样的局面?有的教会组织限于捐钱赠物这样传统的慈善活动,而有的教会却可以结合自己优势而开展面向大众的带有公益性质的慈善活动?作为一个仅拥有 2 个教堂,8 个聚会点,10 名教牧人员的教会组织,如何整合各方或神圣或世俗的慈善资源成功实现以上公益产品的呢?更深层次,透过慈善这面棱镜,透视出怎样的教会-社会的实践关系呢?通过研究我们发现,教会拥有的人力资源、资金资源以及关系资源共同作用造就了 S 市教会的慈善公益事业,下文我们逐一说明。

二、人力资源:慈善事业的主体

(一)教会领袖

“一个教会发展的好坏往往取决于这个教会

的带领者与传道人的组织与教导,他(她)是这个教会的掌舵者,也是这个教会的灵魂性人物。他们的个人素质和魅力往往能够决定教会未来的发展以及对个人生活起到的作用……”^[5] S 市教会的领导者 G 牧师对于自己的评价是“我跟人家打交道,一是一,二是二,以诚待人。”

同时,教会中的其他教牧人员以及年长的信徒对这位教会领袖都敬佩、赞赏有加,高超的人际交往能力和围绕教会发展的战略眼光为他个人赢得了信徒们的信任与尊敬。

有学者在对中国教会进行考察时都发现教会领袖的重要作用。如欧阳肃通认为,教会发展如何,关键还是取决于教会组织者的能力和见识^[6]。总的来说,代表着传统型权威的家庭背景、财产在其中并不占主导地位,而个体的人格、行为、能力及资历则是权威获得主要方式^[7]。S 市 G 牧师确实符合这样的情况,家庭背景、讲道水平固然重要,但 G 牧师个人的智慧、处事方式可以成为其个人威望获得的重要途径。

(二)义工

随着信徒的增加以及教会各项事工的开展,人才紧缺是中国内地教会面临的普遍问题,仅仅依赖每年从神学院毕业的学生来充实教牧团队仍然无法完全满足信徒的灵性生活的需求以及教会事工的要求。对照 S 市各个堂点的的牧师与信徒人数,我们发现二者比例一度高达 1:2000。在这样的环境下,教会吸收了一些数量的信徒担任教会义工,由他们来承担大部分的教会事工。这些义工本身有自己的世俗领域的工作,他们多是在工作和家庭事务之余到教会参加志愿活动。这些活动无任何物质回报,相反,需要付出自己的时间、精力甚至金钱,约束他们的不是类似于工作契约的有形规定,而是他们内心的信仰法则和对教会事务的使命感与承诺。

一般来说,当教会内开展重大公共活动,比如低碳环保义卖这样的慈善活动时,都需要大量的义工参与其中。但这个人群并不相对固定,如果有义工因为家庭或工作的原因逐渐淡出教会侍

奉,则成为一般平信徒;而相反,有的平信徒出于自身的宗教诉求或其他原因逐渐投身于教会事工之中而成为义工。并且,因为教会内各种团契活动较多,无论是义工还是平信徒,尤其是那些活跃的平信徒,都可能定期聚会、联谊,互动密切,信徒个体也就经常游走于这两个不同的群体之间。简言之,义工成为教会中重要的人力资源,他们的参与式管理又为教会资源动员能力的再生产提供了一个运作平台。

三、资金资源:慈善事业的源泉

(一)资金来源及监督机制

众所周知,一项慈善活动的开展离不开资金支持,具体的,我们需要回答这样几个问题:教会拥有多少资金资源?为了确保资源发挥最大功效教会建立了哪些透明化的监督机制?

总体来看,S市教会没有属于自己的经济实体单位,其资金主要源自以下两个方面:信徒奉献以及个别堂点出租房产而获得的收入,后者所占比重非常小,因此我们重点看一下信徒奉献收入的组成部分,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日常的普通奉献,包括每周的主日礼拜、培灵会、基督教节庆日崇拜等各种团契时信徒的奉献。在每个教堂礼拜厅的入口都放有一个“奉献箱”,如果信徒想奉献就直接把现金投入到奉献箱。

第二种为主题奉献。主题奉献分为定期和临时两种。每年1月份的第二个主日为爱心奉献日,这一天的所有奉献款专门用于一个公益项目。另外教会每年还会举办两次资助神学院的主题奉献。除了这种定期的主题奉献外,还有一些临时性的,如突然发生灾害之时,教会里也会专门组织奉献活动。通过各堂点每周粘贴于教堂大厅墙壁上的财务报表,笔者跟踪到近四年各堂点的财务收支情况。总体来看,各堂的奉献收入与信徒比例是大致相当的,具体表现为,信徒最多的堂所得奉献收入也最多,其中,居于市区的教堂收入获得奉献款数量相对最大;各堂点的奉献款都在逐步递增之中,这些变化与信徒人数增加、信徒经济收入提

高、信徒的奉献意识增强有密切关系;遇到特殊的重大事件时,各堂点的奉献款也会出现波动。

此外,完善的财务管理及监督机制是维持宗教组织的社会信任及确保永续经营的基础,教会具体采取哪些措施保障资金透明化的呢?从访谈来看,教会在资金管理规范方面比较重视,用牧师的话说,“钱管的清楚,我们自己也轻松”。首先,教会有明确的财务制度,该财务制度不仅规定了教会财务的整体管理架构,对于一些日常涉及资金操作环节也给予了具体的技术性规范,例如如何开具收据以及对于奉献箱的管理。除了做好内部把关外,各堂点每个月还会把收入支出表粘贴于大堂门口,表的下方附有负责人与制表人的签名,以供信徒随时查阅。

(二)慈善资金

慈善资金,作为教会资金资源的一部分,主要分为定期和不定期两种。所谓定期,例如教会内部的爱心基金、神学基金;除此之外,当遇到重大自然灾害或者有特别需求的时候,教会也会专门发动主题捐献。

同样是慈善资金,但教会与一般公益组织的慈善资金呈现出稍许不同之处,笔者归纳有两点:第一,一般公益机构在获取资金资源时相对处于一个不太稳定的状态,因为其潜在捐助者的范围广而分散,而教会,因为拥有一个庞大且相对固定的信徒群体,所以其资金资源更加稳定、持久。但是,与强调资金开放透明不同的是,资金捐赠者(信徒)对于慈善公益活动的规范化要求并不十分明确,这与信徒对宗教组织与生俱来的信任不无关系。例如,当笔者向信徒问是否关注慈善资金的去向问题,是否担心教会挪用奉献款时,信徒们表现出对教会组织的完全信任。围绕资金透明度的问题,信徒们有他们自己的解释,“他们(指教会负责人)对上帝交代”,甚至有些信徒认为对教会产生疑问是个人信仰上的不坚定。

不可否认,虽然身处日益原子化的社会中,但信仰共同体为信仰成员提供了持续的沟通、交流,这种沟通交流形成了信徒个体之间以及信徒对宗

教团体的信任关系,但是这种坚实的信任关系又对宗教慈善公益事业带来了一些负面作用,即宗教慈善行动领域同现代公益事业领域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异性的规范要求和运作逻辑,现代专业标准和制度要求在宗教的伦理标准和制度规范面前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从长远来看,为了提高宗教公益活动的质量,专业化、资金问责等符合现代公益要求的机制也应该被应用于此。

四、关系资源:世俗领域的尝试

关系也是一种资源^[8]。当我们考察资源时,资源的数量和资源的关键程度是两个重要的维度。某种资源,即使在总投入中只占有较小的一部分,也有可能对组织非常关键^[9],关系就是这样一种看似数量不大但却可能起到很大作用的资源。

通过访谈,笔者发现,教会作为一个信仰共同体,团体界限分明,但也不排除以个人为中心的关系网模式,并且这种关系网直接用于为教会发展,包括宗教慈善动员的过程中,尤其当我们考察教会如何通过各种“关系”动员政府方面为自己开展慈善活动保驾护航时,这种关系资源显得尤为重要。

教会G牧师坦言他非常重视与政府关系的建立、维护,他认为,教堂虽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场所,但是并不表示与社会完全隔绝,相反,从教堂建设到教会社会性事务如慈善都离不开与政府的互动。谈到互动,牧师非常强调要积极主动,“经常走动,教会办起事情更加容易一些。”由于教会领袖个人同时深处几个不同的群体——既作为教会的领袖,同时又是市人大代表,每一个群体中都相应地形成一张关系网,置身于不同的群体就会置身于数张不同的关系网中。G牧师就通过这样的关系网为教会带来更多的资源。教会具体采取的策略是先积极主动的沟通,把一种工具导向的关系加入感情元素而演变成混合性关系,在获得政府的信任和认可基础上再进行进一步的活动。

简言之,虽然教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神圣共同体,但它仍然需要与世俗世界交往沟通,在这过程中,关系已经变成了一个与其他资金、人力并列的非常重要的资源。但是目前S市教会所拥有的

这些关系资源也面临不足的困境,具体体现在关系维度比较单一,主要依赖于教会与政府的互动,而媒体、企业参与其中的机会较少,且目前已有的关系资源主要基于教会领袖个人的政治身份而形成,可持续性有待考证。

五、结语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人力资源、资金资源以及关系资源共同作用造就了S市的慈善公益事业。首先,教会内部拥有较为丰富的成员资源。从神职人员到义工,大家各司其职而又通力合作,这些宝贵的成员一方面作为开展慈善活动所必需的成员资源,同时他们作为主体也成为资源动员的媒介途径。其次,就资金资源而言,近几年教会财务逐年增加,财务监督机制也较为完善,但对于慈善资金去向的跟踪还与现代公益要求有差距。最后,作为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教会努力在其与世俗世界发生交集过程中争取关系资源,但目前S市教会所拥有的关系资源主要基于教会领袖个人的政治身份而获得,其可持续性有待观察。

参考文献:

- [1] 国家宗教事务局二司. 中国基督教公益慈善事业回顾与展望 [EB/OL]. <http://www.mzb.com.cn/html/Home/report/311201-1.htm>.
- [2] 彭尚青. 当代中国基督教慈善主体及其特征——对长三角地区基督教慈善事业调研的思考[J]. 李向平、文军. 中国信仰研究第三辑[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149.
- [3] 王莹. 身份建构与文化融合——中原地区基督教会个案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53.
- [4] 黄海波. 宗教性非营利组织的身份建构研究——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为个案[J]. 中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9-30.
- [5] 石丽. 基督教信仰与团体秩序建构——以城市非体制教会个案为例[J]. 中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128.
- [6] 王铭铭. 村落视野重的文化与权力: 闽台三村五论[M].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69.
- [7] 杰弗里·菲佛等. 组织的外部控制——对组织资源依赖的分析[M]. 闫蕊,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6: 52.

编辑: 徐晓婷

宗教信仰的代际传递

——基于 CGSS2010 的实证分析

汪 虎

摘 要:随着“宗教热”社会现象的出现,围绕宗教问题开展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但鲜有根据全国性的统计数据开展的实证研究。本研究基于 2010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数据,考察了宗教信仰的代际传递这一对宗教发展有重要影响的问题。研究结果有以下发现:宗教信仰的代际传递是影响个人宗教信仰的重要因素,整体来看,母亲对子女的信仰选择影响比较大;父母的宗教信仰对子代宗教信仰的影响是有性别差异的;年龄、户口、民族、受教育程度等人口特征也是影响个人宗教信仰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宗教信仰;代际传递;性别

中图分类号:B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672-3163(2019)01-00064-06

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 年我国信教比重仅为 6.1%,而 2010 年信教比重则增加了 12.7%。另外,根据社科院 2008-2009 年所做的中国基督教入户问卷调查(CASS2008-2009),在我国具有基督教信仰的个体中,1965 年以前信教占比 3%,1966-1981 年间信教的占比 5.7%,1982-1992 年间信教的占比为 17.9%,1993 以后信教者所占比重则高达 73.4%。^[1]

为什么信教者会越来越多?这一疑问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宗教热”问题进行研究,有学者从公共文化供给的角度切入,也有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切入,还有从社会化的角度切入,总之,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深入。

而宗教信仰的代际传递作为宗教得以存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国内则未被过多研究,尤其是基于全国性调查数据开展的实证研究,而国外关于此方面的研究虽然不少,却都主要围绕具有浓厚基督教传统的西方国家展开,宗教社会学似乎陷入了特纳所言的“基督教社会学”的怪圈。因此,为了对中国人宗教信仰的代际传递问题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本研究将利用 CGSS2010 调查数据,对这一问题展开实证分析。

一、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缩写为 CGSS)2010

收稿日期:2018-11-10

作者简介:汪虎(1994—),男,汉族,河南信阳人,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专业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宗教社会学。

年收集的数据。调查对象为16岁以上的居民,有效样本数量为11785个。本研究选取有关宗教方面调查的变量,除去缺失值,进入分析的样本共有4231个。

(二)变量测量

1. 因变量。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子女宗教信仰”,为定类变量。考虑到我国有宗教信仰的人占比较低,且大部分宗教的信仰者的人数不是太多,为了更好地进行统计分析,笔者在本研究中将宗教信仰这一变量重新编码为2个类别,即“有宗教信仰”和“无宗教信仰”,占总体比例分别为86.1%和13.9%。

2. 自变量。本研究的自变量是父母亲的宗教信仰,即“父亲的宗教信仰”和“母亲的宗教信仰”这两个变量。需要说明的是以上两个变量在问卷中没有直接对应的问题,考虑到人的宗教信仰在一般情况下不会改变,笔者分别将问卷中对应的两个问题“在您小时候,您父亲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和“在您小时候,您母亲的宗教信仰是什么?”作为“父亲的宗教信仰”和“母亲的宗教信仰”的操作化变量,类别划分与因变量一致。父亲有宗教信仰和母亲有宗教信仰的比例分别为14.2%和20.1%。

3. 控制变量。本研究将控制现有文献所提出的解释变量,包括了子女的年龄、性别、民族、户口、教育、婚姻、收入等情况。在本研究中,民族划分为两大类,即汉族和少数民族;户口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婚姻状况划分为已婚和未婚;教育被作为定序变量,依次划分为未受过教育、小学、初中、高中、本科及以上;收入则取对数,再放入模型中。

(三)分析方法

本文采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并建构了四个模型:在模型一中,我们加入了父亲宗教信仰和母亲宗教信仰这两个变量,这是为了初步考察父母亲宗教信仰情况对子女宗教信仰的影响。模型二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加入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变量,这是为了进一步考察在控制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后,父母

亲宗教信仰对个人宗教信仰的影响。模型三是在模型二的基础上再加入民族、户口、受教育程度和收入的对数这几个变量,这是为了考察父母亲宗教信仰对子女宗教信仰的影响是否受到以上所加控制变量的影响。最后的模型四是在模型三的基础上加入了女性和母亲宗教信仰、女性和农村户口、少数民族和母亲宗教信仰这三个交互项,这是为了更进一步地考察父母亲宗教信仰对子女宗教信仰的影响是否受到以上交互项的影响。在对不同模型进行比较时,我们采取似然比检验方法(likelihood ratio, LR)。

表1 变量测量及其分部情况

变量	计数	百分比
个人宗教信仰		
无信仰(参照组)	3643	86.1
有信仰	588	13.9
父亲宗教信仰		
无信仰(参照组)	3630	85.8
有信仰	601	14.2
母亲宗教信仰		
无信仰(参照组)	3382	79.9
有信仰	849	20.1
性别		
男(参照组)	2060	48.7
女	2171	51.3
民族		
汉族(参照组)	3800	89.8
少数民族	431	10.2
户口		
非业户口(参照组)	2005	47.4
农业户口	2226	52.6
婚姻		
未婚(参照组)	3670	88.8
已婚	465	11.2
教育		
未受过教育	576	13.6
小学	991	23.4
初中	1214	28.7
高中	842	19.9
本科及以上	608	14.4

二、研究结果

(一)描述统计

1. 信仰代际流动情况

表2为父母宗教信仰及子女宗教信仰交互表,我们据此来描述信仰代际流动的情况。首先,从父亲宗教信仰与子女宗教信仰的交互结果来看,无信仰群体的继承率非常高(93.3%),有信仰群体的继承率相较而言较低,但超过了50%。其次,从母亲宗教信仰与子女的宗教信仰的交互结

果来看,无信仰群体的继承率也非常高(88.3%),有信仰群体的继承率为 71.6%,这个结果较父亲与子女的交互结果而言高出不少。由以上数据我们可知,中国人都大部分都无宗教信仰,且这种无宗教信仰偏好极大概率地传递到了子代,由此也导致子代中无信仰的群体所占的比例也非常大。但母亲有信仰时对子代信仰宗教的影响要高于父亲。最后,当父母双方信仰相同时,子女的继承模式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大部分子女还是继承了父母的宗教信仰偏好。

2.信仰的世代分析

表 3 为宗教信仰在不同世代中的分布,本文大致将世代分为了三个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通过表格我们可以发现如下特征。第一,不同世代有宗教信仰的人群占比总体较为稳定。从历史数据来分析,无宗教信仰人群所占的比例总体稳定在 85% 上下,有宗教信仰的人所占的比例虽然呈现微为下降的趋势,但差异并不明显。这说明我国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个人的宗教信仰并未因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受到太大影响。第二,年轻世代倾向于无宗教信仰。改革开放后出生的 80 后、90 后无信仰比例扩大,这应该与这一时期内社会经济与都市化迅速加速的这一进程有关。成长于这一时期意味着社会的宗教需求宗教氛围的整体下降。也有学者指出,知识水平对个人无宗教信仰的倾向呈正相关。^[2]改革开放后,国家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制定了“科技兴国”的战略,高等教育也在这一时期开始扩张,年轻一代接受

表 3 宗教信仰的世代

个人信仰	世代			N
	1949 之前	1949-1978 年	1978 年之后	
无信仰	751 (84.10%)	2207 (85.41%)	625 (87.41%)	3583
有信仰	142 (15.90%)	341 (14.59%)	90 (12.59%)	573
总 计	893 (100%)	2548 (100%)	715 (100%)	4156

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加,这无疑将对他们的宗教信仰产生影响。

3.性别差异

通过统计数据,我们发现在女性群体中,无信仰所占的比例为 83.60%,有信仰所占的比例为 16.40%;在男性群体中,无信仰所占的比例为 88.74%,有信仰所占的比例为 11.26%。由上可知,整体而言,中国人中绝大部分的人还是没有宗教信仰的,这一点不管是在男性群体还是在女性群体中都是如此,但将男女两个群体中有信仰的比例进行对比时,我们还是发现他们之间存在较大差别,女性有信仰的比例比男性有信仰的比例高出 45.65%。本研究的数据也证实了宗教信仰倾向与性别因素存在一定的关联,这与前人的许多研究结论是吻合的,即女性更倾向于具有宗教信仰,而男性无神论者的比例明显超过女性。

4.宗教信仰的年龄分布

表 4 表明,有信仰和无信仰的人群在年龄分布上存在一定差异,但差异并不显著。从各个年龄组来看,随着年龄的增加,无信仰群体所占的比例呈现下降的趋势,而有信仰群体所占的比例则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但需要说明的是无信仰群体在各个年龄段所占的比重均高于 85%,而有信仰群体中,所占比

表 2 父母及子女宗教信仰交互表

子女宗教信仰	父亲宗教信仰		N	母亲宗教信仰		N	父母共同宗教信仰		N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356 (60.5%)	232 (39.5%)	588	421 (71.6%)	167 (28.4%)	588	348 (68.6%)	159 (31.4%)	507
无	245 (6.7%)	3398 (93.3%)	3643	428 (11.7%)	3215 (88.3%)	3643	221 (6.5%)	3191 (95.5%)	3412
N	601	3630	4231	849	3382	4231	569	3350	3919

表4 宗教信仰的年龄分布

宗教信仰	年龄组 (单位: 岁)					N
	18-29	30-39	40-49	50-59	60及以上	
无	538 (87.8%)	694 (88.1%)	840 (84.9%)	725 (86.3%)	843 (84.6%)	3640
有	75 (12.2%)	94 (11.9%)	149 (15.1%)	115 (13.7%)	154 (15.4%)	587
总计	613 (100%)	788 (100%)	989 (100%)	840 (100%)	997 (100%)	4227

例最高的年龄段(60岁以上,14.70%)和最低的年龄段(19-29岁,12.00%)相差并不大。

5. 宗教信仰的学历分布

表5表示不同受教育层次的群体宗教信仰的分布,可以看到不同学历段宗教信仰的情况存在差异。首先,我们发现随着受教育层次的提高,无信仰群体所占的比例呈现上升的趋势,这表明受教育层次越高的人信仰宗教的概率降低。其次,不同受教育层次群体中无宗教信仰者所占的比例虽然都在80%以上,但有宗教信仰者所占的比例也存在不小的差异。具体来看,未受过教育的群体中,有宗教信仰者所占的比例达到了本科及以上受教育层次中的2倍多。而未受过教育和小学群

表5 宗教信仰的学历分布

宗教信仰	受教育层次					N
	未受过教育	小学	初中	高中	本科及以上	
有	111 (19.3%)	170 (17.2%)	156 (12.9%)	98 (11.6%)	53 (8.7%)	588
无	465 (80.7%)	821 (82.8%)	1058 (87.1%)	744 (88.4%)	555 (91.3%)	3643
总计	576 (100%)	991 (100%)	1214 (100%)	842 (100%)	608 (100%)	4231

体中,有宗教信仰者的占比极为相似,初中和高中受教育层次的群体中,也是如此。

(二) 模型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的代际传递情况,本文采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进行分析,拟合后的logistic回

归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6所示。

在模型一中,我们只加入了两个变量——父亲宗教信仰和母亲宗教信仰,我们看到,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的宗教信仰情况都显著地塑造了子女的宗教信仰情况。具体来看,在母亲有宗教信仰的情况下,个人信仰宗教的发生比提升至6.750倍,父亲的宗教信仰情况虽然较母亲低,但在父亲有宗教信仰的情况下,个人信仰宗教的发生比仍提升到了4.689倍。这进一步印证了我们从父母宗教信仰和子女宗教信仰的交叉表所得到的结果。值得说明的是,在我国,父母均无宗教信仰的情况较为普遍,而这一宗教信仰的偏好也对子女的宗教信仰产生重要影响。

为了进一步考察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父母宗教信仰对子女宗教信仰的影响,我们开始逐步在方程中加入一些控制变量。首先,我们在模型二中加入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这三个控制变量。从性别来看,我们也发现男性群体和女性群体之间存在巨大差别,数据显示,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信仰宗教,女性信仰宗教的发生比是男性的2.138倍。此外,我们也看到年龄的增加会对个人的宗教信仰产生显著的影响。具体从模型的发生比来看,年龄每增加一岁,信仰宗教的发生比提升至1.010倍。研究结果也显示,个人的婚姻状况对个人的宗教信仰的影响并不显著。国外学者所作的相关的研究显示,子女的婚姻状况会影响自身对父母宗教信仰的感知,相较而言,已婚子女更可能选择保留儿时的宗教信仰。^[3]本研究并未证实这一点,这可能跟本研究数据有宗教信仰的样本不大以及各宗教信仰群体之间的差异被掩盖有关。

除了性别、年龄和婚姻等因素外,民族、户口、教育和收入等因素也会对个人的宗教信仰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又在模型二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加入了民族、户口、教育和收入的对数这几个控制变量设计出模型三。结果显示,父母亲的宗教信仰对子

女宗教信仰的影响仍然非常显著 ($P < 0.001$)。性别变量对子女宗教信仰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著,可见宗教信仰的代际传递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年龄这一变量的影响则变得不显著。另外,从新加入的控制变量来看,民族和教育对宗教信仰的代际传递具有重要影响。具体来看,少数民族对人的宗教信仰倾向有重要影响,且非常显著 ($P < 0.001$),从模型的发生比看,少数民族群体有宗教信仰的发生比率是汉族群体的 2.441 倍,由此可见,影响是非常大的。至于教育,我们发现受教育程度对宗教信仰的代际传递也具有显著影响 ($P < 0.1$),而关于教育对个人宗教信仰的影响,学界已多有研究,例如国外学者 Pollner 研究指出,教育促进了人们对于复杂符号系统的理解,从而改变了个人对宗教性的认知。^[4]

最后,在模型四中,我们加入了女性和母亲有宗教信仰、女性和农村户口、少数民族和母亲有宗教信仰这三个交互项,这是为了进一步考察父母的宗教信仰对子女宗教信仰的影响是否受到性别、户口和民族的调节。女性和母亲宗教信仰交互项影响不显著,这与西方的文献的解读存在偏差,

表 7 Logistic 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发生比率)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父亲有信仰	4.689***	5.119***	4.965***	4.884** *
母亲有信仰	6.750***	6.967***	6.852***	5.765***
女性		2.138***	2.119***	2.533** *
年龄		1.010**	1.004	1.004
已婚		1.074	1.058	1.085
少数民族			2.441***	1.496
农村户口			0.877	1.41
受教育程度			0.857*	0.854*
收入取对数			0.825	0.820
女性×母亲有信仰				1.174
女性×农村户口				0.065*
少数民族×母亲有信仰				2.126*
常量	-2.987	-3.991	-2.661	-2.692
N	4231	4231	4231	4231
-2LL	2397.849	2343.064	1680.822	1673.156
自由度	1	1	9	12

*** $P < 0.01$, ** $P < 0.05$, * $P < 0.1$

在西方,人们通常认为,女儿更容易接受父母的宗教影响。对于这种偏差,我国学者刘子曦认为考察该问题时应回到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在我国闽南传统文化中,儿子需要参与祭祀与家族事务,父母会格外关注他们的宗教认同。^[5]而女性和农村户口的交互项影响显著则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当下农村出现的“宗教热”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嵌套模型的似然比检验,模型三优于模型二,模型四优于模型三,这说明模型四是相对较优的模型。

三、结论与讨论

与以往关于宗教信仰代际传递的研究相比,本研究有两大特点,其一,本研究是对非基督教文化圈的中国进行的量化研究;其二,与国内的相关研究大都采用某个地区或者某个群体的调查数据相比,本研究利用了极具影响力的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CGSS 的数据,因此本研究的结论更具普遍性。

宗教信仰的代际传递是影响个人宗教信仰的重要因素。

表 6 Logistic 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非标准化系数)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父亲有信仰	1.545***		1.602***	1.586***
母亲有信仰	1.909***	1.633***	1.925***	1.752***
女性		0.760***	0.751***	0.929***
年龄		0.010**	0.004	0.004
已婚		0.071	0.057	0.082
少数民族			0.892***	0.403
农村户口			-0.131	0.132
受教育程度			-0.154*	-0.158*
收入取对数			0.192	-0.198
女性×母亲有信仰				0.161
女性×农村户口				-0.486*
少数民族×母亲有信仰				0.754*
常量	-2.987	-3.997	-3.308	-2.692
N	4231	4231	4231	4231
-2LL	2397.849	2343.064	2283.484	1673.156
自由度	2	5	9	12

*** $P < 0.01$, ** $P < 0.05$, * $P < 0.1$

家庭作为孩子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宗教的社会化也在这一场域中同步展开。父母亲在子女宗教信仰和宗教参与的传递上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相比起其他变量,在解释成年子女是否信教时,父母亲的影响因素是非常大的。具体来看,母亲对成年子女宗教信仰的影响大于父亲,这十分符合宗教社会学习理论的解释。

父母的宗教信仰对儿子与女儿宗教信仰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对比发现,女儿信仰宗教的比例更高。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女性自身独特的心理、思维和一般生活状态等方面予以解释。比如,相比起男性的刚强,女性往往一般更为柔弱,这也是一般社会整体的社会性别角色认知,尤其就是遭遇不幸的时候,女性更容易信教;此外,女性比男性更为感性,使得她们更容易接受宗教的洗礼,并十分虔诚,而男性相比起来则更为理性,不易于接受宗教的影响。^[6]

此外,年龄、世代、户口、民族、受教育程度等人口特征是中国人宗教信仰社会化的重要机制。正因为这些人口标签背后都具有丰富而具体的历史文化意涵,所以也给了我们一个在研究中国的宗教问题时的启示,那就是不能简单、片面地照搬西方的宗教社会学相关的理论,比如:宗教市场理论所预测的简单的零和博弈并没有发生,原因可能就是华人社会非制度性宗教的融合性较强,对人口变化不敏感。^[7]

最后,本研究也面临着以下两个方面的限制:

1.本研究对宗教信仰的分类过于简单,只是分为有信仰和无信仰两类,这无疑将使得各宗教之间的差异被抹平,这也跟本次调查所使用的数据并非专门的宗教调查有关,但相信随着相关调查的开展,新的数据将有助于相关研究的完善;2.本次研究看到的更多的是宗教信仰代际传递中个人和家庭因素的影响,忽视了对社会整体结构因素的考察,而近年来宗教热的兴起,无疑说明了社会发展到特定阶段对人的心理、精神状况是有很大影响的。

参考文献:

- [1] 阮荣平.教育与宗教信仰的代际传递阻滞:兼论我国部分农村“宗教热”[J].经济学动态,2015(12):43.
- [2] 郭文般.台湾宗教变迁的社会阶级分析[C].2009年两岸宗教与社会学术研讨会,2009.
- [3] Smith,Christian & David Sikkink 2003,“Social Predictors of Retention in and Switching from the Religious Faith of Family of Origin:Another Using Religious Tradition Selfidentification.”Review of Religious Research 45(2).
- [4] Pollner, M. 1989,“Divine Relations,Social Relations,and Well-being.”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30(1).
- [5][7] 刘子曦.宗教信仰的代际传递:基于台湾地区的数据分析[J].社会学研究,2017(1).
- [6] 李海梅,谢海欣.徘徊在圣俗之间:汶川地震灾区女性宗教信仰研究[J].宗教学研究,2013(3):266.

编辑:徐晓婷

简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细落小落实

郭榛树 王程程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认真贯彻“落细”的要求,就必须化抽象为具体,化原则为规则,化粗疏为细密。认真贯彻“落小”的要求,就必须从“八项规定”切入抓党风,从诚实守信切入抓社风,从师德师风切入抓校风,从娃娃开始抓家风。认真贯彻“落实”的要求,就必须明确主体,压实责任;创新载体,虚事实做;创新机制,拿出实招;久久为功,务求长效。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细;落小;落实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9)01-00070-04

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1]这一重要论述不仅是一般的工作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思想方法。以此为指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取得了喜人成绩。但勿庸讳言,在一些地方和单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还较多地停留在理论上、口头上和形式上。为此,我们必须深入学习、认真领会和扎实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断,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这一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真正推向深入。

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在“落细”上下功夫

一要化抽象为具体。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是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认为,抽象与具体的辩证法应是“具体—抽象—具体”的方法,是具体上升到抽象与从抽象落实到具体的内在统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高度凝炼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实践中抽象出来的。但是,当我们要发挥核心价值观的作用时,就必须从抽象回到具体。这种

收稿日期:2018-12-20

作者简介:郭榛树(1966—),男,江苏兴化人,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哲学博士;王程程(1987—),女,安徽巢湖人,南京市社会主义学院教师。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5年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重点项目)“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模式研究”(批准号:15MLA001)和2017年度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课题“基层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路径创新案例研究”(ZK20170315)的阶段性成果。

返回不是简单的概念运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只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中,使纸上的“说法”变成学习、生活和工作中的“做法”,才能够真正发挥它的道德定向、行为引导和价值评判等功能,才能增强它的约束力、凝聚力和感召力。

二要化原则为规则。价值的实现,需要经过价值—原则—规则等一系列的转化。这三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价值是现实的人的需要与事物属性的一种关系,原则是引证解释说话、行事所依据的根本准则,规则是指要求大家共同遵守行动准则或办事规程。这三者,前者都是后者的指导和依据,后者都是前者的具体化和现实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12个词中的每一个词,都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诉求的一种高度凝炼和抽象,要能够发挥作用,就必须将它们先变成一系列原则,然后再细化为规则和程序。以“公平”为例,纵向上我们必须考虑起点公平、规则公平和结果公平;横向上,我们必须考虑经济公平、政治公平、文化公平、社会公平和生态公平等等。将公平的类型细化之后,还要确定相应的原则。以“社会公平”为例,党的十九大不仅提出了“要更多更公平地惠及人民”的民生总原则,而且提出了具体的“七有”原则,即“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这些原则十分重要,但还是不够的,因为它们仅仅是为广大人民群众享受相关权利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在实践层面还无法操作。为了把可能性变成现实性,把这些原则的规定变成可操作的东西,就必须有配套的规则和程序予以保障。因此,为了实现“七有”原则,就必须制定实施配套的义务教育制度、收入分配制度、最低保障制度、保障房制度等等。有了这些规则,人民群众的民生权利才可以得到落实。同样地,“公平”观要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得到实现,也需要相应的一系列规则。

三要化粗疏为细密。抽象的、普遍适用的价值

必须覆盖到每一个主体、作用于每一个领域、融合到每一个载体之中,才能全方位地发挥作用,全方位地产生影响。从主体看,一方面,“要面向全社会做好这项工作,特别要抓好领导干部、公众人物、青少年、先进模范等重点人群。”^[2]另一方面,新社会阶层人士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其价值观培育也十分重要,像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等阶层,也必须做到全覆盖。从领域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在宏观上应当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建设同步而行,相融而长;在微观上“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3]从载体上讲,我们应当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载体来涵养核心价值观,如要善于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来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善于借助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来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善于策划各种文明创建活动提高精神境界、培育文明风尚。从保障上讲,应当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一切制度之中,如党纪国法、行业规章、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等行为准则之中,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各种具有约束力的社会规范,成为人们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基本遵循。

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在“落小”上下功夫

一是党风政风要从“八项规定”抓起。“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官风、政风与民风的关系也有点类似于风和草的关系。党风决定政风,在一定意义上,党风就是政风;民风则透视和折射党风、政风。因此,“官风正则民风淳”,有什么样的党风政风,必然会有什么样的民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老百姓看得见的“小事”抓起,从每个党员干部的“小节”抓起,不仅出台了“八项规定”,还出台了很多更具体的规定,如中秋节不许公款送月饼、元旦春节不互送贺卡、不准公款购置年历、购物卡,等等,这些“落小”举措,管住了干部的日常生活、工作和节日交往中的“小节”,

不仅具有反腐倡廉的政治意义,而且具有引领风尚的社会意义。

二是社会风气要从诚实守信抓起。两千多年前,孔子所描绘的大同社会就有一条“讲信修睦”。在今天,“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之一。无论是古代还是今天,之所以都把诚信放到一个十分重要地位,是因为人无信不立,商无信不盛,国无信不威。诚信是个人、企业和国家的通行证,也是维系人与人交往的纽带,更是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基石。一个人说句谎话,一个企业卖点假货,或者政府偶尔失点信,看上去可能都是小事,但危害极大,可能会破坏社会的信任关系,会出现“人心隔肚皮”的防范心理,产生类似于不敢购买国产奶粉的极端消费心理,形成对党和政府极不信任的“塔西佗效应”等等。相反,如果每个人、每个企业,以及政府的每个部门能够时时处处事事讲诚信、守信用,那么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就会大大遏制,经济交往中的成本就会大大降低,日常生活中的摩擦和矛盾就会大大减少。这对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以及和谐社会建设,都将善莫大焉、功莫大焉。

三是学校风气要从师德师风抓起。自古以来,学校在德育方面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从教育的主导力量来看,教师自古以来就被定位为“为人师表”,如《北齐书·王昕书》传:“杨愔重其德业,以为人之师表。”对于教师,不仅有专业上的要求,更有道德上的要求。不管是古代学校,还是现代学校,道德教育都是最为重要的内容,甚至是第一位的内容。如中国古代教授“四书五经”,新中国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都离不开“德”字。“德高为师,身正为范。”要学生讲道德,教师无疑必须首先讲道德,而且要有更高的道德。教师道德水平的提高,一方面需要教师加强自我修养,作为教师不能一切跟着世俗走,更不能随着物欲走,应当比其他社会群体更注重精神生活,更明是非,更知荣辱;另一方面需要学校培育一方“净土”,作为学校要摒弃一切导向急功近利的制度和措施,对教师要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对于违反师德师风的教

师要强化教育、严肃处理,对于爱岗敬业奉献的先进教师要大加鼓励、积极宣传。如果教师的一言一行都能成为学生的表率,就会产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效应,让校园充满浓浓的正能量,并且源源不断地向社会传递。

四是家庭风气要“从娃娃抓起”。现代西方儿童心理学研究表明,三岁以上的儿童就具有一定的辨识是非好坏的能力。儿童时期是一个人的个性品质、行为习惯的养成时期。这一阶段是一个人接受教育的第一阶段,对于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家庭成员特别是父母的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心理素质,以及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对小孩的影响十分巨大。因此,“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迈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9]下一代的成长不仅是每一个家庭的希望,也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因此,“我们要重视家庭文明建设,努力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成为人们梦想启航的地方。”^[9]

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在“落实”上下功夫

一要明确主体,压实责任。要推进核心价值观培育与践行这一基础工程,必须建立健全各级领导责任制,促使宣传文化管理部门和其他党政部门、群团组织切实履行组织、协调、支持和监督等职责。其中,宣传文化管理部门是“总指挥”,其他党政机关和群团组织是“方面军”,相关部门和组织应当在各自的职权范围或活动领域积极作为、认真履职,同时又要互相配合、形成合力。必须建立健全社会协同机制,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把理论与项目推进相融合,在实践中不断提炼经验理论,用创新理论指导项目不断推进;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通过项目资助、志愿服务、购买服务等方式,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

二要创新载体,虚事实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观念性的东西,只有与实实在在的路径和载体结合起来,才能化虚为实,落地生根。因此,在实

践中,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价值观与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和学习紧密联系起来,把核心价值观与社会治理紧密结合起来,积极探索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路径,充分利用博物馆、文化馆、文化活动、民俗礼仪、传统节日、道德讲堂、微信公众号、公益广告、文化墙等各种载体,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让核心价值观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让核心价值观时时能体会,处处能体验,并且一步步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三要奖惩分明,拿出实招。对于绝大多数党政机关而言,必须建立健全考核评估机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不是中心工作,也不是核心业务工作,常常会“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为了防止这一工作被弱化、虚化或边缘化,就必须把它纳入绩效考核体系之中,对于成绩显著的要予以表彰和奖励,对工作不力的要给予批评甚至问责。对于个体而言,应当建立健全道德奖惩机制。有人认为,道德应当是非功利的,出于奖惩而行的行为就不能视为道德行为。但是,道德既有先进性的要求,也有广泛性的要求,鼓励一些带功利奖励性的道德行为,更有利于调动广大普通群众遵守道德规范的积极性,因此应当积极探索科学合理的道德奖惩制度,使道德行为得到应有激励,不良行为受到应有处罚,促进社会治理与道德建设的相互促进,形成好人好报、恩将德

报的正向社会效应,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更多主体和更广范围内的培育和践行。

四要久久为功,务求长效。从全社会来看,核心价值观要所有社会成员接受和认同,也有一个从少到多、由浅入深的过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劳永逸。因此,我们决不能急功近利,而应当“坚持由易到难、由近及远,努力把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变成日常的行为准则,进而形成自觉奉行的信念理念”。^[4]核心价值观培育过程中还可能会有反复,我们决不能气馁,而应当坚定信心,对于道德领域出现的问题要持之以恒地加强治理,对于实践中成熟的经验要上升为制度加以固化,努力形成长效机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成果不断巩固下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这一基础工程不断推向深入。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N].人民日报,2014-02-26(1).
-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不断提高城市核心竞争力[N].人民日报,2014-05-25.
- [3] 习近平.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家庭文明建设 推动形成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N].人民日报,2016-12-13(1).
- [4]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讲话 [N]. 人民日报,2014-05-05.

编辑:徐晓婷

孔子人性论思想评析

谷玛利

摘要:孔子人性论思想是其仁学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孔子在人性论方面所进行的思考和研究,是以构建儒家思想学说体系为目的,他提出的有关道德之性或义理之性的观点为儒家进行道德说教提供了理论基础,而有关心智之性或气质之性以及人性经过后天努力可以改变等观点也为儒家实施礼乐教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孔子;人性论;道德之性;心智之性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9)01-00074-04

人性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先秦时期各家各派都程度不同地进行了研究,各种观点纷争对立,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内涵。关注人性问题,首先是为了满足人类自我认知的需要,人们在认识自然与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人为中心的主体意识,于是“人”就成为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而“性”则是沟通天人联系的关键,因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孔子仁学思想以“人”为中心,改造人首先必须研究人,而研究人就必然要关注人性问题,所以孔子是先秦时期最早提出人性问题的思想家。在《论语》中,尽管“性”字仅出现两次,但是孔子相关言论却有很多,许多观点具有开创意义。孔子关注和研究人性问题,主要目的是为其仁学思想寻找理论依据,进而对各国当政者进行政治说教,最终

全面实现恢复西周礼治秩序的政治理想。毋庸讳言,孔子有关人性论的思想观点在现实政治中并不具有实践意义,但是在理论研究方面对于我国现今建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公共道德观等仍具有借鉴意义。

—

人性问题首先是关于人类的自我认知,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性,因此人不应消极避世,与鸟兽为群,而应积极入世,有所作为,这是孔子人性论思想的基本观点。

春秋末年,社会动荡不断加剧,贵族阶层内部矛盾也日益加深,有些在争权斗争中失利的没落贵族既无力改变现实,也不愿意改变自己,于是他们干脆放弃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和义务,消极避世,隐居山林,与鸟兽为伍,孔子对此并不认可,他

收稿日期:2018-10-12

作者简介:谷玛利,江苏开放大学副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为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论语老师事件研究(15LSD001)”阶段性成果。

在评论古代逸民虞仲、夷逸时说：“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其斯而已矣。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1]在孔子看来，任何人都应该认真履行做人的基本责任和义务，即便是“礼崩乐坏”“天下无道”，也不能离群索居，洁身自好，标榜清高，放弃所有人伦规范和世俗事务，否则就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性。孔子在周游列国期间，也曾因“辟人”和“辟世”问题与长沮、桀溺等人有过思想交锋。长沮、桀溺等人也是没落贵族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孔子为了追求“吾其为东周”的政治理想而四处游说求仕，这不仅是徒劳无益的，也是不明智的，因此奉劝孔子道：“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这里的“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是指那些目光短浅、碌碌无为的各国当政者（包括孔子前往投奔的楚昭王），“辟人之士”是指仍然对各国当政者抱有幻想的孔子，而“辟世之士”则是指已经彻底摒弃人类社会、与鸟兽为伍的隐者。他们告诫孔子，与其与当政者同流合污，自毁清誉，不如回归自然，保存纯真天性。然而孔子则认为每一个人都要为了改变社会做出应有努力，他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2]意思就是，人与鸟兽不同类，人之性与鸟兽之性也不同属，因此人与鸟兽“不可与同群”。孔子的这种人生态度与其人性论观点是密切相关的。孔子认为，人之所以有别于鸟兽，是因为人有与生俱来的人性（天性），比如“仁”“孝”“忠”等等，这些都是维持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不可须臾或缺。如果因为天下无道而选择避世隐居，与鸟兽为伍，这不仅放弃了做人的权利，也放弃了做人的责任和义务。换言之，即便各国当政者都是不值一提的昏庸无知之徒，但是他们毕竟与我们属于同类，而非鸟兽，人当然要与人群处，况且人与人都有共同的责任和利益。

二

人性是先天而成的，那么后天是否会发生变化？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儒家思想的立说之本。孔子认为，人性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变的，这种改变主要取决于后天的主观努力和客观环境，这是

孔子人性论思想的另一个重要观点。

孔子通过比较古今人性之异同，从而得出人性可以发生改变的结论。他说：“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3]这里的“生”可以理解为“性”，因为“生”“性”二字古音相同，因音转义。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生”写作草叶下面加一横代表地面的指事符号，表示草木破土成长。《说文解字》：“生，进也。象草木生出土上。凡生之属皆从生。”从词义延伸过程来看，“生”是词根，“姓”和“性”都是出现较晚的派生词（“生之属”），“姓”是氏族之本；“性”则是人的心理或气质方面的本性，亦即生理之性或气质之性，因此在古代典籍中“生”常解为“性”：“生之谓性。”^[4]

“人之生”与“罔之生”分别代表了两种人性，前者是未经后天人为改造的本性，人人相同；后者则是在生存环境影响下发生变化的人性，人人相异。“罔”为扭曲、弯曲之义。两种不同的人性必然带来两种不同的人生结果，即“直”与“幸而免”。“直”是为人耿直、直率，不善妥协、变通。《论语·阳货篇》：“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显然，“直”是古人“愚”这种性格特征的一种表现形式。“直”字后面有所省略，根据“幸而免”推知，其完整意思应该是“直而不免”，因此这两句话完整地表达应该是“人之生也直而不免，罔之生也幸而免”。意思就是，那些保持本性耿直的人容易得罪人，因此难免会招致杀身之祸；而那些善于审时度势、适当改变本性的人则可以保全性命，幸免于难，这里的“免”是免于刑戮或灾祸的意思。

三

人性可以经过后天努力而发生改变的观念，在理论上丰富了孔子的仁学思想，尤其是关于道德之性或义理之性的论述，为儒家进行道德说教提供了理论依据，相关内容主要集中在《阳货篇》中孔子关于性近习远的论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本章虽然只有短短的两句话八个字，却引来后人无数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是人性的来源、性质和内涵等问题。

“性相近也”一句，着重强调的是人性中的共

性(天性),这种共性是由“天”公平无私的义理所决定的,因此这里的“性”可以理解为义理之性或道德之性,即以“仁”“忠”“孝”等道德观念为核心的道德品质。具体可以从三方面来进行分析:一是关于人性的来源问题。子贡曾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14]他不自觉地把“性”与“天道”并列,说明两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孔门再传弟子子思则直接把两者关系明确表述为“天命之谓性”^[15],意思就是,人性是由天命决定的。此外,郭店楚简有《性自命出》,上博楚简有《性情论》,这些都是早期儒家学派的著作,文中也明确提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16]由此可见,人性源自“天道”或“天命”。“天”有义理之天,“性”也有义理之性,而人性中的“仁”“忠”“孝”等道德品质是秉承天道、顺天而成的,是天道和义理的具体体现。二是关于人性的内容问题,人性的构成非常复杂,但是核心内容是“仁”,孔子反复强调:“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17]“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18]“欲仁而得仁。”^[19]上述言论表明,“仁”是人性中固有的内容,这就为孔子仁学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三是关于人性的表现形式问题,“仁”体现了“天”公正无私的义理,因此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没有本质区别。

“习相远也”一句,着重强调的是人性中的个性(本性),亦即宋儒所说的气质之性^[20],主要包括个人的性格、气质、心理、欲望以及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等,表现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差异性。比如孔门弟子个性迥异,孔子说:“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21]这里的“愚”“鲁”“辟”“喭”是各位弟子的天生个性,只能在程度上有所损益,却不可能在根本上做出改变。孔子据此施教,进者退之,退者进之,从而取得了可观的教学效果。

“性”是天使然者,“习”则是人为之者,后天的“习”可以在潜移默化中改变先天的“性”,即所谓“养性者,习也;长性者,道也”^[22]。关于这个“习”字,《孟子》中说:“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23]皇侃《论语义疏》也说:“习者,谓生而后有(百)仪,常所行习之事也。”他们都把这个“习”理解为后天形

成的一种行为习惯,这种解释似乎过于笼统、简单。也有人用《学而篇》中“学而时习之”的“习”来进行解释,认为“习”主要是指“习礼”,即一种不断重复的行为或动作,这种解释则未免过于牵强^[24]。综合孔子相关言论分析,“习”应该是在人为主观努力和客观环境影响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而形成的一种有别于天性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

人们从“仁”这个“性相近”的起点共同出发,然而在修身求仁的过程中,人生修养和道德境界却逐渐出现“习相远”的分化,有的人成为有德君子,有的人则沦为失德小人,根本原因就在于“仁”的本性保全或丧失,比如同为孔门弟子,“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25]。具体分析,出现道德分化的原因主要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方面:许多人在各种现实利益的诱惑下,缺乏求仁欲望,放弃后天努力,他们见利忘义,道德沦丧,最终导致人性发生变化,所以孔子深有感触地说:“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26]客观方面,中国古代社会长期有聚族而居的传统,氏族组织的生活习俗和思想观念对人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力和改造力,生活地域、居住环境以及人际交往等诸多因素也能对人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在外部环境的作用下,人性逐渐出现分化,因此就“习相远”了。

孔子有关“性近习远”的论述,不仅是其仁学思想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具有明确的政治功利目的:第一,他把“仁”等伦理道德观念植入人性之中,宣扬“仁”的天然道德属性,目的就是要求人们加强个人道德修养,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不断激发“仁”的正能量,久而久之,习惯成性,人性就可以彻底改变,从而实现“欲仁而得仁”的理想境界。第二,由于“仁”是与生俱来的天性,因此想要修身成仁,就必须从严格要求自己做起,所以他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26]“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27]第三,他非常重视后天的生活环境和人际交往等人为因素对于人性的改造作用,所以他反复强调:“里仁为美。”^[28]“无友不如己者。”^[29]春秋时期,氏族组织仍然是社会的基本构成,人们

习惯于聚族而居,轻易不愿意迁徙流动,然而孔子却鼓励人们破除传统氏族观念,择善而处,里仁为美,这种意识是具有改革创新意义的。第四,强调实施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孔子在去鲁适卫的途中,曾与得意门生冉有深入讨论施政问题,当时他提出“庶”“富”“教”分阶段实施的政治主张,认为解决国民的繁衍(“庶”)和温饱(“富”)问题之后,就应该加强对国民实施道德教化(“教”)^[18],因为实施礼乐教化不仅是改善人性的最佳方法,也是维持统治秩序的最有效措施。

四

人性的改变和完善,除了努力提高个人道德修养之外,还需要不断提高认知和思辨能力,这也是孔子人性论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因为相关内容与人的心智有关,因此可以把这种人性理解为心智之性。

孔子认为,心智(智力)也是人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把人的智力分上、中、下三品,上品为知(智),下品为愚,这些都是天赋而成的秉性,后天很难彻底改变,所以他说:“唯上知(智)与下愚不移。”^[19]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人的智商主要是由先天遗传因素决定的,遗传基因不同,智商也就存在上下高低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是后天努力难以弥补的。所以孔子关于上智下愚的论述是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关于“不移”二字,孔安国注曰:“上智不可使强为恶,下愚不可使强贤也。”朱熹《论语集注》亦引程子言曰:“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语其性则皆善也,语其才则有下愚之不移。”这些观点仍然用道德之性来解释人性中的智愚问题,思路又回到了道德说教的老路上,显然已经背离了孔子心智之性的本意。

在“上智与下愚”两种极端智力之间,大多数是那些智力平平的普通人,孔子称之为“中人”。在施教过程中,也应该因人而异,因材施教,这样才

能取得最佳的施教效果。

孔子关于心智之性的相关言论,为施教于民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教育的社会功能在于开发国民智力,改善国民性情,提高国民素质。从这个意义来说,无论道德教化还是儒学教育,对于提高国民心智和维持统治秩序都是很有帮助的,因此心智之性是孔子人性论思想中最具有实际运用价值的部分。

参考文献:

- [1] 论语·微子[O].张燕婴,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 [2] 论语·雍也[O].张燕婴,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 [3] 孟子·告子章句上[O].万丽华,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 [4] 论语·公冶长[O].张燕婴,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 [5] 礼记·中庸[O].李慧玲,译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
- [6] 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性情论(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22.
- [7] 论语·述而[O].张燕婴,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 [8] 论语·颜渊[O].张燕婴,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 [9] 论语·尧曰[O].张燕婴,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 [10]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O].北京:中华书局,2016.
- [11] 论语·先进[O].张燕婴,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 [12] 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性情论(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28.
- [13] 孟子·尽心章句上[O].万丽华,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 [14] 李泽厚.论语今读[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505.
- [15] 论语·里仁[O].张燕婴,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 [16] 论语·颜渊[O].张燕婴,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 [17] 论语·学而[O].张燕婴,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 [18] 论语·子路[O].张燕婴,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 [19] 论语·阳货[O].张燕婴,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

编辑:徐晓婷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网格化机制探索

——基于苏州 W 镇的考察研究

施瑶瑶

摘要: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如何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优化创新是新时代党建和社会治理需要研究和探索的共同问题,而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悬浮型”党建倾向则是阻碍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重要因素。苏州 W 镇的网格化党建将治理网格与党建网格“两网融合”,并且在网格化党建的阵地建设和制度完善上也采取了很多实质性措施,基本实现了将党建嵌入到基层社会治理中,有效克服了基层党建的“悬浮型”倾向,这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开辟了一条可供借鉴的路径。而网格化党建中存在的党员力量单薄、群众参与积极性不足和网格内资源整合乏力等难题则需要进一步探索解决。

关键词: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网格化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672-3163(2019)01-00078-03

一、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悬浮型”党建

所谓“悬浮型”党建,就是党建工作没有落实到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中来,而成为了一种例行公事甚至是形式。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中党建工作的“悬浮”现象可以从下面三方面来分析。

(一)基层党建活动与政府工作相脱节

基层政府工作相当繁杂,而且基层政府纳入正式编制的人员有限,以有限的工作人员去应付这么纷繁复杂的事务,往往出现捉襟见肘的现象。所以,尽管基层政府也有部门和职责的划分,但是大多数时候绝大多数的基层工作人员都会安排来完成每个时间段内的重大事务。以致全年下来,基

层基本上都在应付那些紧急的或者文件规定要接受考核的重大事务,工作关注的也是可以看得见效果或者形式的。例如招商引资工作、拆迁工作、禁止秸秆焚烧等。基层政府工作人员主要精力都在这些硬性指标的事情上。党建活动当然也是硬性指标,但是缺少将党建活动和基层其他工作联系起来,起到真正发挥党建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引领作用,基层政府更多的是将党建当做一件单独的工作来完成。

(二)基层党建活动与人民群众相脱节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群众路线一直是党坚持的方针政策,

收稿日期:2018-12-13

作者简介:施瑶瑶,宿迁泽达职业技术学院助教。

简言之就是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党建当然也离不开群众的参与,但是我们从我们所观察到的实际情况来看,基层政府的党建活动并没有将群众主体纳入进来。当然,这方面有一些原因,第一,是基层的大部分党员群体都在政府内部,而公职人员之外的党员也大多年龄比较大了,缺乏参与能力。有人甚至调侃道“现在镇上开党代会都像是在开老年人工作会”。第二,基层党建活动没有真正贴近人民群众。从形式来看,基层党建活动都是以党员群体为主体的,并不重视群众的参与,没有充分的宣传和调动群众积极性。

(三)基层党建活动的形式化严重

这也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这是基层政府工作的现状决定的,之前提到基层政府工作千头万绪,要完成上级规定的多项考核指标。一年到头都处在疲于应付的状态,自然不会有太多精力来重视党建活动。其次,这跟基层政府党建的考核方式也有关。因为,党建其实也是一项重要的考核项目,所以只有到考核期临近,为了应付考核,一些基层政府临时组织一些活动,以此来形成材料,这种活动形式化严重,而没有太多实质内容。所以,尽管各级党政部门一直强调党建的引领作用,但是在现实中,党建活动和基层社会治理活动并没有结合起来,这样党建的引领作用也就得不到体现。

二、网格化党建:基层党建嵌入社会治理的新探索

(一)将治理网格与党建网格“两网融合”

W镇从2017年开始启动综合网格化服务管理及联动机制建设,全镇划为1个一级网格,12个二级网格、50个三级网格,区域内所有的人、地、事、物、组织都在网格管理范畴之内,一共配备专职网格员123人、兼职网格员195人。这是治理网格的框架,参照治理网格的格局,W镇相应建立起党建网格,在镇上设立一级党建网格,在村(社区)、产业园等地设置二级网格,在自然村、片区、楼宇集中区设置三级网格,在村组、企业、楼宇设

置四级网格,形成了“镇(街道)党(工)委——村(社区)、产业园党组织——网格党支部——村组(楼栋、党小组)”为基本框架的网格党建组织体系。W镇党建网络的设置遵循“行业相近、地域相邻、便于管理”的原则,将支部直接建在自然村、片区、楼宇集中区等三级网格上,将党建指导员下派到四级网格中。三级网格支部书记、网格长由村(社区)“两委”班子成员担任,四级网格网格长由“两小组长”、党员骨干等担任。在50个三级治理网格中设立50个网格党支部,共有155个党小组,基本建立落实上下联动横向协作的网格工作机制,真正实现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一张网”。在党建网络建立之后,W镇政府将组织建设、环境建设、公共安全和民生服务等职能下沉到网格之中,夯实了网格的职能基础。

(二)网格化党建的阵地建设

W镇的做法就是在三级网格中设置党群服务站,党群服务站就是网格党支部的主要活动阵地。党群服务站按照“九个一”的原则设立,即一块标识、一面党旗、一项制度、一个计划、一份服务清单、一名党建指导员、一支志愿服务队、一批学习资料和一套电教设备。党群服务站的设立,使得基层党建活动对于群众而言不再是遥不可及和互不相关的,借助于党群服务站,网格内党员可以直接和网格内群众面对面交流,收集它们对基层党和政府的意见建议。党群服务站甚至被形容成老百姓家门口的“红色客厅”,在这个“红色客厅”内,群众可以看得见党的元素、听得见党的声音、感受得到党的关怀和力量。党群服务站并不是只有党员,它是党员和网格内群众联系的站点,在这里群众可以参与到网格内的党建活动中。除了党群服务站,镇党委和政府还鼓励三级网格内的党员和群众在网格内积极创办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类非营利和微利性便民利民服务站点。

(三)网格化党建的制度建设

首先,网格化党建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由镇分管领导负责组织召开,二级网格负责人及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参加,总结讨论网格内

工作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并提出改进措施。其次,是“主题党日”活动制度,这要求每个网格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一个特定的主题,每个月都用一天的时间组织党员和群众围绕这个主题开展活动。再次,是党员干部联系服务群众制度,W镇建立了党员干部分级联系群众制度,由镇(街道、区)和村(社区)干部联系重点网格,“两小组长”和党员骨干联系广大群众。

通过以上对W镇基层党建的介绍,基本可以看到网格化党建通过将治理网格与党建网格“两网融合”和网格化党建的阵地和制度建设,完成了将党建嵌入到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使得基层社会治理从“一核多元”向“一核多能”的转变。^[1]但是由于W镇网格化党建的时间还不长,这也是处在初步探索阶段,所以要实现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后面也还有很多需要研究和继续探索的。就目前对W镇网格化党建情况考察来看,它主要面临着网格党员群体总体力量薄弱、网格内群众参与党建的积极性不够强以及网格内部资源整合不够等问题。

三、基层党建网格化的完善路径

(一)充分利用和发挥网格内党员干部的作用

因为无论在基层也好,其他地方也好,党建最核心的力量一定是中共党员,但是现在中国共产党对入党的门槛卡的比较严格,要求也更加高了,所以基层党员出现老龄化严重现象。而基层青年党员数量有限,所以针对党建这一工作,整体党员力量就显得不足,这影响了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效果。那么,如何调动和发挥非在职党员在网格化党建中的作用就成了非常关键的问题。在职党员因为有公职在身,当然义无反顾会主动参与到网格党建中来。而对于那些自谋职业党员、离退休党员、流动党员及生活在网格中的党员等,则要重点吸纳,因为他们都有各自的事业,在时间上与网格内党建活动具有冲突性,所以在党建时间选择、内容确定、场所选择上还要充分照顾到这部分党员的意见,尽量给予方便从而吸引他们来参加。

(二)调动网格内群众参与网格化党建的积极性

有学者就直接指出党群直联是基层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根本导向。^[2]所以,发挥党建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引领作用,就必须将党建与基层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结合起来。因为公共服务是老百姓可知可感的事物,如果他们在参与党建活动的过程中同时能获得某些公共服务,或者更有利于增加整体公共服务,那么这对他们就是有吸引力的。当然,也可以采取其他方法,比如增强党建活动的趣味性和娱乐性,寓教于乐,使老百姓在学习党的知识和党的思想精神时身心也得到了快乐。W镇的党群服务站已经是一个比较好的平台,其实,在党群服务站的站点的选择上还可以多探索尝试,使站点更接近人们的生活场所,人们在生活之余不自觉地就能参加到党的活动中来。

(三)探索多样化党建方式整合网格内服务资源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就是引领动员基层社会治理资源的能力,每一个网格内都聚集了相当程度的资源,例如,网格内单位和企业的服务和就业机会、网格内生活的待业人员、包括闲置的租房、土地等等。如何将这些资源进行整合使其能够最大化地得到应用就成了网格治理的重要问题。在党建网格和治理网格融合之后,其实就可以从党建这块入手来整合利用网格内资源。例如,可以加强与网格内各单位、企业和居民的联系沟通,制定列出各方“供需清单”,编制服务项目书。后面在党建活动就可以以这些清单为指南,强化各主体之间的资源互补。也可以探索建立党建信息平台,作为网格化党建的网络阵地,人们可以在平台上发布各类供需信息,平台提供咨询和信息核实与匹配。

参考文献:

- [1] 叶敏.新时代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格局的实现路径[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4):18-24.
- [2] 曹海军.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J].政治学研究,2018(1):95-98.
- [3] 刘悦伦.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珠三角的探索与实践[J].理论视野,2017(5):67-70.

编辑:王芳